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碩士學位論文

中國大陸在非洲的投資及其政經成效研析

The Analysis of Chinese Investment in Africa and It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ffect

指導教授：魏艾 博士

研究生：王光憲 撰

中華民國一〇四年七月

感謝辭

完成碩士論文是研究所課業的重整和考驗；是對個人責任感和意志的檢驗；當然更有學習的喜悅在其中。回顧在論文撰寫個過程中，除了探索的樂趣外，更要真心感謝師長和友人在論文停滯時的關心和幫助。

首先，要感謝我的論文指導教授-魏艾老師。從論文計劃大綱到論文及口試，魏老師都仔細修改，指出文稿的不足，使我能認清自己的不足，從而使論文更臻完善。對魏老師的指引，我由衷的感謝。再者，要感謝口試委員郭武平老師和丁永康老師所給予的指導與建議，讓論文內容更深入，更精確。

其次要感謝同學鈺傑，冠人，議文在論文格式及電腦操作上給予的指點，使論文寫作能順暢進行；在和鈺傑討論中，更觸發了我對論文研究方向的靈感。最後要感謝親友和家人，這其中除兆慶提供電腦操作上的幫助外，其他是在進入研究所的動機和準備上的助益。自職場退休後，憶起五十多年前於我進軍校前夕，母親 沈永懿女士的一席話，使我決心重入校園學習；兆慶整理出一份書單，讓我照單閱讀，作為研究所考試準備；親戚海康撥冗改正我的英文考古題習作,並作講解；這些幫助使我能重拾學業並堅持完成。

最後，謹以此論文獻給家人和親朋好友，謝謝大家在這過程中的關心。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摘要

自中共於 2000 年明確提出「走出去」戰略，鼓勵具比較優勢的企業對外投資以來，中資企業的對外投資區域迅速遍及全球；投資產業則從資源開發，生產製造，工程營建，到貿易無所不包。就整體海外投資言，中國大陸在非洲的直接投資所佔比例不高，但卻引起西方媒體注目並稱之為中國對非洲的「新殖民主義」以掠奪非洲的資源。西方媒體和部份學界「標籤化」中國大陸在非洲的投資，是因為中國大陸觸動了非洲原有的利益格局。至於中國大陸對非洲投資的動機，西方學界大多認為：中國大陸在非洲的投資國企是資源尋求；私營企業為市場尋求；從整體言，是為了轉移剩餘生產力以利結構調整。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逐漸把早先對非洲的援助向「互利共贏」的經濟合作轉變。在推動「走出去」戰略之後，中共更於 2006 年建立「中非發展基金」和「中非經貿合作區」以做為促進經濟合作的機制。至於中國大陸在非洲的投資模式，最受矚目是「以資源換基建」的安哥拉模式，其次為普遍在非洲採行的「工程援助+投資開發模式」。但中資企業由於是後進者，非洲優良的資源資產早已在西方企業手中。中資企業只有進入高風險區域投資，中石油在蘇丹的石油投資即為一例。同時中資企業缺乏海外經驗，簡單移植國內經驗並拙於經營社區關係，以致贊比亞的中資勞動條件竟成為政治的動員工具。

除經濟利益外，政治利益才是中共在非洲的核心利益；爭取非洲國家在國際組織的支持以抵消西方國家的影響力是中共對非洲經濟合作的目標；而對非洲經濟合作的競爭力來自於中共的「不干涉」。中國大陸對非洲的直接投資，使中共能以「全球生產網路，緊密的雙邊關係及多邊機制相結合，挑戰歐盟及美國在非洲的影響力」。中國大陸的直接投資明顯改善了非洲地主國的經濟成長和就業，至於期望中資能協助地主國發展則有賴地主國的政策和當地人力資本的改進。

關鍵詞：新殖民主義，「走出去」戰略，經濟合作機制，核心利益

Abstract

Since China proposed the “going out” strategy in year 2000, the enterprises with comparative advantages were encouraged to make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he reg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vestment has expanded rapidly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ir investment targets are also encompassing - resource 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construction and trade. Compared with the whole FDI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vestment in Africa is not a high proportion. But it did catch the attention from Western media with so-called "neo-colonialism” – China as the new predator in Africa. The reason why some western media and academy “stigmatized” China’s investment in Africa lies in the tension within the original pattern of interests. Most western scholars believe: in Africa, state-owned Chinese enterprises are resource-seeking, and private Chinese enterprises are market-seeking. All in all, their goal is to transfer the productivity in surplus so as to reconstruct the domestic economy

Lately after China’s economic reform, China-Africa relationship changed gradually from the earlier aid to a "win-win" cooperation. Because of the "going out" strategy, in 2006 the Chinese government even build the "China-Africa Development Fund” and the “China-Africa Economic and Trade Zones" as mechanism to promote economic cooperation. Meanwhile, the most noted model of China’s investment in Africa is the Angola model (“resource-for-infrastructure”), and secondly followed by the common "construction-credit-investment model." However, Chinese enterprises are still latecomers, while Western companies hold most of the quality resources. Chinese enterprises have to invest the high-risk areas, such as the oil investments in Sudan. In addition, the lack of overseas experience and the clumsy community relations led to the case of Zambia – labor conditions unexpectedly became a tool of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sum, I argue that political interest - other than economical one - is the true core interest of China in Africa. The goal of China-Africa economic cooperation is to earn the support from African countries and to counteract the power of Western countries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comes from the "non-interference" stance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rough this direct investment in Africa, the Party is able to “challenge the EU and US influence in Africa with a constellation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close bilateral relations and multilateral mechanism”. This direct investment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yment in Africa, but local policies and reform in human capital are also required if further assistance from Chinese fund is expected.

Key words: neo-colonialism, “going out” strategy, economic cooperation mechanism, core interest.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3
第二節　研究範圍　3
第二章　理論回顧與文獻探討　5
第一節　理論回顧　5
第二節　中國大陸對非洲直接投資相關文獻　15
第三節　西方有關中國大陸對非洲投資的研究　19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　21
第三章　中國大陸對外投資政策的回顧與前瞻　25
第一節　中國大陸對外投資政策的發展　25
第二節　中國大陸對非洲經濟合作　26
第四章　中國大陸在非洲直接投資的概況　28
第一節　中共非洲政策的演變　30
第二節　中國大陸非洲經濟合作的機制　33
第五章　個案研究：非洲國家研究　42
第二節　安哥拉：以「資源換發展」　42
第二節　尼日利亞：中國移民的夢土？　51
第三節　蘇丹：中石油投資的泥淖　59
第四節　贊比亞 ：變調的全天候朋友　68
第六章　個案研究：中資企業　81
第一節　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在非洲的投資　81
第二節　華堅集團　90
第七章　中國大陸對非洲直接投資的成效評估　93
第一節　中國大陸在非洲直接投資的經濟效益　94
第二節　中國大陸對非洲直接投資的政治成效　103
第八章　結論　109
第一節　研究結果及發現　110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112

附錄　114
附錄一:本論文中非洲國家兩岸譯名對照表　114
附錄二:趙紫陽的經濟技術合作四項原則　115
附錄三:國務院關於加強海外投資項目管理的意見　115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附圖

附圖一：2000-2012 年中國大陸對外投資流 117
附圖二：2003-2012 年中國大陸對外投資流量及對非洲投資流量比較 117
附圖三：2003-2012 年非洲外資流量與中資流量比較 118
附圖四：2003-2012 年安哥拉流入外資與中資比較 118
附圖五：2003-2012 年尼日利亞流入外資與中資比較 119
附圖六：2003-2012 年蘇丹流入外資與中資比較 119
附圖七：2003-2012 年贊比亞外資流量和中資流入比較圖 120
附圖八：2001-2013 年中非貿易總額 120

附表

附表一：中非經貿合作區 121

參考文獻 122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表目錄

表一：2006-2012 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區域分布百分比 28
表二：2006-2012 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區域分布百分比 29
表三：2006-2012 年美國和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流量比較 29
表四：表四:中共十六大迄 2014 年 5 月，中共高層領導訪問非洲表 32
表五：2004-2012 年安哥拉-中國貿易額 47
表六：2004-2012 年尼日利亞-中國貿易額 58
表七：2004-2012 年蘇丹-中國貿易額 61
表八：2004-2012 年贊比亞-中國貿易額 80
表九：CNPC 2003-2012 年原油產量表 87
表十：南非 1995-2012 失業率 99
表十一：2004-2012 年南非中資存量和和加納比較 100
表十二：2006-2010 年中資企業在加納僱用員工分類百分比 100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一章　緒論

中國大陸自 1978 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路線後，逐漸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1]中國大陸於經濟體制改革時，同步啟動了對外開放。使中國大陸由「自力更生」的閉關自守戰略，向出口導向戰略緩步轉型。[2]由於中國大陸具備發展勞動密集產業的比較優勢，中國大陸的開放迅速吸引東亞國家的勞動密集產業向大陸轉移。從 1990 年代開始，「中國大陸的外國直接投資總額一直都是全世界開發中國家首位」。[3]大量海外資金和技術的投入，推動了中國大陸的經濟迅速成長，並提高了國家綜合實力。隨著中國大陸經濟實力逐步提升，對支持經濟發展所需的能源和技術的缺口，成為改變中國大陸政策上支持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因素。但回顧中共對企業向海外投資政策的轉變，是深具政治經濟學意義的。

在 1991 年，中國大陸國務院同意國家計委「關於加強海外投資項目管理意見」。該「意見」建議「目前，我國尚不具備大規模到海外投資的條件，到海外投資辦企業主要應以我國需要出發，側重利用外國的技術，資源和市場以補充國內的不足」。[4]這個建議基本上是由限制海外投資的思維出發，但也不得不同意在「補充國內不足」的條件下，企業可以對海外投資。1991 年，正是中共保守派當道，尚未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時，因此當時計委的意見具有政治現實結合經濟需求的政治經濟考量。[5]

1992 年，在鄧小平南巡講話後舉行的中共十四大中，江澤民在十四大政治報告中指出：要「積極擴大我國企業的對外投資和跨國經營」。但在這個階段，

---

[1]中共十四大報告：「...堅持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經濟成份和分配方式為補充的基礎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新華網,
http://www.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697148.htm

[2]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 台北：美商麥格羅.希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2005 年 6 月 ），頁 354-355。吳敬璉指出：由於對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的分野認識不清，官員在工作中繼續執行進口替代的配套政策，並未貫徹出口導向方針。

[3]陳明祺，陶儀芬，「全球資本主義，台商與中國經濟發展」,田弘茂,黃偉峰主編,**台商與中國經濟發展**（ 台北：國策研究院，2010 年 11 月),頁 55。

[4]趙曉笛,**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長期發展趨勢**（北京：新華出版社，2008 年 9 月),頁 57。

[5]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頁.11。
http://www.bannedbook.org/researches/files.1910

中國大陸的對外開放主要還是在〝引進來〞,但〝走出去〞開始進入政策範疇。1997 年，江澤民在中共十五大政治報告中強調：要「鼓勵能夠發揮我國比較優勢的對外投資。更好地利用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在這期間中國大陸企業的對外投資開始穩步增長。[6]

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深化，經濟高速發展，石油消費增加，在 1993 年中國大陸成為石油淨進口國。為支持經濟永續發展，中國大陸極需彌補資源和技術的缺口，因此中共在 2001 年的「十五計劃」(2001-2005 年)中提出：「實施『走出去』戰略,鼓勵能夠發揮我國比較優勢的對外投資，擴大國際經濟技術的合作領域，途徑和方式。繼續發展對外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鼓勵有競爭優勢的企業展開境外加工貿易，帶動產品，服務和技術出口。支持到境外合作，開發國內短缺資源，促進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和資源置換。鼓勵企業利用國外智力資源，在境外設立研究開發機構和設計中心。支持有實力的企業跨國經營，實現國際化發展」。在「十五計劃」的政策推動下，中國大陸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自 2002 年後呈逐年走高的態勢。依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統計資料，中國大陸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走勢在 1990-2001 年間起伏不定; 2002 年以後呈穩定成長之勢, 2002 年為 25 億美元，2012 年為 842 億美元。2002-2012 年間中國大陸對外投資流量請參閱附圖一。

就投資區域而言，中國大陸做為開發中國家，在直接海外投資的區域選擇上是既投資已開發國家，也投資開發中國家。就投資產業而言，是從資源開發，生產製造，運輸，貿易無所不包。但就中國大陸整體海外直接投資而言，非洲的直接投資佔很小的比重。

但 2006 年以來中國大陸在非洲的經濟援助和資源投資，突然引起西方媒體注意並稱之為中國對非洲的「新殖民主義」。[7]實況為何？中國大陸在非洲的投資是殖民主義行為嗎？或者這僅是因為中國大陸在非洲的商業行為觸動了西方國家原有的利益格局？今日的中共已遠離「革命輸出年代」,縱然對外經濟活動免不了帶有經濟外交的意涵。但取得最大化的經濟利益，可能才是中國大陸「走出去」戰略的初衷。

---

[6]「十四，十五大政治報告」，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

[7]中央社引用外電報導：...中國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義, (2007 年 8 月 2 日),
http://www.cooloud.org.tw/node/7321。
2011 年 6 月 14 日，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在贊比亞首都盧卡薩稱：中國在不斷加強與非洲關係時，非洲必須警惕新殖民主義出現。http://www.phtv.ifeng.com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全球化和經濟自由化的驅動下，1980 年代中期開發中國家開始參與海外直接投資。當時在美國市場端，用擠壓消費品製造成本，以擴大消費市場策略之下，要求東亞國家勞動密集產業向要素價格低廉的中國大陸和東南亞轉移。等到金磚四國崛起，開發中國家向海外直接投資的主角轉而以金磚四國為主。這其中以中國大陸的對海外直接投資最受矚目，並屢有爭議搬上檯面。例如 2005 年，中海油以 185 億美元標購美國加洲聯合石油公司(UNOCAL),美國國會以安全為由致使併購案作罷。

新興市場經濟體向海外投資不僅是參與全球經濟，更重要的是經由對外投資擴展在區域和全球的市場。[8]中國大陸對外投資的目的除企業以開發市場為主要動機外，在政策指導上更著重於資源，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取得。因此中國大陸對外投資的戰略意涵在於：利用國外資源，彌補國內的不足；引進技術，設備，學習管理經驗；輸出過剩產能，促進產業結構調整；促進國際收支平衡。這也是非洲佔中國大陸對外直接投資比例不高的原因。

但西方國家為什麼要指責中國大陸在非洲實行新殖民主義呢?我們可以從多個途徑去解釋，例如經濟意識形態的歧異，政治體制的差別等。本論文假設：中國大陸在非洲的投資是以經濟安全和利益最大化為主要目的，但在實際做法上有高度歷史制度主義的路徑依賴。在此假設基礎上，本論文從回顧中共政權和非洲的關係，到改革開放後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驅動下對外投資政策的轉變，以探索中國大陸對非洲投資的政策機制，投資模式和動機。以評估中國大陸對非洲投資的具體成效和限制，以為深入研究中國大陸對非洲的政治經濟發展影響的參考。

第二節，研究範圍

要研究當前中國大陸在非洲的直接投資，不可忽略歷史的延續性，一方面因為中共在政經決策上有強烈的路徑依賴慣性，同時當前中國大陸在非洲的經濟活動是鑲嵌在制度和援助的框架中。因此本論文會簡略回顧 1955 年萬隆會議以來，中共的對非政策和援助，及改革開放之後政策的轉變，新的對非洲經濟外交機制的建立。但本論文將研究重點置於 2000 年到 2012 年期間中國大陸對非洲的直接投資上。正如前述，中國大陸在非洲的投資面向不一，途徑各異有些是以基

[8]Address delivered by Shri. Harun R Khan, Deputy Governor, Reserve Bank of India, Mumbai on March 2, 2012.
http://ribidocs.rbi.org.in/rodcs/speeches/PDFs/OV27022012.pdf

礎建設援建切入，換取資源開採權，有些又以合資入股進入能源產業。況且中國大陸在非洲投資的企業又可區分為國企和私營企業，而投資領域廣泛，遍及採礦，製造，批發零售，交通運輸及金融服務業。本論文置研究於非金融類投資上。至於在產業選擇上，本論文側重挑選國有企業中，在非洲具代表性的企業做個案分析。因此本論文以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做為個案，分析他們在非洲的業務情況，他們的業務和國家政策是否存在內在連結。在民營企業領域，本論文選華堅鞋業做個案研究。

雖然我們通常把非洲視為一個整體，但非洲是面積 3020 萬平方公里，10 億人口的世界第二大洲，他由 54 個國家組成。中國大陸對外投資在非洲的覆蓋率，於 2011 年高達 85%;2012 年在非洲的礦產投資覆蓋率達 40%;工程承包覆蓋率為 73%。[9]因此非洲做為整體，其中存在個體的特殊性。本論文將以 UNCTAD-The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3 選出的海外直接投資回報最高 20 國中的四個非洲國家之中的三個國家，安哥拉(Angola),尼日利亞(Nigeria)，贊比亞(Zambia) 外加蘇丹(Sudan)做為個案，以探討中國大陸在非洲投資的模式及成效。

有關中國大陸在非洲投資的數據資料，主要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所發佈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和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UNCTAD)所發表的「世界投資報告」做為分析基礎。對非洲國家個案研究的相關數據，以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有關資料為分析基礎。為避免引用不同數據來源，所導致的落差，在比較分析相同變項時，本論文將採用相同數據來源。為行文方便文中所提及的非洲國名，以大陸中文譯名和英文併用。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9]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2011 年度中國對外投資統計公報**,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gzyb/bolian/20130923082710756.pdf
李國學，王永中，張明，「2013 年第 1 季度中國對外投資報告」,
http://www.iwep.org.cn/upload/2013/03/d20130327145530252.pdf
覆蓋率是度量測試完整性的手段，它反映某件事物佔整體的百分比。以中國大陸對非洲的投資覆蓋率為例，是表達中國大陸在非洲的投資國家數佔非洲國家總數的百分比。

第二章　理論回顧與文獻探討

Paul N. Doremus 認為外國直接投資的行為主體-跨國公司，不過是具有海外業務的國內公司，母國的經濟結構及經濟意識形態，對跨國公司的策略及行動產生極大的影響。不同國籍的跨國公司在策略及行為上的差別，反映各國的制度性結構，經濟政策及社會特性。[10]

由於非洲處於相對貧窮的情況，前殖民地宗主國和新興經濟體在對非洲進行投資時，也同時給予經濟援助。這種情況下，各國對非洲的投資是鑲嵌在各國或國際組織的制度和援助條件的框架之中。再加上中國大陸被視為國家資本主義政權，[11]因此在理論回顧範疇中，將先釐清新殖民主義指涉為何，再就國際政治經濟學和海外直接投資的理論研究做文獻回顧，並整理大陸和西方學界的相關研究，以作為本論文的研究基礎，以有助於對中國大陸在非洲的投資狀況的瞭解和評估。

第一節　理論回顧

一，新殖民主義

新殖民主義一詞最早出現於 1961 年 3 月，在開羅召開的第三屆全非人民大會通過的有關新殖民主義決議。新殖民主義主要是指，前殖民地獨立建國後，前殖民母體改變殖民主義時代強佔土地，剝削當地人民，掠奪資源的手段。轉為以強佔市場，掠奪資源的經濟殖民主義。新殖民主義的代表性論述是 1965 年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的著作〝新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最後階段〞(New-Colonialism , the Last Stage of Imperialism)。他在書中闡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要維持福利國家制度，又要因應冷戰格局下的軍備負擔，而從殖民統治取得利益的模式已不再有效。因此前西方殖民國家就轉而以國際金融機構控制前殖民地國家以獲取最大利益，支應資金需求。由於發達國家的資本進入不發達地區的目的是剝削，而非發展。因此在新殖民主義控制下，投資的後果反而擴

---

[10]陳怡伸，張晉閣，許孝慈譯，羅伯特.吉爾平著，**全球政治經濟-掌握國際經濟秩序** (台北：桂冠圖書，2004 年 1 月)，頁 351,362-364。

[11]Xing, Li,"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State Capitalism,"
描述中國大陸國家資本主義的形成和可能的轉型途徑。
http://journals.aau.dk/index.php/jcir/artical/download/218/155

大了窮國和富國的差距。更重要的是新殖民主義不但進行經濟剝削，更以「文化霸權」滲透，壟斷當地的價值觀，意識形態和文化活動。[12]

另外，古典依賴理論學者阿敏(Samir Amin)從資本主義的全球累積出發，認為核心國家的發展是以邊陲國家的低度發展而取得的。 這種核心和邊陲關係構成了資本主義體系，因此邊陲國家的問題不在進入資本主義階段，而在核心和邊陲的不平等的關係。造成這種支配與剝削關係的動力在價值轉移(transfer of value),即以先進生產方式進入邊陲生產，再經由低工資勞工的高生產力,把價值轉回核心國家。阿敏在 1971 年分析西非前法屬殖民地獨立前後的經濟發展，認為非洲要依賴外國發展資本是不可能的。他認為：除了對資本主義中心國家的依賴是不發展的原因外；邊陲國家由於國內經濟體系的脫節，不能形成在經濟意義上完整的國內市場，使輕工業發展無法產生外溢效應，也是不發展的因素之一。[13]

二，歷史制度主義

歷史制度主義是新制度主義的分析途徑之一，其特徵在將制度組織和政治經濟結構視為建構集體行為並產生差異性的決定性因素。歷史制度主義將制度界定為嵌入政體或政治經濟結構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程序，規則，規範和慣例。因此歷史制度主義的制度範圍是相對廣泛的。在分析的範疇上，歷史制度主義有四個主要的特點：傾向於在廣泛的意義上，界定人和制度的相互關係；強調制度運作和產生過程中權力的非對稱性；強調制度建立和發展過程的路徑依賴和意外後果；在研究上著重整合制度分析和產生政治後果的其他因素。對制度如何影響人的行為，新制度主義提出兩種途徑，「文化途徑」和「算計途徑」。「文化途徑」認為個人行為是意識形態/世界觀的產物。「算計途徑」則認為個人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時，制度提供其他行動者的相關資訊，形塑行動者的策略。

制度為什麼會形成規則化的路徑依賴呢？「文化途徑」認為，由於制度是集體行為的構成要素，除非突發/意外因素造成歷史斷裂。由於制度的抗拒本質會塑造具體選擇，不可能被某些行動或個體改變。「算計途徑」則認為，個體依循制度是因為偏離制度的個體情況會更糟。因此制度的活力，取決於解決集體困境的能力。歷史制度主義在操作上，通常在兩者之間隨意選用。另外，歷史制度

[12]趙希方, **後殖民理論**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 10 月),頁 29-33。

[13]趙希方趙, 同前揭書, 頁 34-35。王佳煌，**國家發展** (台北：臺灣書店，中華民國 87 年 3 月), 頁 63-68。

主義強調社會因果關係中的「路徑依賴」,因為過去制度與現在的觀念信仰存在相互連結，成為路徑發展的相對穩定的核心因素。[14]

三，國際政治經濟學

政治經濟學關注於政治和經濟的交集，或政治在經濟過程中的角色。政治會受經濟發展的影響，而經濟運行則相當依賴政治發展的情況。因此可將政治經濟學界定為市場機能和國家之間的互動。而政治經濟學詮釋的核心概念是以市場鑲嵌在更大的社會政治體系中為基礎。而國家和市場的共存和相互作用，即為國家以政策和政治利益來影響經濟活動及其成本和利潤的分配。而市場和經濟力量也影響國家和政治行動主體間權力和福利的分配。[15] 國際政治經濟學是政治經濟學的代表性學派之一，把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焦點延伸到國際層面。國際政治經濟學對如何處理國際政治和經濟關係，有兩種看法：吉爾平(Robert Gilpin)認為國際政治經濟學是在分析國際政治和國際經濟的相互作用；斯特蘭奇(Susan Strange)把國際政治經濟學當作分析政治機構和市場力量間相互影響的「分析架構」。[16]

吉爾平認為在過去一百五十年中，人類生活受自由主義，民族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在道德和知識上的分歧而被分化了。這種分歧主要表現在社會組織和經濟事務對市場的角色和意義上。在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不免也受到這三種意識形態影響。

(一) 政治經濟學的三種觀點[17]

當前在全球化帶動的經濟和技術相互依存環境下，貿易，金融和對外投資能輕易的跨越國境，脫離政治控制，進行產業價值鏈整合，追求利潤最大化。國家則力圖控制經濟成長與資本積累的過程，以利用經濟活動為國家利益服務。因此，吉爾平認為：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的因果關係；經濟變化和政治變化的影響；

---

[14]薛曉源，陳家剛主編，**全球化與新制度主義**（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 4 月），頁 195-211。

[15]楊宇光譯，羅伯特.吉爾平著，**國際關係政治經濟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 10 月），頁 1-2。

[16]張亞中主編，**國際關係總論**（台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 2 月），頁 266-267。

[17]楊宇光譯，羅伯特.吉爾平著，同前揭書，頁 24-39。

世界市場經濟對國際間財富分配，對個別國家經濟發展和經濟福利的影響；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理論問題。對這些經濟和政治事務間關係，有三種對立的觀點，被人類社會曾經或正在實踐的信念。

1，經濟自由主義

經濟自由主義從經濟角度看國際政治，堅信自由市場力量最終將糾正不理性的政治考量。相信行為者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選擇，反對任何形式的市場干預。主張自由貿易，認為國際貿易是互惠互利行為，有助於國際的和平。

經濟自由主義是和政治自由主義共同發展，並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經過長期發展經濟自由主義已形成多種類型的自由主義流派，如古典學派，新古典學派，凱因斯主義學派和貨幣主義學派等。各學派在觀點上各有側重，有的注重平等，主張以社會民主與國家干預來達到目標；有的主張自由與非國家干預，認為經濟發展，必將以經濟平等為代價。但所有的經濟自由主義都同意，市場和價格機制是處理國內和國際經濟最有效的手段。而市場是為滿足人類需求而自發產生的，並按照自身的規律發展。而市場體系的基本原理在增加經濟效益，加速經濟成長，進而改善人類福祉。

經濟自由主義基本上有四個基本假設：首先，每個消費者，家庭或公司是社會的基礎，並都是理性的行為者，努力以最小的花費以取得最大的價值，但動機理性並不能保證結果；其次，從長遠觀點看，市場經濟的趨勢是平衡與內在穩定，這在市場營運及制約各種市場法則實施的基本思想中是非常重要的概念；第三，在市場競爭條件下，生產者與消費者利益有長期協調一致性，並遠勝於任何暫時利益衝突的協調一致性；最後，經濟將持續發展，並表現在人均財富的增長上。

在以上假設下，經濟自由主義相信貿易及相互依存關係帶來的互惠將有助於鞏固國家的合作，對維持現狀提供了保證。經濟自由主義者相信市場力量是理性，無法抗拒的力量。因此經濟自由主義在國家發展上，不認為政治因素可起到決定性因素，而主張以開放的態度接受外國的資金和技術援助才是達致國家發展的正確途徑。

2，經濟民族主義

經濟民族主義的中心思想是經濟活動要為國家建設服務，政治因素決定經濟關係。經濟民族主義因內容不同，曾以多種形式出現：經濟重商主義，工業重商主義，現代則以〝策略貿易理論〞成為新重商主義的特色。但不論以何種內容出現，經濟民族主義始終堅持國家權力和國家獨立性。經濟民族主義的目標是工業化，其理由在於工業化的溢出效應，會促進經濟總體發展，能鞏固政治自主權和國家安全。

重商主義是經濟民族主義的一個面向。重商主義強調為追求國家利益極大化，市場要服從國家利益。在德意志發展工業階段，李斯特（Friedrich List）主張以國家干預來保護本國新興產業免於國外競爭，是重商主義實踐的典型。[18]二十世紀以來，重商主義政策轉向關稅，非關稅障礙，配額，貿易管制及軍經援助等對外政策上。克魯曼(Paul Krugman)把這些政策稱為策略貿易理論（strategic trade theory）。策略貿易理論主張以行政指導，補貼，優惠稅率扶植高科技和高就業產業以建立寡佔或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環境。[19]

總之經濟民族主義在本質上是反對自由貿易的，認為政府干預有利於產業保持領先，增進社會福祉。如果某個產業對經濟的貢獻大於其他產業，政府應該予以支持以形成對整體經濟的外溢效果與積極的外部效應。

3, 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

馬克思理論的核心是經濟決定論，是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關係。在經濟決定論基礎下，生產關係和生產方式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社會結構不可避免的困境，即階級鬥爭必然發生。列寧的政治經濟學簡言之就是在資本主義不斷擴張下，為尋求市場和原料來源，必然走向帝國主義掠奪，剝削殖民地。而帝國主義之間最終必將爆發衝突。

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架構是以世界整體為途徑，不同於經濟自由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以國家為分析單位。但馬克思主義體系雖以經濟決定論最引人注目，但對國家的有關論述是不容忽視的。基本上，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的工具，國家的功能在迫使受剝削的無產階級乖乖就範，或建立「意識形態」以合理化存在的生產關係。

馬克思主義有四個基本要素：首先，根據辯證唯物論，客觀的現實世界是變動，衝突的。因此經濟自由主義所認定的均衡狀態，是不存在的；其次，根據歷史唯物論，歷史發展是生產力和經濟活動的發展，加上由分配引起的階級鬥爭；第三，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是私有制的生產關係和勞動力商品化，兩者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和資本積累，生產關係的內在矛盾將促使資本主義走上滅亡；相信社會主義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必然凋萎，是由三條經濟規律決定的：首先是不平衡規律，資本主義社會的固有矛盾是商品生產力與消費者購買力之間的不平衡，將造成生產與消費的失調，導致週期性的經濟波動與蕭條；其次，資本主義的動力是在對剩餘價值的追求，但將造成貧富差距日益擴大，最後時機成熟，

---

[18]List, Friedrich, "The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Chapter12 and 26," in Axel Hulsemeyer e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Canad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52-55.

[19]張亞中主編，同前揭書，頁 269-274。

無產階級革命必然爆發；最後，隨著資本積累和富裕增加，利潤逐漸下降，對投資的刺激也逐漸減少，由於利潤下降的趨勢不可免，最終將造成經濟蕭條，失業增加，無產階級終將起而反抗並摧毀資本主義制度。

由於資本主義並未如馬克思的預言而崩潰，列寧提出新的論述，認為資本主義通過帝國主義的擴張，已避開資本主義必然消亡規律的制約。但由於資本主義的經濟成長和資本積累的不相適應，使資本主義國際經濟處於不穩定的狀態。這種不穩定狀態，是資本主義國家間各國力量的不平衡發展所引發的危機，最終將引起帝國主義之間的衝突，導致資本主義滅亡。列寧把對資本主義的的經濟性批判，轉為對競爭性重商主義民族國家的政治性批判。總的來說，列寧認為資本主義為追求利潤和資本積累，造成工業技術擴散，促進了世界發展。但也為自己創造了競爭對手，激烈的經濟競爭最終將引發戰爭。[20]

1960 年代中期，一種馬克斯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混合的依賴理論興起。依賴理論從馬克斯主義汲取對資本帝國主義的理論，著眼於拉丁美洲國家的發展和國內財富分配。依賴理論的核心是資本主義核心和邊陲的剝削關係，和邊陲對核心的依賴。各種不同的依賴理論研究者都認為拉美國家的不發展是淵源於資本主義體系的外部力量，而不是這些國家的政策本身。直到卡多索（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提出依賴發展理論，雖延續古典依賴理論帝國主義核心國家支配世界經濟的觀點，但強調邊陲國家可以在依賴狀況下取得片面發展。卡多索把依賴和發展視為邊陲經濟透過工業化與世界市場整合的過程，在一定條件下開發中國家可以利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依賴關係來發展經濟，並逐步脫離依賴。[21]

（二）國際政治經濟學：跨國公司的論述

跨國公司做為海外直接投資的行動者，有必要在此對有關跨國公司的論述做個簡要的回顧。跨國公司被定義為特定國籍的公司，在一個以上的其他國家設有子公司並擁有全部或部分經營權。跨國公司經由海外直接投資，以併購或興建以在地主國從事生產，服務和市場開發業務。[22]

二戰之後，跨國公司開始整合國際貿易和外來直接投資，此時大多數經濟學家都認同孟代爾（ Robert Mundell ）從赫克紹-歐林定理出發，推論出的「孟代

[20]楊宇光譯，羅伯特.吉爾平著，同前揭書，頁 43-45。

[21]張亞中主編，同前揭書，頁 288-290。

[22]陳怡伸，張晉閣，許孝慈譯，羅伯特.吉爾平著，全球政治經濟-掌握國際經濟秩序(台北：桂冠圖書有限公司，2004 年 1 月),頁 337。

爾同值定律」(Mundell equivalency),即生產要素的交易和產品的交易，兩種貿易型態效果相同，是可以相互替換的。[23]因此透過海外投資進行國際轉移,其影響不亞於貨物在國際間的流通。換言之基於生產因素所進行的專業分工，可透過海外投資來加以推動。除了 Robert Mundell 的洞見外，Raymond Vernon 的產品循環理論， John Dunning 提出的折衷理論和 Michael Porter 的競爭優勢理論也都從不同視角提出跨國公司遂行海外投資的動因。

在政治經濟學中對跨國公司的理論論述可分為: 準馬克斯主義批判及國家中心論。以下即分別概述兩種理論對跨國公司的看法。

1, 準馬克斯主義研究途徑

Stephen Hymer 認為跨國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資除了是企業的擴張策略之外，也代表企業為了掌控海外生產和其他相關設施的企圖心。他運用產業組織理論和折衷理論研究跨國公司，認為美國企業進行海外投資，主要目的在建立企業的壟斷性優勢。他認為具有壟斷特質的跨國公司，將循兩個基本規律發展: 首先，跨國公司在發展擴大中，將建立一種科層型態的核心/邊陲結構及全球性國際分工；其次以依賴理論為基礎，北半球核心的發展和南半球邊陲的落後，成為跨國企業發展主導下發展的一體兩面。[24]

2, 國家中心論的研究途徑

國家中心論強調跨國公司的崛起，取決於有利的國際政治環境。簡言之，當前有利跨國公司發展的經濟體系，是因為有利於資本主義強權的利益而得以建立和維持。另外國家中心論者認為：跨國公司本質上是反映本國的社會，經濟及文化價值。不論跨國公司如何強調國際化，實際上是本國經濟，文化和歷史的產物。[25]

四，主要對外直接投資理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學者以貿易理論解釋國際投資。但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跨國公司向全球擴張，逐漸發展出眾多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流派。這些理論主要可分為決定跨國公司直接對外投資的動機因素，和外國直接投資對

[23]陳怡伸，張晉閣，許孝慈譯，羅伯特.吉爾平著，同前揭書，頁 339-340。
[24]陳怡伸，張晉閣，許孝慈譯，羅伯特.吉爾平著，同前揭書，頁 348-350
[25]陳怡伸，張晉閣，許孝慈譯，羅伯特.吉爾平著，同前揭書，頁 351-352。

地主國的影響兩類。本論文探討的理論文獻集中在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因素上。[26]

(一) 產品循環理論(product life cycle)

Raymond Veron 於 1966 年提出產品循環理論，以動態的觀點看企業的海外投資行為。產品循環理論認為：每項產品都有相同的生命週期，所有產品都從研發開始，進入產品成熟期，漸漸消失優勢，最後被取代。在產品生命週期的初期，企業以本國為生產基地，製造和出口新產品。在一段時間以後，產品趨於成熟，生產過程標準化，技術向外流通及海外需求擴張，促使模仿者競相投入市場。此時，原先的創新者必須在海外建立生產線，以阻止外國競爭者進入市場或削弱對方的優勢。依據產品循環理論的觀點，跨國公司是以海外直接投資，作為競爭的工具，以維持本身的市場優勢。[27]

除產品循環理論外，自 1960 年代以來經濟學者分別從產業組織理論和國際貿易理論途徑，分別發展出不同的國際投資理論，用來解釋跨國企業對海外投資的動機，區位選擇，對本國和接受投資國的影響。以下將略述各理論的概要。Stephen Hymer 於 1960 年提出壟斷優勢理論(specific advantage theory)，企業之所以進行海外投資，是要利用本身的壟斷優勢來消除外部市場的不完全性。因此企業是以拓展海外市場，作為規避競爭，提高穫利的手段。Peter Buckley 和 Mark Casson 於 1976 年提出內部化理論(internalization theroy)，以交易成本的概念用來解釋企業海外投資。認為市場的不完全性(主要指中間產品交易的不完全競爭)導致壟斷，增加企業的交易成本，而海外直接投資則是將外部市場交易轉為企業的內部交易，形成內部化市場以降低成本。[28]

(二) 比較優勢理論

日本學者小島清(Kiyoshi Kojima)在 1977 年提出比較優勢理論，又稱邊際產業擴張理論。他比較美國和日本企業的海外投資，認為對海外直接投資不能僅從微觀的壟斷優勢出發，還要考量宏觀的國際分工原則。他以日本為例，日本將喪失比較優勢的產業移往具比較優勢的地主國，而在本土則集中發展更具比較優勢的產業。[29]

---

[26]沈桂龍，中國 FDI 績效研究 (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 年 12 月),頁 12-13。

[27]沈桂龍，同前揭書, 頁 37-40。

[28]沈桂龍，同前揭書, 頁 34-36。

[29]趙曉笛，同前揭書, 頁 5。

(三) 小規模技術理論

小規模技術理論是威爾斯（ Louis T. Wells ）於 1983 年提出。開發中國家對外投資的競爭優勢，在於小規模技術。威爾斯認為開發中國家的企業擁有對小市場服務的生產技術，這些具有勞動密集型特徵的低成本技術，能滿足開發中國家的市場需要。因此開發中國家在引進外國投資時，引進同為開發中國家的投資，由於彼此的相似性，反而對雙方更有利。小規模技術理論說明了全球市場的多元化，開發中國家的企業即使技術經營規模不如已開發國家，仍能找到可發揮比較優勢的海外直接投資區域。[30]

(四) 折衷理論(electic theory)

John H. Dunning 將各種海外投資理論整合，提出折衷理論。折衷理論對大多數的海外投資有較強的解釋性。折衷理論認為企業要從事海外直接投資，必須具備三種優勢。這三個優勢是所有權優勢(owenership advantage)，區位優勢(locational advantage)和內部化優勢(internalization adavantage)。

所有權優勢是指企業擁有或可以取得其他企業沒有或無法取得的資產或資源所有權。這種優勢泛指：廣義的技術優勢：除生產技術外，也包括了專利，研發和行銷的利基和創新；組織管理優勢:生管，行銷和人力資源在系統管理上的優勢。企業規模優勢：企業要大到在生產，研發，行銷上具備規模優勢。金融與貨幣優勢：要有資金實力，具備信用優勢和成本優勢。

內部化優勢意謂著，面對交易市場的不完善，為降低交易成本，企業到海外直接投資。從而把外部市場的中間產品活動內部化，將原來的外部市場轉變為內部市場，以強化自身的競爭力。簡言之，企業為避開市場不完善，將所有權優勢保持在企業的內部。

區位優勢是指企業對海外投資時，考量投資地區所具備的要素稟賦優勢。區位優勢可分為直接區位優勢和間接區位優勢，前者是企業為外部市場的勞動成本，市場進入等因素吸引而前往投資，後者是本國經濟中的不利因素迫使企業對外投資。折衷理論中的三個因素是互相關聯的，只有三個因素都具備時，企業才應進行海外投資以增進企業利益。[31]海外直接投資對交易成本內部化和所有權優勢有正面效益，同時又能夠充分利用地主國廉價勞動力和特有資源。這將使對外直接投資者能創造比投資者母國企業更好的優勢條件。[32]

---

[30]趙曉笛，同前揭書，頁 6-7。

[31]Dunning, John H.,〝The Eclectic Paradigm as Envelope for Economic and Business Theories of MEN Activity,〞*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no.9 (2000),pp.163-190.沈桂龍，前揭書，頁 43-45。

[32]陳怡伸，張晉閣，許孝慈譯，羅伯特.吉爾平著，同前揭書，頁 345-346。

(五) 投資發展周期理論(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

John H. Dunning 於 1980 年代提出投資發展周期理論，認為某個國家的直接投資流入和流出，和該國的經濟發展程度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相關。這是折衷理論的進一步發展，除確認折衷理論三要素的重要性外。Dunning 提出：國際投資發展的 J 曲線，根據人均 GDP 將國家的國際直接投資發展分為四個階段，可從各階段國際投資的流入和流出的關係中，分析開發中國家外資企業和國內企業的影響。[33]1988 年，Dunning 在原來的基礎上，提出第五個階段：[34]

第一階段，為開發中國家海外直接投資進入的初始階段，國家貧窮，少有對外直接投資。由於不具備區位優勢，外資流入很少或沒有。此時淨對外投資為負值。按 1988 年的數據人均 GDP 低於 1110 美元的國家屬於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由於實施進口替代戰略，區位優勢得到改善，外資進入規模不斷擴大。但本國企業技術能力不足，內部化優勢和所有權優勢有限，雖對外直接投資開始出現，但淨對外投資負值仍在增加。按 1988 年的數據,人均 GDP 在 1110-5420 美元的國家屬於此列。

第三階段，國家的生產技術能力提高，某些本土企業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改善，對外直接投資開始大幅增加。但淨對外投資仍為負值，但負值已在縮小。按 1988 年的數據,人均 GDP 在 5420-10919 美元的國家屬於此列。

第四階段，此時國家的淨對外直接投資轉正，本土企業有廣泛的內部化優勢和所有權優勢，並能利用地主國的區位優勢，對外直接投資的成長遂高於外資流入。按 1988 年的數據,人均 GDP 在 10919 美元以上的國家屬於此列。

第五階段，此時對外直接投資與流入直接投資同步成長，淨對外直接投資額波動縮小。進入這個階段的國家，代表國家經濟和企業的國際化，其企業結構和資產結構和已開發國家趨同，國家間的直接投資將趨於平衡。投資發展周期理論主在闡述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入和流出和人均 GDP 存在相互關係。但除人均 GDP 外，國家的發展戰略，政策措施，經濟結構對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都存在某種影響。

(六) 競爭優勢理論(competitive advantage)

1990 年，Michael E. Porter 提出競爭優勢理論。他專注於跨國公司的發展機制，關切的核心問題是：國際競爭環境，企業的競爭戰略和組織結構三者間的

---

[33]趙曉笛，同前揭書，頁 11-17。

[34]Dunning, John H.,"The Electic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 Restatement and Some Possible Extens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 19, No.1 (Spring 1988),pp1-25.

動態調整和相互適應。在他看來，企業對外投資是國內競爭的後果。波特認為企業的組織結構和進行經濟活動的地點選擇，都受到企業策略的影響。而海外直接投資可以使企業具有較本國企業較強的競爭優勢，是在於跨國公司有較多的策略選擇。跨國公司除了利用海外的比較利益之外，並可建立複雜的企業關係網絡及資訊壟斷優勢，使本身佔有產業主導地位。[35]

另外波特(Michael E. Porter)在競爭優勢理論中提出價值鏈的概念，即產品從設計，生產到銷售客服的整個循環過程中，每項活動都可以創造價值，因此各自獨立又相互關聯的生產經營構成了創造價值的動態過程。價值鏈的概念，使企業能從生產經營活動中，各個不同部門間的經濟流動，組織及業務動態的分析中，找出企業的競爭優勢。價值鏈和海外直接投資的關係，在於企業只要控制價值鏈的核心部位，其他部位可以分離出去。因此在低成本和差異化的要求下，零部件生產，產品組裝和製造就被移至海外具比較優勢的地區生產。[36]

中國大陸目前實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雖接受市場機制和利益驅動。但國家仍以指導性計劃引領經濟運行，因此中國大陸的對外直接投資將不僅是追求企業利潤最大而已，其內在的的政治經濟意涵是不容忽略的。在中國大陸現行體制框架下，我們檢視分析中國大陸的對非洲直接投資時，有必要以國際政治經濟學結合國際投資理論的視角下進行。本論文將以經濟民族主義/重商主義結合國際投資理論的框架分析中國大陸在非洲的直接投資。

第二節 中國大陸對非洲直接投資的相關研究

李金珊，張默含認為中國大陸學界在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上，可區分為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維度。宏觀維度的研究集中在中國大陸企業和國家的關係，如研究企業在從事海外投資時政府的政策支持和限制。另外，地主國對外資優惠措施或障礙也在宏觀研究之列。中觀維度的研究聚焦於中國大陸企業海外投資的區位選擇和產業分析。微觀維度則關注於分析中國大陸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和障礙。但中國大陸在對非洲的直接投資研究上，大多著眼於對投資現狀，風險和投資模式的分析。很少有完全從宏觀維度或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視角，對非洲的投資進行分析。[37]

---

[35]沈桂龍，同前揭書, 頁 50-51。

[36]張娟，**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研究：基於價值鏈的視角** (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8 年 11 月),頁 28-33。

[37]李金珊，張默含,「中國對外投資宏觀,中觀與微觀研究述評」, **現代管理科學** (南京), 2012 年第 2 期，頁 6-8。

一，宏觀研究及海外投資理論對現狀的適用性

陳大文，劉靜，鄧竟成認為中國企業對非洲直接投資以綠地投資為主，適用小規模技術理論。[38]李芳桂，儲賀軍提出：「中國和非洲 26 個國家簽定了雙邊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與 8 個國家簽訂了避免雙重課稅協定」。並認為小島清的比較優勢理論，符合中國大陸產業發展的實際，中國大陸企業選擇非洲為投資區域是至當的。[39]姚梅桂認為，〝資源-信貸-項目〞一攬子合作模式和經貿合作區模式是中國對非洲投資實踐中形成的具有戰略性，獨有的合作模式。然而面對外部環境變化，中國大陸應順應非洲需求，與當地經濟社會融合；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支持民營企業做大做強。以開放的心態支持國際合作，這是中國大陸未來必走的道路。[40]

二，中觀層面對非洲投資的現狀，特點和產業分析

董艷，張大永，蔡棟梁經由實證研究發現：中國大陸對外直接投資目標國家的市場規模和基礎建設會顯著影響投資決策；能源是吸引投資者的重要影響因素；對投資者來說，地主國的經濟，法律和政治環境都是十分重要的因素；最後，中國大陸的投資者對非洲國家沒有明顯的偏好。中國大陸投資者投資非洲國家的因素為：地主國的市場規模，基礎設施及能源儲量。同時，中國大陸投資者對地主國的風險認識不足。[41]

潘宏和陳天香分析了非洲的主要區域和行業的特點，認為雙方具有互補性，但非洲國家政，經情勢，基礎設施，財稅政策各不相同。企業在投資前要謹慎選

---

[38]陳大文，劉靜，鄧竟成,「中國企業對非洲直接投資的發展及其影響」, **黑龍江對外經貿** (哈爾濱) 2007 年，第 9 期，頁 32-34。

[39]李芳桂, 儲賀軍, **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分析報告:2010**(北京: 中國經濟出版社, 2010 年 6 月) 頁 162-163。

[40]姚梅桂，「中國對非洲投資合作的主要模式及挑戰」, http://qk.cass.cn/xyfz/201310/p0201310214819009737.pdf

[41]董艷，張大永，蔡棟梁，「走進非洲：中國對非洲投資決定因素的實證研究」, **經濟學** (北京) 第 19 卷第 2 期(2011 年 1 月)，頁 675-690. http://www.nsd.edu.cn/cn/download/ceq/10_2/14.pdf

擇，切不可盲目投資。在投資行業上，以資源開發，基礎設施建設，農業和製造業是適合中資投資的行業。[42]

張娟，劉鑽石分析中國大陸對非洲的資源尋求戰略，雖然中國大陸對非洲的直接投資佔中國大陸對外直接投資的比重很低，但由於中國大陸對自然資源的持續需求，非洲豐富的自然資源對中國大陸的資本極具吸引力。中國大陸對非洲的資源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是在國家戰略利益驅動下，由國有企業負責執行。由於企業的經濟行為是嵌入在關係網絡和制度之中，因此由援建-貿易-投資建構的社會關係網絡將有助於瞭解中資在非洲的資源投資模式。中國大陸在非洲的政治經濟模式，是通過貿易，投資和援助構建社會網絡，以經濟一體化和發展貿易關係，與非洲建立長期能源供需關係。援建項目下，承包工程建立的中非網絡關係是中非開發合作的基礎。中國進出口銀行和國家開發銀行則對工程項目提供融資，並要求採購一定數量的中國設備。因此中國大陸的設備供應商也被納入中國大陸在非洲的援助，投資和貿易網絡。因此銀行成為中非網絡關係的核心。然後再以基礎設施開發交換自然資源開採權，這樣中國大陸在非洲的資源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就和對外援助密切相關。而中國大陸對自然資源的持續需求，促成中國大陸對非洲日益增加的投資。而中非關係又影響中國大陸企業在非洲投資的社會網絡。雖然非洲精英階層對中資企業抱持歡迎的態度，但當地企業和工會害怕被擠出市場，對中國企業迭有抱怨。同時中國大陸大型國企是依政治關係進入非洲，並不融入當地。更由於文化差異，使中國大陸企業和員工間缺乏合作，並極少僱用當地勞工，這些都遭到當地和西方媒體批評。[43]

劉鴻武，王濤分析非洲投資市場及中國大陸在非洲的投資前景，認為非洲的發展需要大量外資，隨著非洲經濟成長及投資環境改善，中國大陸企業的投資機會，將愈來愈多。私營企業在非洲的投資，有平衡中非貿易結構，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及改善民生的功效。但中非雙方更要進一步完善中非雙方國內經濟體制和管理制度，以避免雙方在經濟交往中產生的負面效應，為雙方經濟發展帶來新的挑戰。[44]

徐玲提出中國跨國公司在非洲投資的產業選擇，認為要根據非洲國家的產業需求，結合中國跨國公司的戰略優勢領域，在基礎設施，製造業和電子資訊產業

---

[42]潘宏，陳天香,「中國企業對非洲投資的策略選擇」,**商場現代化** (北京), 2008 年 7 月，頁 187-188。

[43]張娟，劉鑽石，「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與資源尋求戰略」,**世界經濟研究** (上海), 2012 年第 3 期，頁 75-81。

[44]劉宏武，王濤，「中國私營企業投資非洲現狀與趨勢分析」,**浙江師範大學學報** (金華), 2008 年第 5 期,頁 36-42。

進行有效對接。因此中國大陸的出口導向公司，應憑藉本身的技術和管理優勢，到非洲參與市場競爭，創造新的利潤增長點。至於勞動密集型產業，應專注前端研發設計及後端銷售，把中間生產環節向具比較優勢的非洲國家轉移，以提昇企業競爭優勢。而技術服務型公司，應把握對非洲的援建項目，輸出勞動力。高科技產業應積極介入非洲市場，以國際化和本土化相結合，培育非洲市場。徐玲認為中國跨國公司的戰略經營領域和非洲的產業發展需求有很大的一致性，這為雙方的合作奠定了基礎。[45]陳宗德分析非洲市場的投資環境，認為非洲需要大量外資協助振興經濟，隨著非洲經濟成長和投資環境的改善，將為中資提供更多的投資機會。[46]

三，微觀層面直接投資的動機和障礙

書雨分析了中國大陸中小企業對非洲投資的現狀，認為非洲投資效益為 36%，遠高於全球平均的 14%。同時非洲國家為吸引外資，提供各種補貼和政策優惠，加上非洲國家普遍經濟結構單一，工業基礎薄弱，中非間的產業有長期互補性。固然對非洲投資不可輕忽外部風險，但中國大陸私營企業對非洲投資不可太過保守，目前非洲每年約有 1700 億美元的進口金額，到 2025 年預計將達到 4800 億美元，目前中國大陸在非洲的貿易額只有 300 億美元，實在大有可為。隨著中非論壇北京峰會的政策落實，尤其經貿園區建設可望為中國大陸民間企業帶來新的機遇，相信有越來越多的民間資本進入非洲。[47]

唐曉陽認為，中非經貿合作區是中非經濟合作的新模式。由於經濟特區是有中國特色的發展模式，非洲國家期望複製這一模式，促進國家經濟發展。中國大陸企業也希望利用工業區增強在非洲的競爭力。目前在非洲的經貿合作區已開始運營。對中非經貿關係和地主國經濟發展的意義將是長期和多方面的。但不可避免的，在過程中將存在問題與挑戰。因此，雙方政府和企業間的密切溝通和協調將是經貿合作區未來成功的關鍵。[48]

---

[45]徐玲，「中國跨國公司投資非洲產業選擇」,**經濟前沿** (廣州), 2008 年第 z1 期，頁 81-84。

[46]陳宗德,「非洲投資市場及我國對非洲投資概析」,**西亞非洲** (北京), 2004 年第 1 期,頁 46-54。

[47]書雨，「中小企業非洲攻略」,**中國中小企業** (北京), 2006 年 12 月，頁 18-22。

[48]唐曉陽，「中國在非洲的經貿合作區發展淺析」，西亞非洲（北京），2010 年第 11 期（2010 年 11 月），頁 17-22。

張艷茹介紹浙商投資非洲的現況，從內外因角度探討浙商投資非洲的原因。認為浙商投資非洲的內因為：在走出去戰略下，浙江政府鼓勵浙商向外投資；浙江企業面臨產業升級壓力，促使浙商向非洲投資，尋求出路。而外因則是非洲資源豐富，市場廣大和各種稅費優惠吸引浙商前去投資。同時文中亦提出對投資風險的相應解決之道。[49]

第三節 西方有關中國大陸在非洲投資的研究

Peter J. Buckley , Jeremy Clegg , Adam R. Cross , Xin Lui , Hinrich Voss and Ping Zheng 從內部化理論探討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決定性因素。發現中國大陸的海外直接投資雖可被傳統理論解釋，但也含有中國特色。中國特色的形成是基於國內制度，地主國的海外僑民和對風險的偏好。[50]

Bala Ramasamy , Matthew Yeung and Sylvie Laforet 認為中國大陸的跨國公司挑戰了國際投資理論，因為中資企業並不具備所有權優勢。而且經過實證研究發現，中國大陸企業對海外投資區域選擇，不符主流文獻。但中國大陸私營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和地區選擇是切合理論的。一般而言，中國大陸的海外直接投資是依循弗農(Veron)的產品循環論而進行。但投資上游產業，控制進口來源只在私企具有重要性。中央國企傾向投資富國，而地方國企和民營企業投資新興市場是出於企業優勢受限。國有企業意圖經由對外投資取得技術，品牌，行銷及管理技巧，不僅為在全球競爭，也涉及國內市場的競爭因素。但私企在意於市場擴張。[51]

Daouda Cisse and Ross Anthony 描述分析中國大陸在非洲石油和服務領域的投資，認為中國公司的全球化是在政府政策和財務支持，才得以克服後進者的劣勢進入國際市場。非洲國家的電信自由化，使非洲電信市場快速成長，也使價格競爭更激烈。華為和中興以新進的競爭者之姿，聚焦於鄉村市場，除了做基礎工程外並要創新經營模式，以建立競爭優勢，如低價手機，行動轉帳和購物。這些客製化服務，縮短了非洲的城鄉差距，更為華為和中興創造了市場利基。但除聚焦於顧客導向，和區域電信營運商合作以取得信賴外，更由於和中國大陸的政

---

[49]張艷茹，「浙商投資非洲之策略」,**企業經濟** (南昌)，2008 年第 8 期，頁 156-158。

[50]Buckley, Peter J., Jeremy Clegg , Adam R. Cross , Xin Lui , Hinrich Voss and Ping ，"The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investment". http://dx.dol.org/10.1057/palgrave.jibs8400227

[51]Buckley, Bala, Matthew Yeung and Sylvie Laforet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ocation choice and firm owenership",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47 (2012),pp.17-25.

治經濟連結而穫利，如不干涉非洲國家的政治；政府的財務支持，使電信商能低價競爭；中國政府對非洲國家的工程項目和發展協助，有助於中國大陸企業取得生意。至於中國大陸在非洲的能源投資，西方誇大了中國石油企業在國家戰略中的角色(西方國家認為中國大陸國企是國家佈署在資源安全領域的武器)。中國石油企業在國外開採的石油是賣到國際市場而非運回國內; 同時中國石油企業在非洲的配合對象多元化，有和地主國石油公司合作如安哥拉的 Sonangol 和蘇丹的 Sudapet，有和西方國家石油公司合作，如和愛爾蘭的 Tullow 及法國的 Total SA 共同開發烏干達 Albertine 盆地的油田。中國石油企業在非洲投資是循市場因素挑選合作夥伴，而非政治因素。當然不可否認政府對國企的指導關係，但從更大的脈絡看，西方國家的政府和石油公司在國際石油投資上也是綁在一起的。當然在投資過程中，中國大陸企業得到政府的實質支持，如非洲政府得到中方貸款以購電信設備(貸款分別來自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發展銀行，中非發展基金等機構)。在石油領域，中國政府提供類似的信用額度進行基礎建設以交換在石油。2005 年，中海油併購 Unocal 被美國國會否決，在過程中 CNOOC 並未事先向政府報告，這充分反映國企商業利益導向的特性。[52]

Namukale Chintu and Peter J. Williamson 分析中國大陸國有企業在非洲投資的動機。認為中國大陸在非洲的投資被形容為是一種新興強權的政治戰略意圖是誤解，其實中國大陸在非洲的資源投資僅是因為本身資源匱乏和強烈的經濟發展需求所推動的。中國大陸對非洲礦業參與方式可區分為綠地投資，併購和股份投資。國有企業從中非發展基金，中國進出口銀行和工商銀行取得所需資金。中國大陸國有企業在非洲面對缺乏透明度及腐敗的指控。事實上，西方國家亦不能免於商業腐敗，在 2012 年 12 月,Eurasian Natural Resource Corporation 和剛果民主共和國涉及腐敗的對象進行私下交易。嘉能可公司(Glencore)和贊比亞政府有關逃稅的爭執都是例子。至於環境和勞工議題，環保爭議是大問題，但也有正面訊息，如中石油在蘇丹建立了全世界最大的生物分解廢水處理設施以消除汙染。在勞工管理上，贊比亞 Chambishi 礦場於 2006 年 13 名工人被殺，2011 年千名罷工工人被解僱。但這些也不僅是在中國大陸國企才會發生，瑞士 Xtrata 佔最大股份的南非 Lonmin 礦業於 2012 年 8 月殺了 34 名罷工工人。美國投資的 AngloGold Ashanti and Goldfields 由於非法罷工開除了 35000 名工人。其實

---

[52] Cisse, Daouda and Ross Anthony,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Africa: Entreprenners or Long Arm of the State?" *Ivey Business Journal* (July / Augst 2013), pp.121-132.

有關中海併購 UNOCAL 請參閱 " China's CNOOC drops bid for Unocal ", NBC NEWS.com, http://www.nbcnews.com

中國大陸企業在非洲的主要問題是對在地環境和文化不熟悉，及缺乏海外操作的經驗，使中國大陸在非洲走的並不平順。[53]

Jing Gu 評估中國大陸私營企業在非洲投資的特性，動機和衝擊。發現中國大陸私營企業在非洲走自已的路，投資的主要因素是非洲市場提供了機會，並且中國企業彼此競爭，缺乏合作雙贏思維。中國大陸在非洲的私營企業和政府缺乏有效的溝通機制，以致中國大陸政府的政策執行和私營企業的商業行為之間存在落差。中國大陸需要建立公-私領域的雙向交流的途徑，以取得最大化的開發利益。其實中-非關係亦可如是觀。

從 2005 年起，私部門成為中非經濟關係深化發展的動力。 中國大陸私營企業到非洲投資有三個主要原因：因為參與政府的非洲開發項目，有了非洲的經驗而留在非洲投資；成衣業為規避歐美市場的貿易障礙，在非洲投資設加工廠以取得出口優惠；投資油，汽和其他資源產業出口到中國大陸。中國大陸私營企業到非洲投資是由於國內產能過剩和競爭激烈，非洲有大市場和競爭力較弱的當地企業。中國大陸在非洲的私營企業是充分自主，不受限於政府政策和雙邊協定的框架。這些私營企業進入非洲後，帶動了中國當地的支援系統和領事事務建設的發展，如商會，社群等。中國大陸對非洲的直接投資相對西方國家較少，但增速極快，貿易和投資的互補，雙邊貿易額在 2007 年超過 1000 億美元。

當前中國大陸私營企業在非洲的直接投資有幾個特點：願意進入低利潤和供應鏈不健全的地區投資，期待長期回報;中國私營企業彼此競爭激烈，因對當地地方企業有價格優勢，反而不是競爭對象;因為語言和文化障礙，中國企業和當地企業少有連繫。基本上，中資企業對非洲市場和非洲人都欠缺深入的瞭解;在非洲的中資私營企業和西方企業的不同在於，腐敗，犯罪和官僚主義並未造成中方投資者的不便;中資國有企業和中資私營企業並未整合進中國大陸官方的政策框架，而是各行其是。同樣的中國的投資者並沒有把非洲帶入中國的產業價值鏈，而是各行其是。[54]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

---

[53] Chintu, Namukale and Peter J. Williamson,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Africa: Myths and Reality ", *Ivey Business Journal* (March/April 2013). http://iveybusinessjournal.com/topics/global-business/chinese-state-owned-enterprises-in-africa

[54] Gu, Jing, "China's Private Enterprises in Africa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African",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2009)21, pp.570-587. http://www.palgrave-journals.com/ejdr/journal/v21/n4/full/ejdr200921a.html

為瞭解中國大陸對非洲直接投資的動機及過程中國家的角色。本論文以歷史研究法，內容分析法和個案研究法相結合，分析中國大陸從 2000 年到 2012 年在非洲的直接投資。

一，研究方法

（一）歷史研究法

歷史研究法是從複雜的歷史事件的記錄中發現事情的因果關係與發展方向，以作為瞭解過去，現在與預測未來的基礎。從理論層面看，歷史研究法是一種研究歷史及其演變的方法。但在技術層面上，歷史研究法可以探究過去所發生的任何事實。研究者可藉著有系統的蒐集及客觀評鑑過去已發生事件的有關資料，再經過分析既存資料，歸納出可解釋或預測的理論。這個過程可使人們瞭解當時問題的來源及確認過去採用或未採用的解決方案; 或由資料對研究假設進行驗證，並提出準確描述與解釋，進而有助於解釋現況及預測未來。[55]

本論文將從回顧中共從萬隆會議以來對非洲的援助，改革開放以後中非關係的微調，以及隨著中國大陸經濟實力日漸增長，於內在經濟安全因素和外在環境因素相互影響下，中國大陸以迥異於西方國家的創新模式，重返非洲。本論文除回顧中國大陸對外直接投資的制度改革過程外，也將著重於探討中國大陸對非洲的投資和經濟合作的模式和制度機制。

（二）內容分析法

內容分析法是對針對具體的文字和資訊內容所作的分析。內容是指文字意義資訊圖像或任何用來溝通的訊息。在技術上，內容分析可分為量化描述及質化詮釋兩類。內容分析法適合於探討與傳播相關的議題，或回答「誰說的，對誰說，為什麼，如何發生，有什麼效果」。 作為一種觀察的方法，只要能取得資料就可從事內容分析。但在採取內容分析的研究途徑時，須聚焦於事件「為什麼」發生和「有什麼影響」上，以取得議題在發展過程中的規律和價值。內容分析法則

[55]朱柔若譯，W. Lawrence Neuman 著，**社會研究方法,質化與量化取向** (台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1 月)，頁 610。

為研究如「國家性格，政治取向，政治作風」等社會科學關心的問題，提供了另一種研究途徑。[56]

本論文蒐集中國大陸對非洲直接投資的有關資料，如中非關係的演變，政府對外投資政策及法規，統計資料，書籍和雜誌和網站資料，綜合整理分析其對非洲投策略的演變和特色。

（三）個案研究法

個案研究是社會科學調查研究的方法之一，是一種實證研究，是在不脫離現實生活環境下研究當前正在進行的現象。這個研究是以某個社會單元做為整體，可能是個人，家庭，社區，公司等。而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個案在特定情境下的活動特質，從活動的複雜性中發現其規律性和獨特性。研究者運用對真實生活情境的某個社會單元，進行整體，脈絡面向的探討，尋求現象的本質，以求能對個案產生更清晰的理解。由於個案研究的推論與概念化是一種自然的類推，因此突出研究對象的代表性，要重於特殊因素。[57]

本論文為深入瞭解中國大陸在非洲投資的影響力及不同產業的活動面向，將選擇在能源領域中具代表性的國有企業，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CNPC）做為個案，分析他們在非洲的業務情況，他們的業務和國家政策是否存在內在連結。在民營企業領域，本論文選擇華堅鞋業做個案研究。另外挑選安哥拉（Angola），尼日利亞（Nigeria），贊比亞（Zambia）外加蘇丹（Sudan）做為個案，以探討中國大陸在非洲投資的模式及成效。

二，研究架構

本論文以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經濟民族主義作為研究途徑，分析中共改革開放以後的國家發展政策，及推動「走出去」的動機和策略。然後在中共推動「走出去」戰略的大框架之內，評估中共在改革開放之後，對非洲的經濟合作關係模式的成效；並以國際投資理論中的比較優勢理論和競爭優勢理論/價值鏈視角，將中國大陸私營企業在非洲的直接投資放在全球體系中比較，希望找出中國大陸私營企業對非洲直接投資的模式。

---

[56]邱泯科譯，林佳瑩，徐富珍校訂，Earl Babbie 著，**研究方法：基礎理論與技巧** (台北：新加坡商湯姆生亞洲私人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2005 年 8 月)，頁 402。

[57]尚榮安譯, 陳禹辰校閱, Robert K.Y, **個案研究法** (台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 6 月),頁 39。

三，研究流程

本論文以回顧自萬隆會議以來，中共對非洲的外交及援助政策的變遷為起點，探討中國大陸改革開以後對非洲援助模式的調整及制度創新。同時 自 2005 年起， 中國大陸的私營企業在對非洲直投資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本論文將從文獻內容分析，檢視中國大陸私營企業的投資動機，當前的困境及限制，期能對中國大陸私營企業發展方向有個清晰並深入的認識。同時，中共對非洲經濟合作的機制如中非合作論壇，中非發展基金和中非經濟開發區的運作情況及功效，亦為本論文探索的議題。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三章　中國大陸對外投資政策的回顧及前瞻

第一節　中國大陸對外投資政策的發展概況

自 1949 年中共建政以來，迄 1978 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在經濟體制上可劃分為兩個階段：計劃經濟體制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濟體制時代，中國大陸除國營外貿公司，和基於「團結第三世界」，對非洲國家實施援助項目外，並沒有涉外經濟活動。當然也沒有任何鼓勵對外直投資的政策。

一，改革開放後有關對外投資的政策

（一）有限度開放對外投資及簡化審批

1979 年 8 月，國務院發布「關於經濟改革的十五項措施」，有限度允許「出國辦企業」。自 1984 年起，國務院又陸續發布有關法令：「關於在國外和港澳地區舉辦非貿易性合資經營企業審批許可權和原則的通知」；「關於在境外開辦非貿易性企業的審批程式和管理辦法的試行規定」。

（二）規範外匯管理

1989 年，外匯管理局發布「外匯管理辦法」，探取較嚴格的資金來源審查。1990 年國務院批准，中國人民銀行發布「境外金融機構管理辦法」，規範對境外金融機構的管理。

（三）鼓勵企業對外投資並完善管理

1992 年中共十四大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在政策上開始鼓勵企業依據自身條件，善用國內外資源對外投資。1992 年中共十四大報告提出：「要積極擴大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和跨國經營」，1997 年中共十五大報告提出「要鼓勵能夠發揮我國比較優勢的對外投資，更好地利用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

此時期在政策，法規上對境外國有資產管理；投資項目審批；外匯管理；對外投資企業的融資及財務管理，等範疇有更完善的規範。

（四）實施「走出去」戰略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2001 年，「十五計劃」(2001-2005 年)提出「走出去」戰略：鼓勵企業對外投資。2001 年底，中國大陸加入 WTO。2002 年，中共十六大報告提出：「要堅持『走出去』和『引進來』相結合，積極參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和競爭，不斷提高對外開放水平」。2007 年，中共十七大報告提出：「要創新對外投資和合作方式，支援企業在研發，生產，銷售等方面展開國際化經營，加快培育跨國公司和國際知名品牌，積極展開國際能源資源互利合作，採取綜合措施促進國際收支平衡」。2012 年，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強企業國際化經營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國公司」。這個時期，明確指出「走出去」戰略的目的在：平衡國際收支；保障能源資源安全；培育跨國公司和發展國際品牌。在政策規範上，於 2004,2005 和 2007 年分別發佈：「對外投資國別產業導向目錄」,作為針對海外投資於不同國家和產業的指導。[58]

第二節　中國大陸對非洲經濟合作的機制

中國大陸在 1955 年萬隆亞非會議時，首次同非洲國家接觸並建立了外交和經貿關係。隨著 1960 年代，非洲殖民地紛紛獨立建國，中國大陸積極和非洲新興國家展開了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接觸和交流。當時中共對非洲提出對非洲國家經濟援助的「經濟技術八項原則」，以促進對非洲的經貿關係。[59]可是受文革影響，雙方經貿及技術合作並未全面展開。但當時在「輸出革命」的指導下，中共和非洲新興國家形成緊密的政治外交關係。1972 年毛澤東提出「三個世界」的外交戰略指導下，中共更以團結第三世界為外交政策基本點。這個時期，中共對非洲是以經濟援助為主，中共在 1967 年援建坦桑尼亞到贊比亞的鐵路可做為代表。自 1978 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共對非洲國家無償援助減少，在經濟技術合作上採取了合資經營，合作開發，承包工程，技術勞務合作以提高經濟效益。到 1989 年中國大陸在非洲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 378 項，金額 3.75 億美元，投資開辦 14 家合資，獨資企業，投資金額美金 222 萬。[60]

---

[58]連德宏，「近年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之探討」，
http://www.ndc.gov.tw/att/files/13 近年來中國對外投資之探討.pdf

[59] 1964 年 1 月 16 日，周恩來訪問加納宣佈「對外經濟技術援助八項原則」：平等互利；尊重受援國主權，絕不附帶任何條件，絕不要求任何特權；中國以無息或低利貸款方式提供援助；幫助受援國走自立更生，經濟上獨立發展的道路；力求投資少，收效快；提供中國最好的設備和物資；幫助受援國掌握技術；專家待遇一律平等。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5/76621/76638/5273141.htm

[60]張同鑄 主編，**非洲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問題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年 6 月)，頁 486-498。

一，中非合作論壇

中非合作論壇是中國大陸和非洲國家間的集體對話機制，成立的宗旨是「加強平等磋商，擴大務實合作，促進共同發展」。首屆中非合作論壇部長級會議於 2000 年 10 月在北京舉行。會議通過了「北京宣言」和「中非經濟和社會發展合作綱領」兩個文件。這兩個文件中除政治性宣誓外，經貿領域上強調：「沈重的債務負擔阻礙了非洲國家的發展努力，使非洲經濟面臨困境，認為國際社會有責任和義務協助非洲解決債務問題」；「大力推動中非在經貿，金融，農業，醫療衛生，科技，文化，教育，人力資源開發，交通運輸，環境，旅遊等領域的合作，促進中非共同發展」。

中非合作論壇部長級會議每三年舉行一屆；高官級後續會議及為部長級會議做準備的高官預備會分別在部長級會議前一年及前數日舉行。[61]

二，中非發展基金

中非發展基金是國家主席胡錦濤於 2006 年 11 月，在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中提出。於 2007 年 6 月正式成立中非發展基金有限公司，基金規模為 50 億美元(逐步到位)。中非發展基金是專注於對非洲投資的股權基金，是為支持中國企業開展對非洲合作，開拓非洲市場而設的專項基金。投資成果舉例：中非發展基金和深圳能源於 2007 年共同投資建設加納電廠。該廠規劃一期總發電量 200MV，主要供應首都周邊地區的電網。[62]

三，中非經貿合作區

2006 年 11 月 4 日於中非合作論壇高峰會，胡錦濤主席宣佈〝今後三年內，在非洲地區建立 3 至 5 個經濟貿易合作區〞，以吸引企業投資，增加地主國就業和稅收，提升技術，促進經濟共同發展。目前在非洲已建立 7 個經貿區。本論文後續將更深入探討，中非發展基金和中非經貿合作區在非洲國家的實際操作狀況。

---

[61]「中非合作論壇」，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n/ziliao/2003-12/16/content_1233033.htm

[62]中非發展基金網，http://www.cadfund.com/

第四章　中國大陸在非洲直接投資的概況

在 2000 年，中共將「走出去」戰略確定為經濟指導政策以來，中國大陸的海外直接投資的流量和存量於 2012 年分別達到 842 億美金和 5090 億美金。[63]以投資區域來看，中國大陸的海外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北美洲，歐洲和大洋洲。如以中國大陸海外投資項目看，則主要集中于亞洲，北美洲和歐洲。基本上非洲佔中國大陸海外直接投資的比重並不高，以 2012 年來看，中國大陸對非洲的海外投資僅佔總投資金額的 8%。這因為，中國大陸直接對外投資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取得先進技術。至於對亞洲新興經濟體如新加坡，韓國的投資也是為了進入高技術領域。而對俄羅斯，加拿大和澳洲的投資則是為了能源和礦業資源。[64]這也符合歷次黨大會報告中賦予「走出去」戰略的目標：平衡國際收支；保障能源安全；培育跨國公司。但除這些是主要政策目標，私營企業尋找海外市場追求利潤最大化，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中國大陸對非洲的直接投資不但佔本國對外直接投的比率不高，就是相較於西方各國對非洲的投資也是遠遠不及的。

表一：2006-2012 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區域分布百分比　　單位：%

區域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拉丁美洲	48%	18.50%	6.60%	13%	15.30%	16%	5%
亞洲	43.40%	62.60%	77.90%	71.40%	65.30%	60.90%	10%
歐洲	3.40%	5.80%	1.60%	5.90%	9.80%	11.10%	17%
非洲	2.90%	5.90%	9.80%	2.60%	3.10%	4.30%	8%
北美洲	1.50%	4.30%	0.60%	2.70%	3.80%	3.30%	45%
大洋洲	0.80%	2.90%	3.50%	4.40%	2.70%	2.70%	15%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對外投資統計報告，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gzyb

[63] 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3,Country fact sheet :China.http://unctad.org/fdistatistic

[64]李國學，王永中，張明，2013 年第 1 季度中國對外投資報告。
http://www.iwep.org.cn/upload/2013/03/d20130327145530252.pdf

表二：2006-2012 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區域分布百分比　　單位：%

區域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拉丁美洲	26.30%	20.90%	17.50%	12.50%	13.80%	13%	11.40%
亞洲	63.90%	67.20%	71.40%	75.50%	71.90%	71.40%	59.00%
歐洲	3%	3.80%	2.80%	3.50%	5%	5.80%	8.00%
非洲	3.40%	3.80%	4.20%	3.80%	4.10%	3.80%	4.60%
北美洲	2.10%	2.70%	2%	2.10%	2.50%	3.20%	11.50%
大洋洲	1.30%	1.60%	2.10%	2.60%	2.70%	2.80%	5.30%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對外投資統計報告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gzyb

依據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的統計，2007 到 2012 年非洲外來直接新項目，美，英，法，印度分列前四名，中國大陸為第九位。[65]我們再看中國大陸和美國之間在對非洲直接投資的比較。

表三：2006-2012 年美國和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流量比較　單位:US$ billion

國家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美國	4.49	4.49	3.84	10.42	7.44	5.38	3.72
中國	0.52	0.16	5.49	1.44	2.11	3.17	2.52

資料來源: China in Africa: The Real Story, Deborah Brautigam’s Blog,

http://chinaafricarealstory.com/p/chinese-fdi.html

但為什麼西方國家把中國在非洲的經濟角色視之為「新殖民主義」呢？主要是中國大陸在非洲的經濟外交政策，衝撞了西方國家對非政策的底線。例如 IMF 對非洲國紓困有人權，經濟運行方式的標準。但中國大陸基於國家利益和歷史淵源形成的路徑依賴，有完整而不同於西方國家的對非洲國家的對非洲經濟外交路線。過去多年來中國大陸在蘇丹的石油投資，基礎工程建設，經濟援助，就是這種經濟外交路線的實踐例證。

中國大陸對非洲的直接投資是把中共改革開放前對非洲的經濟援助和工程建設延續到今天，再加上商業投資綜合而成的整套政策。很明顯這種綜合策略是有效的，造成西方國家的危機感，使「中國在非洲的新殖民主義」成為標籤式的話語。中國大陸對非洲國家的經濟行為，打破了西方國家以有條件的金融援助促使非洲國家向自由主義經濟轉變外，更重要的是的經濟模式產生了相當的效果。

[65]新華網,

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3-05/07/c_115675171.htm

例如基礎工程建設(援建),經貿合作區(工業區)的設立，這些模式有一定的政治經濟效果。當然，中國大陸在非洲是最要的投資項目是資源投資，因石油和礦業投資涉及中國大陸的「供應安全」。[66]同時因為美國和歐盟對非洲國家有貿易優惠，美國於 2000 年訂有「非洲增長和機會法案」(Africa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 AGOA),歐盟有對非洲優惠的「科托努協定」(Cotonou Agreement)。這對中國大陸加工貿易產業提供了機會，依據 2013 年中國大陸發佈的「中國與非洲的經貿合作」白皮書：中國 2009-2012 對非洲製造業投資 13.3 億美金，2012 年製造業投資存量 34.3 億美金。因此中國大陸在非洲的綠地投資(greenfield)，在商品價格下降時期，可能是未的增長來源。[67]

第一節 中共非洲政策的演變

中國大陸的非洲政策可以用改革開放前後，劃分為兩個階段。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大陸的非洲政策是由意識形態主導，在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大纛下，支持非洲民族獨立為主軸。1955 年 4 月在印尼召開的亞非會議(萬隆會議)，是中非雙方首次接觸。會中周恩來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五項原則從此成為中共外交和對外援助的政策指導原則。[68]自 1956 年 5 月中國大陸同埃及建交，到 1963 年底中國大陸已同 12 個非洲國家建交。1963 年底周恩來總理訪問非洲提出的「中國政府對外經濟援助助八項原則」，做為對非洲援助的指導性綱領。[69]這個時期標誌性的援助項目為 1976 年 6 月完工的坦贊鐵路。由於堅持「不干涉內政」原則下，中國大陸從不介入援建項目的管理工作，故此時期中國大陸對非

---

[66]Dent, Christopher M., 〝Africa and China：A new kind of development partnership" in Christopher M. Dent eds., *China and Africa Development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p.8-9.

[67]中國政府白皮書：**中國與非洲的經貿合作**（2013）。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8/29/c_117140993.htm

[68]周恩來於 1953 年 12 月 31 日提出「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並於 1954 年訪問印度和緬甸時，提出將這五項原則做為處理國際關係的準則。

[69]1964 年 1 月 16 日，周恩來訪問加納宣布「對外經濟技術援助八項原則」：平等互利；尊重受援國主權，絕不附帶任何條件，絕不要求任何特權；中國以無息或低利貸款方式提供援助；幫助受援國走自立更生，經濟上獨立發展的道路；力求投資少，收效快；提供中國最好的設備和物資；幫助受援國掌握技術；專家待遇一律平等。人民網,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5/76621/76638/5273141.htm

洲的援建工程被稱為「交鑰匙」工程。但大多數工程在移交給非洲地主國政府後，都以失敗或荒廢而告終。[70]

1979 年中共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轉向，在非洲政策上也採取務實的態度，改以共同發展為主軸。1982 年底趙紫陽訪問非洲時，在坦桑尼亞提出今後中國大陸與非洲國家經濟技術合作的四項原則：平等互利，講求實效，形式多樣，共同發展。趙紫陽的「四項原則」將中國大陸單方面對非洲援助轉向合作發展，而合作的『方式可以多種多樣.....包括承建工程，合作生產，合資經營，等等』。[71]

1996 年 5 月，江澤民主席訪問非洲五國時，在埃塞俄比亞非盟織組總部演講時，提出發展中非關係的五點建議：真誠友好，彼此成為可以信賴的「全天候朋友」；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主權，互不干涉內政；互惠互利，謀求共同發展；加強磋商，在國際事務中密切合作；面向未來，創造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72]

2006 年 4 月初，胡錦濤主席訪問摩洛哥，尼日利亞和肯尼亞三國，於 4 月 27 日在尼日利亞國會演講提出發展中非新型伙伴關係五點建議：第一，政治上增強相互信任；第二，經濟上擴大互利共贏；第三，文化上注重相互借鑒；第四，安全上加強相互合作；第五，國際上密功互相配合。

2007 年 1 月 30 日到 2 月 10 日胡錦濤主席對喀麥隆，利比里亞，贊比亞，納米比亞，南非，莫桑比克和塞舌爾等八國進行國事訪問，於南非比勒陀利亞大學（University of Pretoria）發表題為「加強中非團結合作，推動建設和諧世界」的演講，強調平等互利，共同發展，以提升中非合作的層次。訪問期間，胡錦濤並對在非洲的中資企業提出三點期望：要堅持牢記使命，服務大局；要堅持信譽至上，質量第一；要堅持促進和諧，造福民眾。

2009 年 2 月 10 日到 17 日胡錦濤主席對沙特阿拉伯，馬里，塞內加爾，坦桑尼亞，毛里求斯等亞非五國進行國事訪問。訪問期間，胡主席在坦桑尼亞發表演講，描述中國和非洲的共同發展方向：首先為團結互助，攜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其次為增進互信交流，鞏固中非傳統友好政治基礎；第三，互惠互利，提升中非經貿實務合作水平；第四，擴大交流，深化中非人文領域合作；第五，緊密配合，加強在國際事務中的協調；第六，加強協作，共同推進中非合作論壇。

---

[70]Brautigam, Deborah, *T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2009), p 80.

[71] Brautigam, Deborah, *T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2009), p 82.

[72] 肯尼亞，埃及，埃塞俄比亞，馬里，納米比亞，津巴布韋等五國

2013 年 3 月 25 日習近平主席於坦桑尼亞進行國事訪問時，發表「永遠做可靠朋友和真誠伙伴」的演講，闡述中非共謀和平，共同促進發展的主張。

2014 年 5 月 4 日到 11 日李克強總理對俄塞埃比亞，非洲聯盟總部，尼日利亞，安哥拉和肯尼亞進行正式訪問，並在非盟總部發表題為「開創中非合作更加美好的未來」的演講，提出中非合作框架要在堅持平等相待，團結互信，包容發展和創新合作四項原則下推進產業，金融，減貧，生態環保，人文交流及和平安全合作。[73]

回顧自中共建政以來高層領導對非洲政策的宣誓，當前中國大陸和非洲關係的發展是一個從革命輸出，向共同發展轉變的過程。在從意識形態主導到以經濟合作發展為主軸的中非關係中，標誌性的政策指導為趙紫陽在 1982 年底訪問非洲時提出的「經濟技術合作四項原則」。趙紫陽提出的「四項原則」，雖然在精神上延續周恩來在 1964 年提出的「八項原則」，但實際上強調中非合作而非對非洲援助。因此「四項原則」代表中國大陸在對非洲關係上的戰術創新轉變，即把改革開放前對非洲的無償援助向互利共贏的經濟合作轉型。而 2000 年建立的中非合作論壇，則在為發展中的經貿合作建立永久的溝通機制以鞏固，保障雙方的經濟利益和經濟安全，以深化雙方立基於發展的友好關係。表四為自中共十六大迄今，中共高層領導訪問非洲表

表四:自中共十六大迄 2014 年 5 月，中共高層領導訪問非洲表

時間	中國大陸領導人	訪問國家
2003 年 12 月	溫家寶總理	埃塞俄比亞(出席第二屆中非合作論壇)
2004 年 1-2 月	胡錦濤主席	阿爾及利亞，加彭，埃及
2004 年 6 月	曾慶紅副主席	貝南，南非，多哥，突尼西亞
2006 年 4 月	胡錦濤主席	肯尼亞，尼日利亞，摩洛哥
2006 年 6 月	溫家寶總理	安哥拉，埃及，迦納，剛果民主共和國，南非，坦桑尼亞。
2007 年 1-2 月	胡錦濤主席	喀麥隆，利比里亞，莫桑比克，那米比亞，塞昔爾，蘇丹，贊比亞

[73]資料來源：新華網-中非關係,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6-06/14/content_4695531.htm

2009 年 2 月	胡錦濤主席	馬利，毛里求斯，塞內加爾，坦桑尼亞。
2013 年 3 月	習近平主席	坦桑尼亞，南非，剛果民主共和國
2014 年 5 月	李克強總理	埃塞俄比亞，尼日利亞，安哥拉，肯尼亞

資料來源:新華網-中非關係,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6-06/14/content_4695531.htm

第二節 中國大陸對非洲經濟合作的機制

中共在 1955 年萬隆亞非會議時，首次同非洲國家接觸並隨之建立了外交和經貿關係。1960 年代，非洲殖民地紛紛獨立建國，中共積極和非洲新興國家展開了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接觸和交流。當時中共對非洲提出對非洲國家經濟援助的「經濟技術八項原則」，以促進對非洲的經貿關係。可是受文革影響，雙方經貿及技術合作並未全面展開。但當時在「輸出革命」的指導下，中共和非洲新興國家形成緊密的政治外交關係。1972 年毛澤東提出「三個世界」的外交戰略指導下，中共更以團結第三世界為外交政策基本點。[74]這個時期，中共雖對非洲提供政治支持和軍事援助，但以經濟援助為主。自 1978 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共對非洲國家的無償援助減少，在經濟技術合作上採取了合資經營，合作開發，承包工程，技術勞務合作以提高經濟效益。到 1989 年中國大陸在非洲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 378 項，金額 3.75 億美元，投資開辦 14 家合資，獨資企業，投資金額美金 222 萬。[75]在合資經營領域，中國大陸在 1980 年代中期為了「收回積壓越來越多的援助貸款，鞏固早期援建專案和讓中國的新公司累積經驗」，提出債轉股的構想，把債權變成中方在合資企業的股權。1995 年中國大陸進行援助計劃改革，由中國進出口銀行推出優惠援助貸款制度，而商務部則負責整合對非洲的援助，互利合作和貿易。簡言之，中國大陸 1995 年援助改革的目的，就是用援助資金來扶持「互利合作」的商業行為。[76]自 2000 年以來，中共推動「走

[74]毛澤東所劃分的三個世界：美國及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為日本，歐洲，澳洲，加拿大；中共及亞非國家為第三世界。

[75]張同鑄主編，同前揭書，頁 486-498。

[76]Brautigam, Deborah, *T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2009), pp. 113-115.

出去」，中國大陸建立了以貿易，援助和投資相結合的模式。這個模式有參種形式，其一為以資源為抵押的基礎設施貸款，因最早在安哥拉採用，被稱為「安哥拉模式」。亦即安哥拉以協議數量的石油出口到中國大陸，替代現金以償還中國大陸的基礎建設貸款。第二種形式是非洲地主國和中資企業談好初步專案後，再和中國大陸商務部簽署框架協議，申請中國進出口銀行的優惠貸款。其三為「配套融資」,這是中國進出口銀行將援助,優惠貸款，優惠買方(賣方)信貸組成包裹信用額度，以支持大型工程專案。[77]在 2000 年，中國大陸更創建區域性組織-中非合作論壇，做為中非共同發展的制度化溝通平台。於 2006 年，中國大陸宣佈建立「中非經濟貿易合作區」和「中非發展基金」則是既能推動夕陽產業到非洲發展以有助於國內的結構調整，同時又能促進非洲工業化的雙贏機制。

一，中非合作論壇

中非合作論壇是中國大陸和非洲國家間的集體對話機制，成立的宗旨是「加強平等磋商，擴大務實合作，促進共同發展」。中非合作論壇部長級會議每三年舉行一屆; 高官級後續會議及為部長級會議做準備的高官預備會分別在部長級會議前一年及前數日舉行。[78]

2000 年 10 月 10 到 12 日中非合作論壇第一屆部長會議在北京召開，江澤民主席主持開幕及閉幕式並講話。會議通過了「北京宣言」和「中非經濟和社會發展合作綱領」兩個文件。這兩個文件中除政治性宣誓外，經貿領域上強調：「沈重的債務負擔阻礙了非洲國家的發展努力，使非洲經濟面臨困境，認為國際社會有責任和義務協助非洲解決債務問題」；「大力推動中非在經貿，金融，農業，醫療衛生，科技，文化，教育，人力資源開發，交通運輸，環境，旅遊等領域的合作，促進中非共同發展」。中國大陸當時的外經貿部長石廣生在會中提出中國大陸對非洲的四項承諾： 一，根據非洲國家的不同經濟情況，繼續在力能所及的範圍內提供各種援助；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和綜合國力的增強，逐步擴大投資規模；二，願為減輕非洲國家的債務作出自己的貢獻，在未來兩年內減免非洲重債窮國和最不開發國家 100 億元人民幣債務；三，提供專項資金，支持和鼓勵有實力，有信譽的中國企業到非洲投資，促進當地經濟發展；第四，設立

---

[77]Ibid., 195-198

[78]「中非合作論壇」，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n/ziliao/2003-12/16/content_1233033.htm

「非洲人力資源開發基金」,逐步擴大基金規模，幫助非洲國家培訓各類專業人才。[79]

2006 年 11 月 4 日，第三屆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召開。胡錦濤主席在開幕講話中提出為促進中非合作，中國大陸將對非洲國家採行八項政策措施：擴大援助規模，提供優惠貸款；對非洲重債窮國免除債務；進一步向非洲開放市場，擴大對非洲低度開發國家進口零關稅項目；為非洲提供人才訓練；派遣農業，醫藥專家支援非洲；設立中非發展基金和在非洲建立中非經濟貿易合作區。這些新政策中，以設立中非發展基金以鼓勵中國大陸企業到非洲投資，和在非洲設立經濟貿易合作區最令外界矚目。

二，中非發展基金

中非發展基金是國家主席胡錦濤於 2006 年 11 月，在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中提出。於 2007 年 6 月正式成立中非發展基金有限公司，基金規模為 50 億美元(逐步到位)。中非發展基金是由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出資，專注於對非洲投資的股權基金。基金的目的是為支持中國企業開展對非洲合作，開拓非洲市場。中非發展基金以自主經營，自負風險方式，提供股權融資，引導支持中資企業在非洲投資。基金的投資原則是投資在非洲營運的中資企業或有中資企業投資且負責營運的合資企業。中非發展基金的投資重點放在能促進非洲地區經濟發展的行業，如農業，製造業；基礎設施如交通，電力；資源領域；中資企業建立的工業園區。但中非發展基金投資不超過 10 年，退出時將股份出售給大股東或轉讓第三方。中非發展基金目前在南非，埃塞俄比亞，贊比亞和加納設有辦事處。[80]到 2013 年底，中非發展基金已投資 70 多個項目，投資金額達 28 億美元。這些投資中除投資中非經貿合作區的三個合作區（尼日利亞萊基，埃及蘇伊士，毛里求斯晉非）外，以下列投資項目較受矚目：

加納電廠：中非發展基金和深圳能源於 2007 年，共同投資加納燃汽電廠。第一期規劃總發電量 200MV,已於 2010 年 10 日完工運轉。

中非棉業發展有限公司：由中非發展基金，青島匯富紡織，青島端昌棉業合資，在非洲馬拉維，莫桑比克，贊比亞，津巴布韋設立公司，以輔導當地棉花種植，再收購和加工銷售。中非棉業是目前中非發展基金最大的農業投資。

---

[79]丁永康，「中共推動國際新秩序在非洲的實踐」，**中國大陸研究**，第 43 卷第 11 期（民國 89 年 11 月），頁 94。

[80]中非發展基金。http://www.cadfund.com

萬寶莫桑比克農業園：是中非發展基金和湖北萬寶糧油有限公司在莫桑比克共同投資，建立的種植，加工和倉儲一體的農業園。預計將提高莫桑比克農業種植能力，緩解莫桑比克長期對進口稻米的依賴。
南非海信家電工業園：由中非發展基金和海信集團於南非開普敦共同投資，建立年生產電視和冰箱各 40 萬台家電生產基地。[81]

三，中非經貿合作區

2006 年 11 月 4 日於中非合作論壇高峰會，胡錦濤主席宣佈〝今後三年內，在非洲地區建立 3 至 5 個經濟貿易合作區〞，以吸引企業投資，增加地主國就業和稅收，提升技術，促進經濟共同發展〞。經由商務部於 2006 和 2007 年兩度公開招標審核後，批准在非洲已建立 7 個經貿區合作區，分別位於贊比亞，埃及，埃塞俄比亞，毛里求斯，尼日利亞。分佈如附表一。

中非經貿合作區的概念來自於中國大陸經濟特區的成功經驗。[82]中國大陸自 1979 年開始設立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四個特區，然後逐步由沿海向內陸建立工業園區，有效促進了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一般而言，經貿特區是在劃定的區域中，設立單一的行政管理機制，並以各項實質誘因吸引廠商進駐，以出口帶動地主國的經濟發展和工業化。東亞發展型國家和中國大陸是特區經濟的成功典範。因在這些國家，特區發揮了引導國內廠商群聚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從而提高競爭力，以促進外銷來推動工業化。從東亞發展型國家和中國大陸的經驗看，特區成功的要件在政策完備及基礎設施完善。[83]從 1970 年代迄今，非洲地區先後設立了 114 個經濟特區，除毛里求斯外，大多數非洲國家設立的經濟特區並未發生預期的功效。由於中非經貿合作區的模式，是將中國大陸〝經濟特區〞的成功經驗向非洲移植。中非雙方在經貿區經營上成功和失敗的歷史經驗反差，是中非經貿合作區計劃引人關注的主因。

（一）中非經貿合作區的實施

---

[81]「中非發展基金加大投資，助力非洲經濟多元化」，中國與非洲網，
http://www.chinafrica.cn/chinese/jm/txt/2o14-03/14/content_603300.htm

[82]唐曉陽，〝中國在非洲的經貿合作區淺析，〞 **西亞非洲**（北京），2010 年第 11 期（2010 年 11 月），頁 17-22。

[83]"Chinese Investments in Special Economic Zones in Africa: Progress, Challenges and Lessons Learned," *The World Bank and PPIAF Regional Integration Report* (January 2011), p.20.

為鼓勵中資企業到海外建設經貿合作區，中國大陸商務部在 2006 年 3 月發佈「境外中國經濟貿易合作區的基本要求和申辦程序」,以公開招標，審核遴選海外合作區投資者並給予財務資助。經過 2006 和 2007 年兩次招標後，有 7 個非洲經貿合作區計劃入選。

商務部對通過審查的海外開發區計劃會提供最高 2 億人民幣的獎助金和 20 億人民幣的長期貸款。[84]除此之外，在非洲的經貿合作區開發計劃中，中非發展基金也投資某些經貿合作區的開發案，擔任合夥人的角色。除獎助金和長期貸款外，經貿合作區開發商可申請商務部經貿開發區基金補助 30%的相關作業費用（ 如計劃研究費，差旅費，公證費等 ）。中國大陸商務部為鼓勵中資企業，到經貿合作區投資，凡進駐經貿區的企業，可得到一半的搬遷費補助，外加出口退稅和所得稅減免。[85]

（二）中非經貿合作區的政策意涵

西方學界對中國大陸在非洲建立中非經貿合作區的政策目標，雖各有不同的觀點。但一般皆同意，規避貿易障礙和協助勞動密集產業向外轉移，是中共的政策目標。Martyn J. Davis 認為，中國大陸在海外設置經貿合作區背後的戰略意圖為：有利中資企業向海外轉移生產線，以規避貿易障礙；協助中資企業進入新市場；降低中資企業到海外投資的風險；經由產業群聚，強化中資企業的競爭力。[86]世界銀行的咨詢機構 PPIAF（ Public-Private Infrastructure Advisory Facility）則認為中國大陸設立海外經貿合作區是為：促進中國大陸裝備製造需求；以海外生產降低貿易磨擦和規避貿易障礙；有助於中國大陸經濟結構向價值鏈上游調整；創造規模經濟，為缺乏海外經驗的中小企業提供群聚點；轉移中國大陸的「特區經驗」，以協助非洲發展。[87]Brautigam 認為中非經貿合作區是種政治「軟實力」的展示，和友好國家分享中國大陸的發展經驗；用經貿合作區協

[84]唐曉陽，同前揭書，頁 18。

[85]Deborah Brautigam, TANG Xiaoyang, "African Shenzhen: 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in Africa,"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49, No. 1 (2011), pp.33-34.

[86]Martyn J. Davis, "Spcial Economic Zones: China's Development Model Comes to Africa " in Robert I. Rotberg ed., *China into Africa: Trade, Aid, and Influence* (Baltimor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8).pp.140-141.

[87] “Chinese Investments in Special Economic Zones in Africa: Progress, Challenges and Lessons Learned,” The World Bank and PPIAF Regional Integration Report (January 2011), p.26.

助勞動密集產業向海外轉移，有助國內產業結構調整。Cheng and Ma 認為中國大陸建立中非經貿合作區的政策目標為：經由第三地出口，減少貿易摩擦；平衡外匯儲備；促進地主國就業，強化雙邊關係；園區為中資企業提供政策優惠和形成商業社群有利互相支援。[88]

(三) 中非經貿合作區的運作

中國大陸政府在中非經貿合作區運作上，並不直接涉入。而是發揮類似東亞發展型國家的行政指導功能，由商務部和各省獎勵推動中非經貿合作區的開發。但 Davis 認為中非經貿合作區設置地點的選擇，反映出中國大陸在非洲的商業優先與地主國和中國大陸的長期政治關係。[89]雖然中非經貿園區開發商產業背景多元，但都是已在當地經營有成的企業。這些中資企業和省級國企合組開發集團，然後獨資經營(如埃塞俄比亞，毛里求斯)，或再和地主國當地政府合資(如尼日利亞，贊比亞)。而各經貿合作區的商業模也不盡為加工製造，如贊比亞的合作區以銅礦相關產業為主。毛里求斯合作區則以商業房地產，倉儲，物流為重心。

中非經貿合作區在園區開發階段並非一帆風順，這其中涉及地主國政策的改變，開發商和地方政府的溝通不良，地方政府土地徵收引發的民間抗爭及開發商本身的財務問題。例如毛里求斯經貿合作區原開發商天利集團在 2008 年遭遇財務危機，以致開發停頓。2009 年 2 月胡錦濤主席訪問毛里求斯知悉情況後，在商務部徵詢和山西省政府推薦下，由太原鋼鐵和山西焦煤投資天利集團。並於 2009 年 7 月組成新的晉非投資公司接手繼續開發。再於 2010 年，中非發展基金注資 1 億 2 千萬人民幣，取得 32.5%股權。同時經貿合作區計劃從事的產業，從紡織業為主轉向商業房地產開發。[90]

埃塞俄北亞東方工業區完全由江蘇其元集團為主，組成的江蘇其元投資公司主導。但 2009 年，第二大股東江蘇永鋼集團因財務危機退出，導致工業園區投資規模從原計劃的 500 公頃縮為 200 公頃。其元集團並尋求中非發展基金和中國

[88]Leonard F. Cheng, Zihui Ma,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Robert C. Feenstra and Shang-Jin Wei eds., *China's Growing Role in World Trad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pp. 554-555.

[89]Martyn J. Davis, "Spcial Economic Zones: China's Development Model Comes to Africa " in Robert I.Rotberg ed., *China into Africa: Trade, Aid, and Influence* (Baltimor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8).pp.143-144.

[90]"Chinese Investments in Special Economic Zones in Africa: Progress, Challenges and Lessons Learned," The World Bank and PPIAF Regional Integration Report (January 2011), p.67, 73, 84.

進出口銀行協助。[91]到 2010 年除阿爾及利亞外，其他經貿合作區都在施工中。但在阿爾及利亞則由於阿國有關外國投資法律在 2009 年改變，導致經貿合作區中途停頓。

尼日利亞萊基自由貿易區開發過程

2012 年 8 月在尼日利亞 Lagos 舉辦「萊基自由貿易區論壇」,尼日利亞貿易暨投資部部長 Olusegun Aganga 主持開幕時稱：萊基自由貿易區投資金額已達 10 億美元，並主張「尼日利亞要複製中國大陸的自由貿易區模式，以促進經濟發展」。[92]很明顯，尼日利亞官方對「萊基自由貿易區」的成果是滿意的。因此本論文希望從回顧萊基自由貿易區的開發過程和招商成果，能有助於瞭解中非洲經貿合作區的發展和營運狀況。

尼日利亞為非洲人口大國和重要的消費市場，該國主要出口依賴石油，可可和其他農產品，尼日利亞 90%的工業產品依賴進口。尼日利亞早在 1990 年代就設立了加工出口區和自由貿易區，做為發展戰略。但由於基礎設施欠完善，缺乏可信且一貫的政策環境，尋租行為普遍，使尼國自由貿易區成效不彰。

萊基自由貿易區位於尼日利亞瀕大西洋岸的萊基半島上，Lagos 州政府計劃把萊基半島建成一個集商業，住宅，工業，休閒的綜合開發區，整個工程預計在 2019 年完工。萊基自由貿易區計劃早在 2004 即由中國鐵建提出，為萊基半島開發計劃之一部。最初由中方投資 60%,Lagos 州政府 20%,由州政府轉投資的 Lekki Worldwide Investment 出資 20%。2006 年 3 月中國土木工程集團(CCECC) 整合原中方投資者在北京註冊成立中國土木超越(CCECC-Beyond)，再和 Lagos 州政府合資成立萊基(Lekki)自由貿易區開發公司。

2007 年中國土木超越參與商務部「中非經濟貿易合作區」項目招標，取得商務部批准成為中國大陸國家計劃下的「中非經濟貿區合作區」。到了 2009 年中非發展基金投資中國土木超越 20%股份,至此中方投資者再次更名為「中非萊基投資有限公司」。[93]在自由貿易區開發過程中，首先面臨當地社區對搬遷補償所引起的紛爭，最後以無償提供社區 5%自由貿易區股份，僱用居民擔任保安工

[91]"Chinese Investments in Special Economic Zones in Africa: Progress, Challenges and Lessons Learned," The World Bank and PPIAF Regional Integration Report (January 2011), pp. 56-57.

[92]Ventures Africa (Nigeria) http://www.ventures-africa.com/?s=LFTZ+investment+forum&submit=Search

[93]"Chinese Investments in Special Economic Zones in Africa: Progress, Challenges and Lessons Learned," The World Bank and PPIAF Regional Integration Report (January 2011), pp. 45-46.

作以平息紛爭。其次，由於中方股東內部紛爭，導致工程延誤。最終以中非發展基金挹注資金改變股權結構，以平息由財務緊縮引起的內部爭執。最後是中尼雙方股東溝通不良，雙方認知有誤，尼方期待中方以資金入股，而中方則希望以工程施工代替資金股份。[94]

在招商方面，萊基自由貿易區計劃揭幕後，五年內吸引 175 家廠商入駐，投資額達 5 億美元。並期待入園廠商中，尼日利亞當地業者超過一半，僅有三分之一為中資企業。依據萊基自由貿易區開發商透露，在工地開發階段有 79 家投資者簽下瞭解備忘錄(MOU)，64 家廠商做了投資登記，其中 12 家簽下投資議定書。2014 年 10 月，萊基自由貿界區公開資料中，入園企業為 30 家。[95]

於萊基自由貿易區開發之初，尼國當地商界認為萊基自由貿易區是全新的造鎮式開發區，在設備和區位上不具優勢。更重要的是在萊基自由貿易區附近，有兩個工業區正在同時進行。其一為 Lagos 自由貿易區，由新加坡商，尼日利亞石油公司和中國工程建築總公司合資開發。另一個工業區為萊基港工業園區，是新加坡商 Eurochem 開發萊基港規劃的一部份。如果 Lagos 州政府無法有效協調資源分配，將對各工業區招商成效形成障礙。[96]

(四) 中非經貿合作區的展望

中非經濟貿易合作區從 2006 和 2007 兩次競標開發計劃，到今天尚未推動新的開發計劃。這表示中非經貿合作區已推動的項目帶有「試點」的意味，也可見中國大陸官方對中非經貿合作區發展的審慎。回顧非洲國家以往的工業區發展的失敗經驗，在造成失敗的因素尚未完全消除以前，中國大陸推動的經貿合作區，會不會有不同結果？Cisse 認為:目前中非經貿合作區對地主國所期待的，提升管理能力，技術能力和人力資本並未產生積極效果。[97]但 Brautigam 認為中國大陸建立的中非經濟貿易合作區，有成功的機會。其理由在於：首先，中國大陸是

[94]Deborah Brautigam, Thomas Farole, and Tang Xiaoyang, “China's investment in African Specia Economic Zones: Prospect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Premise, No. 5 (March 2010), p. 4.

[95]中非發展基金。http://www.cadfund.com

[96]“Chinese Investments in Special Economic Zones in Africa: Progress, Challenges and Lessons Learned,”The World Bank and PPIAF Regional Integration Report (January 2011), pp. 47-49..

[97]Daouda Cisse, “FOCAC: trade, investments and aid in China-Africa relations,” Policy Briefing (Stellenbosch: 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 at University Stellenbosch，May 2012), p. 2.

當今最成功運用「經濟特區」, 促進工業化的國家；其次，經貿區是中國大陸政治「軟實力」在非洲的體現，不容許失敗；第三，由於不容許失敗，經貿合作區有中國大陸政府財政的全力支持；最後，經貿合作區完全由私營企業運作，在利益驅動下相對效率較高。[98]

西方學者認為，中非經貿合作區是中國大陸對非洲互利共贏戰略的執行平台，是依循東亞發展型國家模式支持下，由中國大陸企業以市場為基礎作出最有利的投資決策。中非經貿合作區不但助於地主國的就業和工業發展，更可能為非洲提供了可持續發展的工業化道路。但中非經貿合作區要發揮功效，則有賴地主國在制度和執行上，能有效支援工業區運行。[99]

由於工業區的目的在解決資金及技術稀缺，因此外國投資對經貿合作區成功與否扮演關鍵性角色。回顧非洲國家自 1970 年代以來工業區失敗的經驗，主要在於無法吸引外資。其原因在於，工業區周邊設施不足，當地政府政策欠穩定及誘因不足，管理無效率和商業環境不佳等因素。這些不利於開發區的因素目前是否依舊存在，就不得知了。但中國大陸官方和合作區開發商則相對樂觀務實。中方開發商希望能在開發區建立產業鏈, 形成群聚效應。招商方面除招攬中資企業外，開發商更希望有外資和本土企業加入。而中國大陸官方則為了鼓勵當地企業進入園區投資，於 2009 年成立 10 億人民幣的基金以幫助非洲中小企業到園區投資。[100]

過去十多年來，由於石油和商品價格走高，非洲石油和礦產資源豐富的國家財政得以改善，中產階級增加，消費需求提高。這時正逢中國大陸要調整經濟結構，促進產業升級，沿海勞力密集加工產業紛向內陸或周邊國家轉移。中非經貿合作區的設立，提供了非洲國家運用資源財富促進工業發展的契機。對中國大陸而言，中非經貿合作區除具有高度的政治象徵意義外，更是有助於國內經濟結構調整和協助企業拓展市場的功能。但這個能加強中非互補作用的模式，能否發生作用則視地主國的政策，和中國大陸投資者是否能整合當地經濟而定。

---

[98]Deborah Brautigam, Thomas Farole, and Tang Xiaoyang, China's investment in African Special Economic Zones: Prospect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Premise, No. 5 (March 2010), p. 3.

[99]Chinese Investments in Special Economic Zones in Africa: Progress, Challenges and Lessons Learned，The World Bank and PPIAF Regional Integration Report (January 2011), pp. 77-79.

[100]Deborah Brautigam, TANG Xiaoyang, "African Shenzhen: 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in Africa,"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49, No. 1 (2011), pp. 43-44.

第五章　個案研究:非洲國家研究

中國大陸對非洲的直接投資，被部分西方認為：是要在非洲擴張影響力，挑戰西方的政治經濟利益；中國大陸傾銷廉價商品摧毀了非洲的本土的工業；中國大陸不透明的投資和援助助長了當地的腐敗；中國大陸的「不干涉」, 無助於非洲國家的「結構調整」進程。[101]雖然中國大陸的非洲經濟合作發展政策，不同於西方國家對非洲的援助。但中國大陸以投資，貿易，援助相結合的合作發展，是否能取得與非洲各國「互利雙贏」的可持續發展，尚待時間檢驗。從 1982 年趙紫陽提出「經濟技術四項原則」到 2006 年西方媒體批評中國大陸為「新殖民主義」。正可證實，中國大陸在非洲的合作發展實踐是有成效的。但這種成效有部份是有由於西方以「結構調整」為條件的援助，不符非洲的現實需求。以致中國大陸以「不干涉」為前提的經濟合作，取得相對較大的成效。[102]

但中國大陸以創新的投資，貿易和援助相結合的合作發展模式，在非洲各國的實踐過程中，並非一路通行無阻。雖然中國大陸在面對非洲國家各自不同的政經風險和民粹障礙時，都能自我調整。但並非每次都能取得最大化的利益。本論文挑選安哥拉，尼日利亞, 蘇丹和贊比亞四個國家做為個案，以闡明中國大陸在非洲投資所面對的機會及風險。至於挑選這四個國家的理由：雖這四國都是石油和礦產蘊藏豐富的國家，但不同的政經環境，造成中國大陸採取不同的路徑和投資後果。因此從對安哥拉，尼日利亞, 蘇丹和贊比亞的個案研究中，應能反映中國大陸在非洲面對的挑戰與困境。

第一節　安哥拉：以「資源換發展」

安哥拉位於非洲西南部，北鄰剛果共和國與剛果民主共和國，東與贊比亞為鄰，南接納米比亞，西瀕大西洋，面積為 124.67 萬平方公里。人口約 2070 萬，由 30 多個部族組成。當地有 42 種民族語言，官方語言為葡萄牙語。安哥拉現為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三大經濟體，最大的外國投資目的地國。安哥拉是天然資源豐

---

[101] Xu Yi-chong, "Capitalist or Villian: Chinese SOEs in Africa," in Li Xing, Abdulkadir Osman Farah eds., *China-Africa Relations in an Era of Great Transformations*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13), p. 87.

[102] 博黛容著，沈曉雷，高明秀譯，紅色大布局(台北:八旗文化，2013 年 9 日), 頁 71-72.

富國家，石油業是經濟支柱產業，安哥拉並於 2007 年加入石油輸出國組織（ OPEC ）。[103]

安哥拉自 2002 年 4 月內戰結束後，受惠於國際石油價上漲，其經濟強勁成長。2005 年安哥拉 GDP 成長 20.6%;2006 年 18.6%;2007 年 23.4%;2008 年 26.6%。通貨膨脹率 1999 年 300%,2006 年 12%。中國大陸在安哥拉戰後重建扮演重要角色，涉入範圍從能源，水力，衛生，教育，電信，魚業和公共服務約有上百個計劃。2006 年溫家寶總理訪問安哥拉,安哥拉總統 Eduardo dos Santos 描述雙方關係為:不預設政治條件的實在的互利夥伴。[104]

一，中國大陸和安哥拉關係的歷史回顧

1960 年代安哥拉反殖民鬥爭時期，安哥拉有三個解放運動組織：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 MPLA),安哥拉徹底獨立全國聯盟（ UNITA ）和安哥拉民族解放陣線（ FNLA ）。1960 年代早期 MPLA 依賴中共的政治和軍事支援，但 MPLA 內部分裂由親蘇聯派取得領導權，於是中共轉而對 UNITA 和 FNLA 提供軍事支援。1974 年安哥拉獨立，1975 年 MPLA 為主組成的安哥拉政府和 UNITA 爆發內戰。安哥拉內戰頓時成為冷戰的競技場，蘇聯和古巴支持 MPLA，美國，南非和中國大陸則支持 UNITA。蘇聯解體後 UNITA 失去美國的支援，並於 2002 年因領導人被擊斃，UNTIA 和安哥拉政府簽署和平協議，安哥拉內戰結束。安哥拉直到 1983 年才和中國大陸建立外交關係，到 2004 年雙建立戰略伙伴關係。[105]

2002 年安哥拉內戰結束後，MPLA 政府意欲取得資金進行國家重建，但冷戰結束後安哥拉失去了原先的戰略重要性，以致不易取得外援。安哥拉政府向 IMF 求助，但 IMF 堅持接受貸款國必須有政府透明度；穩定的宏觀經濟；削減公共支出。因此如果安哥拉希望取得 IMF 貸款，進行大型基礎建設計劃，必須等到政府財政健全之後才有可能。2004 年，安哥拉宣布中國進出口銀行提供 20 億美元和石油供應掛勾的無附加條件的優惠信貸額度，放棄和 IMF 的協議。中國大陸提供的援建項目是立基於以「資源換建設」的模式。因為中國大陸首先在安哥拉採用，故被稱之「安哥拉模式」。

---

[103]「中非關係」,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6/19/content_447217.htm

[104]Jennifer Cook ed., *U. S. and Chinese Engagement in Africa: Prospects for improving U.S.-China-Africa Cooperation* (Washington, DC, CSIS, 2008), p.34.

[105]Lucy Corkin, "China and Angola - Strategic partnership or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Angola Brief*, Vol. 1, No. 1 (January 2011), p.2.

中國大陸對安哥拉援建項目的操作流程：

(一)由安哥拉財政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組成的聯合工作組審查項目提案。

(二)項目審核通過後，由中方提供 3 到 4 家中國大陸企業參與投標。決標後的工程項目，由第三方監督施工。在施工過程中，中國進出口銀行的信用額度則由中方的技術援助辦公室和安哥拉的技術團隊共同監督，安哥拉的相關部會則負責人力資源和訓練。

(三)在安哥拉財政部照會下，中國進出口銀行撥款給工程承建單位。安哥拉的石油出口收入則存入第三方帳戶，援建貸款依約由此賬戶扣還，安哥政府可自由處置賬戶差額。[106]

安哥拉模式的創新在於不全是以現金購買天然資源，而是以配套的財政，基礎建設投資和援助項目取得所望的資源。中國大陸的做法給非洲國家有多重選擇的機會。同時中國大陸聚焦於單純的經濟目的，而不同於西方國家以援助追尋廣泛的目標。[107]

二，金融和經濟合作

中國建設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在 2002 年就以直接支付給中國大陸企業的方式，提供安哥拉基礎建設基金。 2003 年，安哥拉不願接受 IMF 的貸款附加條件，轉而向中國大陸尋求資金以進行戰後重建。中安雙方在 2003 年底簽訂經濟和商業合作框架協定後，雙方更進一步擴大金融合作。

2004 年 3 月中國進出口銀行同意提供 20 億美元的公共建設投資融資方案。中國進出口銀行對安哥拉財政部管理的公共建設投資，給予 12 年期長期信貸，利率以倫敦同業拆款利率加 1.5%，外加 5 年延長限期。這類貸款要求建設工程須由中國大陸工程公司承包，工程款並由中國進出口銀行在貸予安哥拉的款項中，直接撥付給中方承建企業，但工程的 30%，由安哥拉當地企業承包。安哥拉政府以協定數量的原油代替現金償還信貸。[108]這筆貸款項目以 10 億美元為單位，

[106]Indira Campos and Alex Vines, “Angola and China: A Pragmatic Partnership,” Cooke, Jennifer ed., U.S. and Chinese Engagement in Africa: Prospects for improving U.S-China-Africa Cooperation (Washington, D.C.: CSIS, 2008), p. 37.

[107]Dent, Christopher M., ed., China and Africa Development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p. 24-25.

[108]Lucy Corkin, "China and Brazil's ECA Activity: The Case of Angola," Li Xing with Abdulkadir Osman Farah, *China-Africa Relations in an Era of Great Transformations*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13), p. 167.

區分為兩階段。第一批貸款於 2004 年底撥付，預計到 2007 年底可運用 8 億 3 千萬美金。第二階段建設項目貸款，預計 2007 年 3 月撥款，到 2007 年底實際運用貸款為 2 億 3 千萬美元。

第一階段的信貸額度約 11 億美元，涉及能源，水利，衛生，教育，交通及公共服務等 31 個承包契約，跨越全國的 50 個項目。其中，中國路橋工程有限責任公司以 2 億 1 千萬美元，整建從首都 Luanda 到 Uige 總長 371 公里的公路，為最大的項目。

第二階段的貸款要執行 17 個承包契約，52 個項目(這其中包括第一階段未完成的項目)，在新增項目中以魚業和電信最為重要。中國機械進出口有限公司承包總金額 2 億 6 千萬美元的魚業項目，其中包括：36 艘大型拖網魚船；3000 艘各類工業/施工用船；10 艘海岸巡防艇。用於通訊建設的總額約 2 億七千萬美金，項目主要為下一代通訊設施，其中包括：光纖通信網；互聯網協議；微小孔徑衛星通訊設施。2007 年 9 月中國進出口銀行增加 20 億美元信貸額度，為安哥拉政府新增之教育和醫療項目。從 2004 年到 2007 年間，中國進出口銀行向安哥拉提供了 45 億美元以石油為擔保的信用額度，並於 2010 年再追加 60 億美元。[109]

中國大陸的基礎建設金融除援助基建項目外，又有鞏固中國企業進行資源投資的政策意涵。2004 年中石化以 7.2 億美元買下安哥拉 18 石油開發區 50%股權時，正逢中國進出口銀行撥出第一筆貸款。中石化買下 18 區股份的過程是有爭議的，原先擁有 50%股份的殼牌(Shell)已和印度 ONGC Vidsh 簽下購買協議，但安哥拉國營在油公司 Sonangol 反對該協議，以致殼牌的股份最後轉賣給中石化。西方評論者認為中國進出口銀行的貸款在中石化的交易中，扮演的一定的角色。中石化更和 Sonangol 合組 Sinopec-Sonangol International 公司，以取得安哥拉的海上石油探勘區股份。但到 2007 年情勢突然逆轉，先是中石化提出在 Lobito 建煉油廠的投資，但安哥拉政府把工程交給美國公司-Kellogg Brown and Root 承建。接著中石化從先前投資的海上石油探勘區撤資。到 2008 年中石化，中海油共同集資，向 Marathon 石油協議購買 32 海上石油開發區 20%股份時，被 Sonangol 以具有優先購買權而阻擋。[110]從這個過程看，除早期中國進出口銀行的貸款和中國大陸石油公司在安哥拉的石油投資可能有直接關係外。中資石油企業受限於自身海洋石油探戡的技術能力不足，西方石油公司早已進入卡位和安

[109]Indira Campos and Alex Vines, “Angola and China: A Pragmatic Partnership,” Cooke, Jennifer ed., U.S. and Chinese Engagement in Africa: Prospects for improving U.S-China-Africa Cooperation (Washington, D.C.: CSIS, 2008), pp.35-38.

[110]Ibid., 41-43

哥拉政府的政經考量都阻礙了中資石油企業在安哥拉的擴張。但中國進出口銀行的基礎建設信貸有效促進了中國大陸建築工程業在安哥拉的機會。[111]

三，貿易和投資

安哥拉從 2006 年起長年居中非貿易額的首位，但安哥拉佔中國大陸在非洲的直投資比重與雙邊貿易相比，極為懸殊。2007 年安哥拉在中國大陸對非洲的直接投資存量中列於 12 名，而中國大陸只佔 2007 年安哥拉外國直接投資存量的 0.64%。實際上，中國大陸除投資石油業之外，中資企業並未把安哥拉視為主要的投資地區。究其原因，有下述幾方面：首先，安哥拉投資環境不佳，世界銀行《2009 年經商報告》中，在 181 個國家中，安哥拉的投資整體氣候為 168 名，執行契約為 179 名；其次，安哥拉由於基礎設施落後，區域整合不足，不利於發展外銷產業，加上人口僅 1 千 6 百萬(2006)，且 80%為貧窮人口，以致內需市場不足，在區位條件上無法吸引外來投資；最後，安哥拉的資源大部份的所有權掌握在當地政治精英手中，因此中國大陸進入石油投資的機會遠比預期的要少。[112]

(一) 雙邊貿易

1990 年代，中國大陸和安哥拉雙邊貿易額平均在 1 億 5 千萬美元到 7 億美元之間。到 2000 年成為 18 億美元，而 2005 年則躍為 69 億美元。安哥拉出口商品中，原油佔 95%，而中國大陸是安哥拉原油的第二大買家(第一大買家是美國)。到 2007 年安哥拉從中國大陸進口商品已躍居第二，僅次於葡萄牙。[113] 到 2011 年安哥拉成為中國大陸最大的非洲貿易夥伴，佔中國大陸對非貿易的 21%。2012 年，安哥拉從中國大陸的進口值佔進口總值的 20.8%，僅次於歐盟的 37.8%，位居第二。[114]2012 年安哥拉出口總值的 40%，是運往中國大陸。基本上中國大陸

---

[111]Ibid., 47.

[112]Lucy Corkin, “Uneasy allies: China's evolving relations with Angola,” in Dominiki Kopinski, Andrzej Polus and Ian Taylor eds., China's Rise in Africa-Perspectives on a Developing Conne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p.41-52.

[113]Indira Campos and Alex Vines, “Angola and China: A Pragmatic Partnership,” Cooke, Jennifer ed., U.S. and Chinese Engagement in Africa: Prospects for improving U.S-China-Africa Cooperation (Washington, D.C.: CSIS, 2008), p.40.

[114]“European Union, Trade in goods with Angola,”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06/september/tradoc_122456.pdf

長期對安哥拉入超，因為中國大陸進口以原油為主。而這是個長期趨勢，中，短期不可逆轉。以下檢視中美雙方和安哥拉的貿易情況，即可看出中國大陸的全般態勢。

2001-2011 年，中美雙方和安哥拉的貿易因進口安哥拉原油而大幅增加，中國大陸的總貿易額在 2008 年超過美國。美國自安進口的 90%為原油，而中國大陸則為 96%。2009 年中國大陸佔 39%的安哥原油出口，佔當年中國大陸進口原油的 15.7%。[115]中國大陸對安哥拉出口亦超過美國，2011 年中國大陸出口金額約 28 億美元，美國則少於 15 億美元。中方出口以工業製品，機械，運輸設備為主，美方則以機械，土木工程設備，食品為主。但從 2006-2011 年，美方和安國年平均服務貿易額約為 22 億美元。美方服務出口以商業，專業和技術服務為主。[116]

中美雙方企業都參與世界銀行的工程標案，但雙方參與領域不同。中方參與工程施工投標，美方則參與工程顧問和監理投標。2001-2011 年，世界銀行在安哥的建設合約中總金額為：顧問服務 8 千 4 百萬美元；工程施工 7 千 6 百萬美元；項目監理和技術咨詢 2 千 1 百萬美元。美國得到 1 百萬美元的顧問標和 4 百萬美元的監理標。中國大陸則得到 3 千 9 百萬美元的工程標。2002-2012 年，安哥拉政府標案 18 件，美國得到 8 件，涵蓋油汽，能源，交通，航太和重機械等領域。中國大陸則得到 1 件運輸項目，其他項目用英，法，義大利分別標得。[117]

表五: 2004-2012 年安哥拉-中國貿易額　　單位：億美元

年度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安哥拉出口額	41.1	57.4	95.2	113	197	128	200	216	287
安哥拉進口額	1.93	3.59	8.86	11.9	29.1	22.9	20	27.7	39.1
貿易總額	42.03	60.99	104.06	124.9	226.1	150.9	220	243.7	326.1

資料來源：Observatory of Economic Complexity, http://atlas.media.mit.edu/

（二）中國大陸對安哥拉的直接投資

[115]Charles Robertson, China in Africa, Economics and Strategy research (Cyprus: Renaissance Capital, April 2011). p. 20.

[116]GAO-13-280SP, “Sub-Saharan Africa: Case Studies of U.S and Chinese Economic Engagement in Angola, Ghana, and Kenya; a Supplement to GAO-13-199,”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February 2013),pp. 5-7.

[117]Ibid., 8-9.

中國大陸在安哥拉的直接投資可分為，在石油領域的投資和其他產業的投資。據安哥拉政府統計，在 2007 年有 51 家中國大陸企業登記註冊，超過 50%是工程業，其他有食品加工，橡膠製品，礦泉水和其他輕工業。在 2005-2007 年之間，安哥拉政府批准中國大陸的投資項目為 50 個，投資金額 7 千 3 百萬美元。中國大陸在安哥拉的直接投資雖較 90 年代成長，但和葡萄牙與南非比較仍然少很多。在安哥拉投資的中國大陸企業，有些是原承包援建工程的中國大陸企業，在工程項目結束後，建立分支機構留在安哥拉，如中國路橋，中國水電。安哥拉的營造業是除石油業外，最發達的產業。佔石油以外的外國直接投資的 30%, 由葡萄牙和巴西業者主導。[118] 中方工程公司聚集於價值鏈終端，低價值勞力密集的施工部份，缺乏技術顧問咨詢等高價值服務能力。中資的競爭力來自價格優勢，打破了原由葡萄牙和巴西的市場壟斷。由於品質問題，中國大陸企業在當地採購只有 5-15%不等，有些中資企業在當地自行製造建材。[119]

至於在石油工業的投資，中石化於 2004 年取得 18 石油開發區 50%的股權，是中國大陸在安哥拉的第一個石油投資。中石化以佔 55%股份和安哥拉國營 Sonangol 石油公合資成立 Sonangol Sinopec International(SSI)從事石油探勘。SSI 雖在 2005 到 2006 間積極投資，但到 2007 年黯然退出原先的投資項目。[120]

美國在安哥拉的投資大部份在石油相關領域，從 2007 年到 2011 年的直接投資存量為 34 億美元。中國大陸則為 2 億 1 千 4 百萬美元。在安哥拉 49 個石油開發區中，美國石油公司有 11 個開發區的經營權，和另外 5 個開發區的股權。中國大陸到 2012 年 9 月為止，擁有 12 個開發區的股權。但中國大陸投資的 12 個石油開發區，應屬於安中石油，而非中國大陸石油國企。[121]Vines 認為：中國大陸在安哥拉的石油戰略優勢，來自於中石化和安中石油的聯合。安中石油和安哥

---

[118]Lucy Corkin, “Chinese Construction Companies in Angola: A Local Linkages Perspective,” MMCP Discussion Paper No. 2,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March 2011), p. 16.

[119]Ibid., 24-26.

[120]中石化 2005 年參與 Total 在 2004 年撤出的 3/80 區探勘。

2006 年 SSI 取得三個新的海上油田探戡區：以 7 億 5 千萬美元，從 ENI 取得在運作中的 15 區 20%股權；同時又以 11 億美元標得廢棄的海上油用探戡區 17/06 的 27%，18/06 區 40%份；並計劃投資 30 億美元在 Lobito 設煉油廠。

2007 年 Sonangol 宣佈將自行建造煉油廠，而 SSI 也放棄在 2006 取得的三個海上油田探戡區。

[121]Charles Robertson, *China in Africa, Economics and Strategy research* (Cyprus: Renaissance Capital, April 2011). p. 21.

拉之間緊密的政商關係雖有助於中石化在安哥拉的投資,但也使西方媒體詬病為「不透明」。[122]

四, 中安關係基礎：資源和發展的交換

對安哥拉來說，中國大陸不附加條件的援助，基礎建設投資和企業直接投資所帶來的技術轉移，都有利於安哥拉的經濟發展及成長。中方的優惠貸款比歐盟和美國提供的石油抵押貸款好，而中國進出口銀行提供的援建貸款更似乎是某種催化劑。從 2004 年開始安哥拉從西方國家得到不少的信貸額度，例如 2007 年西班牙提供 6 億美元的建設援助；加拿大出口開發銀行提供 10 億美元基礎建設融資及 1600 萬美元的私營企業融資；巴西經濟社會開發銀行提供 15 億美元基金以便安哥拉在 2009 年前五個月，購買巴西工程設備，另外提供 2 億 5 千萬美元工程建設基金。世界銀行在 2009-2013 年提供安哥拉 10 億美元貸款，以協助安哥拉經濟多元化。

歐盟國家提供促進貿易發展的信用額度，2009 年德國提供 19 億美元貸款。葡萄牙提供 5 億美元，英國 7 千萬美元。西方國家這麼做，部份原因是害怕中國大陸積極的信貸政策可能會損害西方國家企業在安哥拉的商業利益。其實巴西和葡萄牙早就在安哥拉進行以石油為抵押的貸款，以進口該國產品和服務。當然各國對安哥拉的貸款，都附加對本國產品和服務的採購條件。[123]

但中國大陸提供安哥拉的信貸額度和西方國家稍有不同。雖然各國的信貸都附加採購本國產品的條件，但都比不上中國大陸以夥伴關係姿態，提供的貿易和投資優惠信貸。安哥拉政府也以中國大陸所提供的優惠，要求西方國家參照。其實安哥拉政府也希望信用多元化，以免依賴中國大陸。更希望維持國家自主性，不願成為中國大陸的扈從。[124]

西方誇大中國大陸對安哥拉的影響力，其實安哥拉政府是非常在意國家主權完整的，在 2002 年內戰結束以後不接受 IMF 和世界銀行有關重建貸款的附加條

---

[122]Alex Vines, Lillian Wong, Markus Weimer and Indira Campos, “Thirst for African Oil: Asian National Oil Companies in Nigeria and Angola,” http://www.chathamhouse.org/sites/files/chathamhouse/r0809_africcanoil.pdf. The Queensway syndicate and the Africa trade; China International Fund. The Economist (Aug 13, 2011), pp. 21-23.

[123]Lucy Corkin, "China and Angola - Strategic partnership or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Angola Brief, Vol. 1, No. 1 (January 2011), pp.2-4.

[124]Lucy Corkin, “Chinese Construction Companies in Angola: A Local Linkages Perspective,” MMCP Discussion Paper No. 2,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March 2011), p. 48.

件，才轉而向中國大陸求助。2007 年，安哥拉總統 dos Santos 在 OPEC 高峰會上，坦率表達安中關係是「中國需要自然資源，安哥拉希望發展」。安哥拉財政部長在 2007 年接受媒體訪問時，談及中安經貿關係時強調:「安哥拉和中國成長中的關係，並不意謂著中國要獨佔安哥拉向全球開放的商業和投資機會...」。雖然中國大陸對安哥拉的直接投資在成長中，但和西方國家比仍相對較少。僅 2006 年葡萄牙在安哥拉的直接投資就達 2 億美元，佔當年安哥拉外國直接投資的 57%。在安哥拉的石油領域，石油生產仍由西方各大石油公司支配。中國大陸的基礎建設貸款在安哥拉的重建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安哥拉也試著進行信貸來源多元化。除葡萄牙和巴西一直參與安哥拉的重建外，在 2006-2007 年安哥拉陸續付清對巴黎俱樂部積欠的貸款利息，並聲稱將在 2010 年清償三筆積欠的貸款。這些重建信用的舉動，都顯示了安哥拉與西方國家改善關係，建立信貸多元化的努力。[125]

中安關係的當務之急，是需要加強雙方的瞭解。雙方對彼此的歷史，語言和文化都缺乏全面而深入的研究，這種嚴重的社會文化赤字，有礙於拓寬雙邊合作的領域。

中國大陸的幫助對安哥拉的重建具有積極意義，除了信貸資助外。中國大陸在基礎建設施工上，具有工期短，價格低的優勢。進入安哥拉的中資企業，提高了安哥拉的就業，並轉移了技術。在中方信貸資助的基礎建設上，通常中資企業承擔 70%的業務，30%則由當地企業投標，以致中資企業常抱怨當地承包商在工期和品質上的缺失。雖然中資企業的援建，完成安哥拉國家重建計劃中的學校，醫院，道路和橋樑。但安哥拉急需建立制度，訓練相應的人力資源以使建成的設施能發揮作用，永續經營。

安哥拉政府目前成功利用中國大陸的資金進行國家重建，並以中國大陸的信貸-基建原素催化西方國家參與和中國大陸競爭，實現信貸多元化的目標。但無論如何，中國大陸的信貸-基建模式對安哥拉太重要，且目前無可取帶。從中國大陸的觀點看，中安關係是可持續的嗎？在可預見的將來，雙方預期保持穩定的現狀，因資金和石油是雙方關係持續穩定的基礎。Lucy Corkin 稱之為「有共同利益的怨偶」。[126]

---

[125]Indira Campos and Alex Vines, “Angola and China: A Pragmatic Partnership,” Cooke, Jennifer ed., U.S. and Chinese Engagement in Africa: Prospects for improving U.S-China-Africa Cooperation (Washington, D.C.: CSIS, 2008),pp. 43-46.

[126]Lucy Corkin, “Uneasy allies: China's evolving relations with Angola,” Dominiki Kopinski, Andrzej Polus and Ian Taylor eds., China's Rise in Africa-Perspectives on a Developing Conne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p.52.

第二節　尼日利亞：中國移民的非洲夢土?

尼日利亞位於西非東南部，南瀕幾內亞灣，西邊和貝寧交界，北接尼日爾，東北和乍德為鄰，東和東南與喀麥隆接壤。尼國面積 92 萬平方公里，人口 1 億 7 千萬，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國家。 尼日利亞原為英國殖民地，於 1960 年 10 月獨立，1971 年和中國大陸建立外交關係。尼日利亞是資源豐富國家，為非洲最大的產油國，石油儲量世界第十，非洲第二。尼日利亞 20%到 30%的 GDP 來自石油業，但因煉油能力不足，油品消費依賴進口。農業佔 GDP 的 40%,工業僅佔 4%GDP 總值。多數工業製品和糧食仍需依賴進口。尼國主要的外資來源為美國，法國和英國，投資領域為石油，銀行，建築和製造業。目前尼日利亞為中國大陸在非洲第二大出口市場，第三大貿易夥伴，2013 年雙邊貿易額為 135.9 億美元。[127]

中尼建交早期，雙方關係是以政治，外交為主。直到 1993 年以後，由於中國大陸的石油需求，中尼兩國的貿易額才逐漸重要。1999 年 Olusegun Obasnjo 當選尼國總統後，中尼雙方進入經貿關係發展的關鍵期。此時正逢中國大陸推動「走出去」政策，雙方於 2001 年簽定「貿易投資促進及保護協定」。

在 2003 年石油價格走高以來，尼國外國直接投資增加，經濟大幅改善。美國和歐盟是尼日利亞的傳統貿易和投資夥伴。尼國是世界排名第七的石油輸出國，美國為主要的尼日利亞石油和天然氣出口國。中國大陸進口尼日利亞的石油，佔中國大陸整體進口量極微。2007 年中國大陸進口石油中，尼國只佔 0.56%。[128]

豐富的石油資源，高經濟成長加上人口眾多，消費能力強。這些因素，使尼日利亞成為在非洲僅次於南非的第二大中國大陸直接投資流入國。中國大陸在非洲的經濟活動是在「建設換資源」框架內，整合貿易，投資和基礎建設援助作為主要模式。中資企業在尼國的投資是從石油向製造，電信各領域擴張，而投資產業則集中在石油，製造業，建築和電信。除此之外，中資企業更在尼國建立了以零售為主的中國城，和兩個中非經貿合作區。但尼國對中資企業的勞動條件，中國大陸廉價消費品的品質瑕疵都是多所抱怨。更認為大量消費品進口衝擊到當地製造業的生存。[129]

---

[127]新華網，新華資料：中非關係。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3/28/content_335478.htm

[128]David Zweig, "The Rise of a New Trading Nation," in Lowell Dittmer and George T. Yu eds., *China, the Developing World, and theNew Global Dynamic*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2010),p.46.

[129]Egbula, Margaret and Qi Zheng, "China and Nigeria: A Powerful South-South Alliance," West Africa Challenge, No.05 (November 2011), Published by OECD.

一，中國大陸在尼日利亞的石油投資

自 1993 年中國大陸從主要石油生產國轉為石油淨進口國之後，即積極和非洲石油資源豐富國家安哥拉，阿爾及利亞，乍德，蘇丹，突尼西亞，赤道幾內亞，利比亞，尼日爾，尼日利亞，茅利塔利亞訂定石油和天然氣供應合約。到 2007 年非洲原油已佔中國大陸進口原油的 31%。除了向海外採購原油外，在海外取得油源，亦是中國大陸保障石油安全的策略之一。

早在 1930 年代西方石油公司就開始在尼日利亞進行石油探勘，並完全主導尼日利亞的石油工業。直到 1999 年尼日利亞 Obasanjo 總統以給予亞洲國家石油開發區優先購買權的折扣，交換亞洲國家投資下游石化業和基礎建設。中國大陸在尼國的政策支持下，始有機會進入尼國石油市場。[130]2004 年，中石化和尼日利亞國家石油公司（NNPC）簽訂在尼日河三角州 64 和 66 區的石油開採租約。同時中石化參與 NNPC 和意大利 Eni 共同開發 Okono 油田。

2005 年尼日利亞以石油換基礎建設方式標出 77 個石油開發區。但中國大陸誤以為，投標前的協議即代表大勢底定而沒有參與投標。尼日利亞於 2006 年再次開放小規模的石油開發區標案，中石油以投資 40 億美元的基礎建設為附加條件，取得 4 個石油開發區。這些基礎建設交換項目以修復 Kaduna 煉油廠為主，另外包括鐵路和發電廠項目。中石油取得的這些開發區中，有部分是西方石油公司於 1993 年到 1998 年間放棄的「成份油合約」區。[131]

2006 年，NNPC 同意同中海油取得尼日河三角州深海石油開發區，包括 Akpo 油田的探勘權，和以 27 億美元取得 OPL246 開發區的 45%股權，及 70%的盈餘分配權。事實上在 2006 年初，印度國營石油天然氣公司已以 20 億美元投標 OPL246 區，但被印度政府阻止。因為印度政府認為 OPL246 區缺乏可行性，並且有所有權爭議。即尼日河三角洲存在政治/恐怖主義風險。

由於石油資源分配不公，造成尼日河三角洲解放運動（MEND）崛起。2006 年初，MEND 民兵攻擊三角洲石油設施，綁架工作人員，並揚言要戰鬥到完全控制尼日河三角州為止。為阻止 MEND，尼日利亞向中國大陸尋求軍事援助，但迄今為止 MEND 並未被消滅，攻擊行為仍時有發生。中國大陸在尼日利亞的石油資產，是些在規模和品質上無法引起西方石油集團興趣的次級品。同時，中國大陸

---

[130]Ibid

[131]Ian Taylor, *China's New Role in Africa*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2009),pp.47-48

在非洲石油投資的整體商業價值，只有國際石油公司在非洲投資價值的 8%,投資額只佔全非洲石油投資總額的 3%。[132]

2007 年尼國政府輪替，新任總統 Yar'Adua 取消或暫停前屆政府和中國大陸的資源交換基礎建設項目。中尼雙方直到 2010 年新政府就任，才再重新推動雙邊經濟合作。面對新的政治現實，中石化於 2009 年 8 月以 72 億美元併購加拿 Addax 石油，取得 Addax 在尼日利亞，加彭和伊拉克的油田。[133]

2010 年中尼雙邊貿易金額為 177 億美元，2000 年以來雙邊貿易成長了 10 倍，尼日利亞對中國大陸出口成長了兩倍。尼日利亞為中國大陸在非洲的第四大貿易夥伴，第二大對非洲出口國。尼國出口到中國大陸產品中 87%為石油及天然氣，進口則為機械和消費製品為主。[134]

但是 2010 年尼日利出口到中國大陸的原油僅為總出口原油的 1.6%。當年，尼日利亞原油出口中的 58.7%到美國，巴西佔 11%。[135]這不表示中國大陸石油企業所取得的投資成份油和合約油，僅佔 2010 年尼日利亞出口原油的 1.6%。因為中資石油公司每年取得的原油只有一部份運回中國大陸。其餘在國際市場銷售，以獲取更高的企業利益。從這點看，中國大陸的石油企業不全然是國家能源政策的執行者，而是依照商業運作，以追求利潤為首要目標。[136]

二, 尼日利亞的紡織業

尼日利亞是非洲第三大紡織工業國，僅次於埃及和南非。早在 1960 年代，港商和台商已到尼國投資紡織業和汽車零件業。當時港，台投資主要著眼於低勞動力成本。到 1970 年代尼國紡織業更受益於「多邊纖維協議」(Multi Fiber Agreement, MFA)給尼日利亞免配額出口的優惠。但這些紡織業投資者最終大都

---

[132]Ibid., 45-49

[133]Egbula, Margaret and Qi Zheng, "China and Nigeria: A Powerful South-South Alliance," West Africa Challenge, No.05 (November 2011), Published by OECD, pp.4-5,11-12.

[134]Ibid., 7

[135]Ibid., 11

[136]Chi Zhang, "China's energy diplomacy in Africa: The convergency of national and corporate interests, Christopher M. Dent ed., China and Africa Development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p.144-145, 152-153.

鎩羽而歸，主要原因在於經營環境不佳(尼國棉花減產，基礎設施不足)和中國大陸製造業崛起。[137]

尼日利亞希望能建立本土製造業，除得以提高就業外，更有助於尼國經濟擺脫對石油的依賴。更重要的是紡織和成衣業被認為是當地就業和發展的基礎，因此行業的衰退造成恐慌和過度誇大的爭議。一般都指責中國大陸，認為中國大陸的低價紡織品和成衣佔據了非洲的外銷市場；非洲進口大量的中國大陸消費品，則直接威脅了本地製造業的生存。事實上，中國大陸和非洲的紡織成衣業都是全球供應鏈的一環，他們的利潤和生存取決於終端消費市場。更精確的說，是終端市場的零售和批發業者決定供應鏈低端生產者的存續。除了價值鏈競爭因素外，在非洲到處存在的中國大陸移民零售業者，也扮演推動中國大陸消費品進口的重要角色。[138]

尼日利亞紡織業者和公民團體指責中國大陸進口商品時，往往忽略尼國製造業的內生性問題：競爭力不足和造成競爭力不足的原因。Ian Taylor 認為，基礎設施不足是造成尼國製造業效率低落的主要原因(電力不足為主因)。[139]

事實上，非洲的紡織，成衣業在中國大陸消費品進入非洲前，就已敗像畢露。以 1975 到 2000 年間的加納紡織成衣業為例，其產值減少 50%，僱用勞動力減少 80%。一葉知秋，實質上中國大陸和非洲紡織業的衰敗，關聯甚少。但中國大陸紡織品出現在非洲，使情況更惡化則是不爭的事實。國際工會組織指控，『非洲紡織業不能和中國競爭，是因為中國大陸政府補貼；人為壓低匯率；沒有自主工會，以致壓低勞動條件，降低成本』。事實上，以 2005 年的資料為準，非洲紡織業的工資比南亞國家高，但低於印度和中國大陸。而中國大陸的紡織業工資，是當時開發中國家最高的。2005 年，中國大陸紡織業平均月薪 205 美元，烏干達為 65 美元，埃塞俄比亞則僅 30 美元。

大量中國大陸的便宜商品進入非洲，有利於中國大陸在非洲的零售業者，和非洲的消費者。至於非洲的製造業是否能利用中國大陸和非洲的經濟合作所提供的機會，刺激競爭力和創新，擴大出口，則視非洲各國政府和業界是否能充分利用機遇而定。

尼日利亞把紡織業的沒落，歸因於中國大陸的進口商品，正反映了中國大陸對非洲經濟合作的困境。這種困境是由中國大陸不受管制的零售業者進口或走私中國大陸的廉價低品質商品，衝擊地主國市場。再加上地主國商業界因競爭力不

---

[137]Egbula, Margaret and Qi Zheng, "China and Nigeria: A Powerful South-South Alliance," West Africa Challenge, No.05 (November 2011), Published by OECD,pp.14-15.

[138]Taylor, Ian, China's New Role in Africa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2009),pp.63-66.

[139]Ibid., 72-73

足和公民團體在知識上對前殖民宗主的崇拜所引起的『中國恐懼症』情緒所形成的。而中國大陸在當地中小企業投資者和社區的溝通不良可能是造成『中國恐懼症』的原因。[140]

三， 中國大陸在尼日利亞的投資概況

外國直接投資所帶來資本和技術，可以強化地主國的競爭力和創新，提高就業率，促進出口。2003 年，中國大陸在尼國外資中為第 5 位，次於美德英法。尼國為第 15 位吸收中資國家。其實中國大陸的直接投資，佔尼日利亞直接投資總流入量的比例極微。[141]

中國大陸在尼日利亞的投資可以分為國企和私營企業來區分。國有企業的投資目的為資源尋求，投資產業以石油為主。私企的投資目的在市場尋求，投資領域在農業，製造業和電信業。[142]

(一) 電信產業投資

非洲大陸的電信市場是繼石油，天然氣以後，另一個主要的外資直接投資產業。中國大陸電信業者以承諾向非洲地主國技術轉移，加上低廉的手機價格形成競爭優勢。[143]

尼日利亞是中國大陸電信產業在非洲的重要市場，尼日利亞主要的電信營運商為南非的 MTN,科威特的 Zain,印度 Bharti Airtel 及尼國本土公司 Globacom。華為和中興在中國大陸政府財政支持下，和當地電信營運商合作，從事電信基礎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140]Ibid.,86

[141]Olugboyga A. Oyeranti, M. Adetunji Babtunde, E. Olawale Ogunkole, Abiodun S. Bankole, “China-Africa Relations: A Case Study of Nigera,” pp.2-3. AfricaPortal.http://www.africaportal.org/library

[142]Ibid,63-64

[143]Daouda Cisse and Ross Anthony,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Africa: Entrepreneurs or The Long Arm of The State?" Ivey Business Journal Online (July/August 2013). http://iveybusinessjournal.com

建設。2002 年 5 月尼日利亞政府推動鄉村電話計劃，在中國大陸貸款支持下向中國大陸設備製造商採購設備。[144]

中興和華為具有價格競爭優勢，華為的價格比易利信和諾基亞要便宜百分之五到十。中興的價位只有歐盟廠商的 60%-70%。中興早在 1999 年便在尼日利亞建立手機工廠。不過尼國媒體批評：中興手機廠只是進口中國大陸零組件，由尼國勞工在生產線組裝的組裝廠而已。[145]中興於 2005 年為尼國 Nitel 電信擴建 CDMA 無線通訊網路。2010 年在中國進出口銀行融資支持下，中興取得尼國 4 億美元的通訊安全系統合約。

尼日利亞華為技術有限公司於 2004 年取得尼國 V-Mobil 採購 8 千萬美元 GSM 網路設備合約。於 2010 年，華為和 MTN 電信合作，建設鄉村電話服務。華為在尼國首都 Abuja 設置技術支援中心和訓練中心，前者為用戶提使用咨詢和一般客服。訓練中心則為用戶工程人員提供訓練課程。[146]

（二）中國大陸在尼日利亞的製造，零售和工程承包

中國大陸在尼日利亞設有兩個中非經濟貿易合作區-萊基自由貿易區和奧貢廣東自由貿易區。在 2006 年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提出經貿合作區構想之後，有些非洲國如佛得角和坦桑尼亞表達參與經貿合作區的意願。但經中國大陸商務部評估後，僅有五個國家入選。在這五個國家中，尼日利亞是唯一設立兩個經貿合作區的國家。這說明尼日利亞的經商環境，相對其他非洲國家較佳。[147]2010 年中遠集團，招商局和中非發展基金共同投資 Lagos 港 Tin-Can 貨櫃碼頭，準備建設 Lagos 為中國大陸對西非的貿易中心,亦可做如事觀。

2009 年，已有數百家中國大陸小型製造業在尼國投資，行業遍佈食品，塑膠，水泥，製藥等領域。從事批發和零售業的中國大陸非洲移民，在尼日利亞隨

[144]Roselyn Hsueh, Michael Byron Nelson, How China is Impacting Business-State Relation in Africa: The Cases of Angola and Nigeria, Paper for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ugust 30, 2013),p.19.

[145]Gregory Mthembu-Salter, “Elephants, Ants and Superpowers: Nigeria's Relations with China,” Occasional Paper No. 42, South Afric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airs (September 2009),p.17.

[146]Margaret Egbula and Qi Zheng, "China and Nigeria: A Powerful South-South Alliance," West Africa Challenge, No. 05 (Paris: OECD, 2011), PP.12-15.

[147]Deborah Brautigam, TANG Xiaoyang, "African Shenzhen: 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in Africa,"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49, No. 1(2011), p. 31.

處可見。[148]但一般中國大陸製造業到尼國投資，大多依循先出口產品到尼日利亞，再到尼國設辦事處，最後投資辦廠的模式。有些工廠經營者會進一步在尼國投資設立工業區，建立產業鏈，以群聚效應鞏固自身優勢。中國大陸的建築工程業者也會在當地投資建材相關產業，以保障施工品質。[149]

2008 年在北京註冊的中昊海外工程有限公司和尼日利亞 Loratt Capital 合資設立年生產壹佰伍拾萬噸的水泥工廠。總投資額 3 億美元，中昊出資 55%。水泥廠建廠工程，生產技術，設備和營運管理都由中方負責。中方承諾一旦尼日利亞員工訓練成熟，中方將實行工作責任轉移。這項投資，中國進出口銀行提供 90%的融資。[150]

Lagos 中國城建於 2004 年，約有 120 餘家店舖販售商品包含，成衣，鞋類，飾品，玩具，日用品，電器等。平均每家店僱用兩位當地員工。中國城販賣的商品大部份自中國大陸進口，小部份由當地中資企業製造。除零售業務以外，由於中國城的集客力強，周邊聚集了相應的運輸和餐飲業及銀行，以應需求。據 2014 年 5 月中國日報網，因為經營不易，中國城已由繁華轉為蕭條，「所有的餐館都關門了，多半的商店也都空了...」,倖存者大多轉型為批發業者。[151]

中國土木工程集團為在尼日利亞最大的中資建築承包商。自 2000-2009 年承建尼國工程超過 50 個，總金額超過 100 億美元。該公司 2000-2009 年主要工程包括：修復 Papalanto-Lagos 高速公路及後續養護工作；5000 個房間的 Abuja 非洲全運會選手村；修復 Ikot-Okoroette 公路；承包尼日利亞通訊署辦公大樓；承建萊基自由貿易區；承建尼國首都 Abuja 到 Kaduna 的鐵路。Abuja-Kaduna 鐵路程費用 8 億 5 千萬美元，其中含中國進出口銀行 5 億美元貸款。[152]

尼日利亞豐富的石油蘊藏量和人口優勢，使中國大陸不能忽視尼日利亞的經濟潛力。[153]中國大陸對尼日利亞的直接投資，貿易和建設援助，為尼日利亞提供

---

[148]Margaret Egbula and Qi Zheng, "China and Nigeria: A Powerful South-South Alliance," West Africa Challenge, No. 05 (Paris: OECD, 2011), p. 17

[149]Jin Gu, "China's Private Enterprise in Africa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Africa Development," EuropeanDevelopment Research, Vol. 1, No. 1(January 2009), p. 575.

[150]Gregory Mthembu-Salter, Elephants, Ants and Superpowers: Nigeria's Relations with China, Occasional Paper No. 42, South Afric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airs (September 2009),p.18. http://dspace.africaportal.org/library

[151]「尼日利亞中國城」, 中國日報網, http://language.chinadaily.com.cn/article-218372-1.html

[152]Margaret Egbula and Qi Zheng, "China and Nigeria: A Powerful South-South Alliance," West Africa Challenge, No. 05 (Paris: OECD, 2011), P. 14.

[153]Gregory Mthembu-Salter, “Elephants, Ants and Superpowers: Nigeria's Relations with China,” Occasional Paper No. 42, South Afric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airs (September 2009),p.24. http://dspace.africaportal.org/library

了發展的機遇。但中國大陸在尼日利亞的投資過程，受到尼國政策欠穩定的干擾並不順遂。而在實際的經營和生活觀感層面上，中尼雙方都有各自的抱怨。中資企業認為，固然尼國存在政治不確定的投資風險，但腐敗和尼日利亞的商業信用風險更甚於政治風險。[154]雖然中國大陸提供的基礎建設援建，改善了尼國的工商業經營環境。但尼日利亞商界和民間團體抱怨：中國大陸的工業消費品進口，打擊了尼國本土製造業；中資企業勞動條件不佳，薪資不高；中資企業不僱用當地專家，不遵守勞動法令；中資企業使用中國大陸的設備和零組件。[155]在 Utomi 的田野調查中，他發現尼日利亞官方認為：中國大陸忽略了非洲國家的個別差異，西方國家則能區別對待，但中國大陸的不干涉政策可以平衡西方國家，有利於尼國。商業社群一般同意，中國大陸的投資可以帶來實質的利益，但中資企業在非洲其自身穫利大於對非洲當地的幫助。尼國商界人士並認為，尼國政府並未善加利用中方的合作發展：尼國缺乏制度；官僚體系腐敗使發展的成果不佳；人力資本不足，使技術轉移成效不高。[156]

至於中國大陸提供的發機會最終成效如何，則取決於尼國政府的政策引導和社會環境。尼日利亞的困境在官僚體系和社會環境在運作上缺乏制度和執行能力。這限制了尼國在農業，基礎建設和技術轉移上的進展；在人力資本開發上，語言障礙，教育程度，文化差異，影響中資企業的技術轉移。縱使有些尼國企業主模仿中國模式，取得不錯的成效，如果沒有語言障礙，效果將更好。[157]

2000 年以來，中國大陸對尼國長期貿易出超，勞動密集加工產業向尼國轉移和電信和工程業承包相關基礎建設。對中國大陸而言其意義在於有效開拓了新的市場，轉移了剩餘生產力，培養了國際型企業(華為),壯大了工程業的國際承包實力。正如 Utomi 田野調查中顯示的，中國大陸在合作發展中是穫利較大的一方。但穫利大小是次要問題，中國大陸的主要問題是：如何使中資經營者，外派員工，移民能和中國大陸的非洲政策建立連結。

表六：2004-2012 年尼日利亞-中國貿易額　　單位：億美元

---

[154]Margaret Egbula and Qi Zheng, "China and Nigeria: A Powerful South-South Alliance," West Africa Challenge, No. 05 (Paris: OECD, 2011), P. 19.

[155]Olugboyga A. Oyeranti, M. Adetunji Babtunde, E. Olawale Ogunkole, Abiodun S. Bankole, *China-Africa Relations: A Case Study of Nigera*, AfricaPortal, pp. 63-64. http://www.africaportal.org/library

[156]Pat Utomi, "China and Nigeria," in Cook, Jennifer, ed., *U. S. and Chinese Engagement in Africa: Prospects for improving U.S.-China-Africa Cooperation* (Washington, DC, CSIS, 2008), pp. 52-56.

[157]Nabine, Djeri-wake, “The impact of Chinese Investment and Trade on Nigeria Economic Growth,” ATPC Working Paper No. 77, (UN,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 2009), PP. 21-22.

年度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尼日利亞出口額	4.06	4.62	2.5	5.99	4.86	8.73	10.9	21.5	14.2
尼日利亞進口額	17.2	23	38.5	41.5	62.2	60	69.2	92.8	90.3
貿易總額	21.26	27.62	41	47.49	67.02	68.73	80.1	114.3	104.5

資料來源：Observatory of Economic Complexity, http://atlas.media.mit.edu/

第三節　蘇丹：中石油投資的泥淖？

蘇丹面積 188 萬平方公里，人口 3089 萬。位於非洲東北部，紅海西岸，海岸線長約 720 公里。北鄰埃及，西接利比亞，乍德，中非，南方為南蘇丹，東邊為埃塞俄比亞和厄立特里亞。蘇丹自然資源豐富，雖是是聯合國定義的「世界最不發達國家」。但受惠於近十餘年來石油價格維持高價，經濟保持快速成長（2008 年，經濟成長率 6.5%，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2132 美元）。[158]

蘇丹除尼羅河谷外，由於地處生態過渡帶，長年乾旱。更由於 19 世紀帝國主義分而治之的操弄。使蘇丹自 1956 年獨立以來，即陷於長期動亂-南蘇丹要求獨立和達爾富爾（ Darfur ）遊牧和農耕族群之爭導致的人道危機。

一，蘇丹的投資風險

蘇丹在英-埃殖民統治時期的經濟地理仍影響著現代蘇丹。英國殖民當局採取「保持原狀」政策（ a holding operation ），不但使南蘇丹在政治和經濟上被刻意的邊緣化。更由於區域間不同的教育和司法體系，使獨立後的蘇丹難以融合。而蘇丹獨立後在政治上更承襲了殖民主義遺留的威權特性和統治精英的利益壟斷，使原有的分化更為擴大。[159]歷史形成的區域分化，使蘇丹缺乏政治穩定性而成為高風險的投資地區。

(一) 南蘇丹問題

回顧歷史，蘇丹於 1821 年被奧圖曼帝國埃及總督阿里征服，1870 年代英國勢力進入埃及並向蘇丹擴張。1898 年英軍鎮壓蘇丹回教徒在先知（ Mahdi ）領導的叛亂後，蘇丹於 1899 年到 1955 年進入由英國主導的英-埃共管時期。表面上

---

[158]「中外關係」,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n/2007-19/21/content_6917139.htm

[159]Daniel Large, "The end of abstraction," Christopher M. Dent ed., *China and Africa Development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p. 89.

此時期由埃及指派英國同意的總督治理蘇丹，但實質上是英國的殖民地。在英埃共管時期，將南北蘇丹劃分為兩個政治實體分而治之。由於種族，宗教和文化的差異，英國原本準備將南蘇丹和烏干達整併，但最終決定統合南北蘇丹為一。1955 年 8 月 18 日於蘇丹獨立前夕，由英國領導的蘇丹部隊中的南蘇丹軍士官發生兵變。兵變由於蘇丹政府處置失當，轉為長達 17 年的第一次蘇丹內戰。內戰在 1972 年 3 月以南蘇丹取得自治權達成停火。1978 年南北蘇丹交界處發現石油，石油利益成為誘發第二次內戰的因素之一，加上 1983 年蘇丹中央政府宣佈蘇丹為回教國家並終結南蘇丹自治。遂引發 1983 年由蘇丹人民解放軍（ SPLA ）領導的反中央政府的內戰。蘇丹第二次內戰於 2005 年在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壓力下，由蘇丹政府和南蘇丹達成全面和平協議（ Comprehensive Peace Agreement ）。同意恢復南蘇丹自治權，並於 2011 年南蘇丹以公民投票決定是否獨立。最終南蘇丹於 2011 年經由公投獨立。[160]

（二）達爾富爾（ Darfur ）衝突

達爾富爾位於蘇丹西部，面積 50 餘萬平方公里，和利比亞，乍得，中非為鄰。傳統上，遊牧的阿拉伯人在北部逐水草而居，南部則為信奉基督教的黑人農耕畜牧部落。1980 年代北部乾旱，阿拉伯牧民被迫南遷，因爭奪水源和當地土著部落發生衝突。2003 年開始的南蘇丹和平進程討論，更誘發達爾富爾地區基督教黑人部落走向反政府之途。在長期武裝衝突下，達爾富爾地區部族矛盾嚴重，處於無政府混亂狀態。由於蘇丹政府武裝阿拉伯牧民打擊黑人部落，聯合國安理會於 2005 年數度提案制裁。但西方論者認為在中國大陸保護下，制裁力度不足。[161]

二，中國大陸在蘇丹的投資

中國大陸在蘇丹的投資是以石油投資為主，由於 1993 年以後，中國大陸從石油淨出口國轉變為石油淨進口國。為保障石油供應，中國大陸積極向海外尋求石油資源。在多數的石油資源早已被西方石油公司所掌握的情況下，中國大陸只能向被西方制裁的國家找投資機會。蘇丹自獨立以來的長期內部衝突，被人權團體長期譴責，在 1993 年更被美國界定為，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1995 年蘇丹總統 Omar al-Bashir 訪問北京，簽訂兩國第一個石油探勘協定。開始踏出中國大

[160]A Human Rights First Report, Investing in Tragedy: China's Money, Arms, and Politics in Sudan (New York: human righters first, 2008), p.4.

[161]Ibid.,7.

陸在蘇丹石油投資的第一步。[162]中國大陸在蘇丹的投資是以中石油(CNPC)為主，中石化也有參與蘇丹的石油投資。自 1996 年到 2007 年，中國大陸是蘇丹最大的石油投資者。2008 年蘇丹原油 60%出口至中國大陸，中石油更協助蘇丹建立石油工業系統，以供應蘇丹的國內需求。

中國大陸和蘇丹的合作發展模式是以直接投資和援建工程相結合，其中包括優惠信貸額度，債務減免。這些措施和其他非洲國家並無不同。但相對於尼日利亞和安哥拉，由於蘇丹被美國制裁少了西方石油企業的競爭，使中石油的投資空間較大。1996 年以來中國大陸在蘇丹的投資 97%為資源尋求型，即以中石油/中石化的投資為主。除石油投資以外，中國大陸在蘇丹的投資初期以中小型服務業為主。這些中小企業投資者受到石油國企和蘇丹經濟成長的鼓舞，到蘇丹尋找機會。除服務業之外，以蘇丹市場為主的勞力密集製造業是中國大陸中小企業在蘇丹的另一個投資領域。[163]

1996 年，中國大陸和蘇丹貿易總額約 1 億美元，蘇丹出口中 84.25%為棉花，從中國大陸進口則以塑膠製品，機械及工程車輛為主。到 2012 年雙邊貿易達 33 億美元，蘇丹出口商品中 95.42%為原油，進口則以電話，輪胎，紡織品和鞋類為主。[164]

蘇丹 1999-2008 年平均 GDP 成長為 7.9%，其中石油出口對 GDP 成長的貢獻超過 50%。蘇丹當地企業也受惠於中國大陸的投資和基礎建設援助。蘇丹前五大企業的經營範圍都涉及石油和工程服務業。以前五大蘇丹企業中的 Danfodio Holdings 和 Hijilig oil Co.為例，都分包 Marawi 大壩工程。Dafodio 更和中資國企川鐵國際合作，取得毛里塔尼亞總價 6 億美元的鐵路工程建案。[165]

表七：2004-2012 年蘇丹-中國貿易額　　單位:億美元

年度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蘇丹出口額	25.6	38.2	36.8	36.9	68.9	52.6	10.3	74.4	13.3
蘇丹進口額	7.77	14.1	17	13.8	18.1	17.2	21.5	21.7	19.8
貿易總額	33.37	52.3	53.8	50.7	87	69.8	31.8	96.1	33.1

[162]Ibid., 38.

[163]Kabbashi M. Suliman and Ahmed A. A. Badawi, “An assessment of the Impact of the China's Investment in Sudan,” http://dspace.africaportal.org/jspuib/bitstream/123456789/324361/1/Sudan-China-FDI-relations.pdf

[164]Observatory of economic Complexity, http://atlas.media.mit.edu/explore

[165]Kabbashi M. Suliman and Ahmed A. A. Badawi, “An assessment of the Impact of the China's Investment in Sudan,” pp. 26-27. http://dspace.africaportal.org/jspuib/bitstream/123456789/324361/1/Sudan-China-FDI-relations.pdf

資料來源：Observatory of Economic Complexity, http://atlas.media.mit.edu/

(一) 中國大陸在蘇丹的石油投資

早在 1959 年蘇丹脫離殖民統治之初，西方石油公司 Chevron, Agip, Total 就已在北蘇丹進行石油探勘，但都一無所穫。直到 1972 年內戰結束後,Chevron 在 1975 年取得南蘇丹石油探勘權才有突破性進展。Chevron 在 1979 年發現第一個蘇丹儲油區，並於 1983 年和荷蘭及阿拉伯業者合作投資油管建設。但 1983 年蘇丹第二次內戰爆發，南蘇丹解放組織以石油基礎設施和石油工作人員為攻擊目標，Chevron 放棄該油管計劃。加上美國於 1993 年把蘇丹列為支持恐怖主義國家，接踵而來的是 1996 年安理會通過外交制裁，1997 年美國實施貿易制裁。西方石油公司也逐漸退出蘇丹的石油開發市場。從 1996 年開始，蘇丹的石油投資和生產幾乎完全由亞洲國家-中國大陸，印度，馬來西亞主導。同時蘇丹的石油出口也以亞洲地區為主，以 2011 年蘇丹地區(蘇丹和南蘇丹)出口百分比為例：中國大陸佔 61%,馬來西亞 9%,日本 8%,印度 4%。[166]

中石油在蘇丹的投資是中國大陸在非洲最突出的能源合作。中石油把蘇丹受內戰困擾和西方國家制裁的蘇丹石油業，轉變為蘇丹最重要的出口產業。由於西方國家對蘇丹的制裁，使中石油有機會全面涉入蘇丹石油產業鏈。蘇丹石油儲量雖只佔全非洲儲量的 5%,但到 2010 年中國大陸的海外石油投資中蘇丹佔 15%。[167] 中石油在蘇丹的業務更從上游探勘，採掘，向中，下游煉油，油管，儲油，石油貿易到零售延伸。中石油在蘇丹擁有石油相關的資產超過 70 億美元。中石油在蘇丹投資不單是擴張企業的海外領域，更協助對蘇丹從石油淨進口國，轉變為石油淨出口國。[168]

1, 石油探勘權取得

中石油於 1995 年買下 Chervon 持有的 6 開發區的開採權。1996 年，加拿大 Arakis 出售擁有 1,2,4 開發區的大尼羅石油營運公司(GNPOC)75%的股份。中石油取得 40%股份，其餘由馬來西亞 Petrona 取得 30%,蘇丹國營石油公司

[166]姜恆坤，傅海娜，「蘇丹石油：從內政焦點到外交難題」,**西亞非洲** (北京), 2012 年，第 6 期，頁 78-81。

[167]Julie Jiang and Jonathan Sinton, *Overseas Investments by Chinese National Oil Companies* (Paris: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11), p.18. http://www.iea.org/publications/freepublications/

[168]Chi Zhang, "China's energy diplomacy in Africa," Christopher M. Dent ed., *China and Africa Development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p. 150-153.

Sudapet 取得 5%。1998 年加拿大石油公司 Talisman 買下 Arakis 手中的 GNPOC 股份。2001 年在加拿大政府的壓力下，Talisman 出清手中的 GNPOC 股份。中石油有意購買，但蘇丹政府不同意。最後由印度 ONGC Videsh 買下 Talisman 手中 25%的 GNPOC 股份。從蘇丹政府不同意中石油增加在 GNPOC 的持股中，充分表明了蘇丹在石油領域投資多元化的意圖。2003 年，中石油取得擁有 3,7 石油開發區的 Petrodar 石油公司 41%股份。2005 年和 2007 年，中石油分別取得紅海海上油田 13 和 15 區探勘權，並負責營運管理。[169]

2, 石油基礎建設

由於蘇丹油田深處內陸不易出口，中國大陸為蘇丹建立油管系統和港口終端設施。油管系統從 1 開發區經 2/4 開發區到蘇丹港全長 1500 餘公里。油管系統由中石油子公司-中國石油工程建設公司(CPECC)施工。於 1999 年完工後，交由 GNPOC 操作。另外中石化子公司中石化國際石油服務公司承包從 3/7 開發區到蘇丹港，總長 1000 公里的油管。除油管系統外，中石油和中石化分別在蘇丹港南方 25 公里處，各自建立容量 40 萬桶石油的儲油槽。兩座儲油槽由 CPECC 承建，於 2007 年完工後由分別由 GNPOC 和 Petrodar 管理。中石油於 1998 年開始規劃在蘇丹建造煉油廠。在 2000 年喀士穆煉油廠建成前，蘇丹國內的石油消費是依賴進口。喀士穆煉油廠由蘇丹政府和中石油各持 50%股份，但由中石油經營管理。據蘇丹政府估計油管和煉油廠完工後，第一年即可省下 3 到 5 億美元的石油進口費用。2001 年，中石油在蘇丹開始經營加油站。2002 年，中石油建造石化工廠，生產聚丙稀。

3, 中石油在蘇丹的企業社會責任表現

中石油在蘇丹進行石油投資過程中，同時努力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在環境保護標準上力求符合蘇丹政府要求，並積極參與社會服務以取得當地社區認同。具體的的環保措施包括：在 1/2/4 石油開發區投資 2 億美元，建立油田污水生物分解系統和建造喀士穆煉油廠的污水處理廠。在對當地社區的援助上，採取為社區『建醫院，蓋學校，打水井，舖道路』的方式，在蘇丹建了 4 所醫院，109 個診所，35 所學校，水井 106 口。到 2009 年中石油累計慈善捐款伍仟萬美元。並和

[169]張安平，李文，于秋波，「中國與蘇丹石油合作模式的實證分析」，**西亞非洲**（北京），2011 年第 3 期,頁 5-8。

蘇丹政府簽定「石油專業人材培訓協議」,以提升當地員工技術和管理能力，培養高級管理人材。[170]

中石油在蘇丹的投資是從石油探勘開發，石油儲運，煉油化工到產品銷售，在蘇丹建立一體化的現代石油工業體系。中國大陸的石油投資使蘇丹從一個經濟落後的石油進口國，成為有完整石油工業體系的石油出口國。[171]

4, 南蘇丹獨立後的新形勢

蘇丹是下撒哈拉非洲第三大產油國，中國大陸是蘇丹最大的石油投資者。2008 年蘇丹原油 60%出口至中國大陸。蘇丹 85%的油田位於南蘇丹境內。2005 年南蘇丹自治政成立後宣稱在 2011 年公民投票之後，將重新評估所有的石油投資合約。雖然內戰時期中國大陸是蘇丹政府的支持者。2005 年全面和平協定簽定一個月，南蘇丹代表團即受邀前往北京訪問。2007 年南蘇丹代表團到北京，討論事有關石油事誼，並廣泛討論南蘇丹的電信，住宅和公路建設。胡錦濤主席於 2007 年 2 月訪問蘇丹，並和代表南蘇丹的蘇丹副總統 Kiir 私下討論石油投資議題。中國進出口銀行在 2006 年，提供南蘇丹 10 億美元優惠貸款。中國大陸代表團在 2007 年 8 月到南蘇丹，討論提供醫藥，教育，農業和基礎建設等事宜。[172]

2011 年 7 月南蘇丹共和國成立。南蘇丹獨立之後立即面臨幾項重大議題：和蘇丹存在爭議的 Abyei 地區歸屬問題；獨立前的債務分攤；石油收入分配和使用油管的過境費。於 2011 年 5 月，南蘇丹公投前夕，南蘇丹突擊在爭議地區 Abyei 護送聯合國特使團車隊的蘇丹部隊，造成 22 人死亡。蘇丹反擊並佔領 Abyei 及周邊地區，在非洲聯盟調停下，蘇丹撤軍但緊張情勢並未緩解。

南蘇丹獨立後，蘇丹要把原先每桶 1 美元的原油過境費用提高為每桶 32 美元，以彌補南蘇丹獨立後蘇丹的財政損失。但南蘇丹堅持只付 1 美元以下。雙方僵持下，由於南蘇丹積欠原油過境費，蘇丹在 2012 年 1 月扣押 170 萬桶南蘇丹原油以抵債。南蘇丹則立即停止原油生產，並以協助蘇丹盜取石油為罪名驅逐 Petrodar 中方總經理。到 2013 年 4 月南蘇丹同意付每桶 9.8 美元設施使用費，才再恢復原油生產。但雙方爭執的大多數議題仍是懸而未決。[173]

---

[170]張安平，李文，于秋波，「中國與蘇丹石油合作模式的實證分析」，**西亞非洲**（北京），2011 年第 3 期,頁 9。

[171]張安平，李文，于秋波，「中國與蘇丹石油合作模式的實證分析」，同前揭書，頁 3.

[172]A Human Rights First Report, Investing in Tragedy: China's Money, Arms, and Politics in Sudan (New York: human righters first, 2008), p.22.

[173]楊振發，「中國與南蘇丹石油合作的機遇與挑戰」，**西亞非洲**（北京），2012 年第 3 期，頁 95。

2012 年 3 月 26 日南蘇丹攻擊蘇丹邊界石油區城市 Heglig，雖一度撤軍，但於 4 月 10 日又突擊佔領 Heglig 油田。在蘇丹反擊下，南蘇丹侵入部隊於 4 月 22 日退回國境。但零星戰鬥到 9 月 26 日雙方在非洲聯盟調停下，達成協定後才停止，不過 Heglig 油田設施已被破壞殆盡。[174]

2013 年 12 月 15 日 Nuer 族的南蘇丹副總統 Marchar 和 Dinka 族的總統 Kiir 雙方支持者在首都 Juba 街頭大戰。2014 年 1 月 23 日，雙方同意停火，但零星戰鬥仍在全國範圍內持續。[175]同時從 2013 年開始南蘇丹就規劃，參與肯尼亞 Lamu 港的油管建設。Lamu 油管已由日本 Toyota 轉投資的營造商開始施工烏干達-肯尼亞段，一旦延伸至南蘇丹對蘇丹的衝擊可想而知。就蘇丹石油開發的歷史脈絡看，蘇丹南北分離有可能打破前蘇丹地區石油生產由亞洲國家主導的局面。[176]

（二）中國大陸的援建工程

中國大陸對蘇丹除提供財政支援外，並提供從能源到公路大範圍的援助建設方案。主要的援助建設有:

1, 2007 年，中國鐵路工程總公司以 11 億美元承建蘇丹喀士穆（ Khartoum ）-蘇丹港鐵路。

2, 麥洛維大壩（ Merowe Dam ）
麥洛維大壩是尼羅河幹流上繼埃及亞斯文水壩後的第二座大水力發電項目。早在 1990 年代初就有建大壩的構想，但直到石油價格走高，蘇丹政府財政改善才付諸實施。總工程費用 19 億美元，中國進出口銀行提供 5 億美元貸款。水壩由中國水電建設集團（ Synohydro ）和中國水力電力對外公司（ CWE ）共同承包硬體建設。工程規劃和管理由德國 Lahmeyer International 負責，法國 Alstom 負責發電機組。[177]

3, El Gaili 發電廠

---

[174]「劉貴今，蘇丹和南蘇丹：未講完的糾結故事」，國際網，
http://memo.cfisnet.com/2013/0109/1294169.htm

[175]Conflict in South Sudan. Enough!
http://www.enoughproject.org/conflicts/sudans/conflicts-south-sudan

[176]姜恆坤，傅海娜，「蘇丹石油：從內政焦點到外交難題」,**西亞非洲**（ 北京), 2012 年，第 6 期，頁 82。

[177]A Human Rights First Report, Investing in Tragedy: China's Money, Arms, and Politics in Sudan (New York: human righters first, 2008), p.9.

El Gaili 發電廠被蘇丹稱之為中國大陸對蘇丹能源開發和民生改善有正面貢獻的建設。El Gaili 發電廠是使用天然氣的火力發電廠，可提供蘇丹全國 1/3 用電量。[178]

1990 年代的國際制裁改變了蘇丹傳統上和歐盟與美國的貿易關係，而轉向中國大陸，印度及其他亞洲和中東經濟體。中國大陸和蘇丹的經濟合作，為蘇丹提供了不同的經濟發展選擇。受惠於石油價格上漲，蘇丹 2006 年 GDP 成長率為 11.3%,2007 年成長 10.2%。蘇丹是中國大陸在非洲次於安哥拉和南非的貿易夥伴。中國大陸和蘇丹的雙邊貿易模式和其他非洲國家大致相同。即蘇丹出口原料（ 原油和棉花 ），進口中國大陸的工業製品。中國大陸對蘇丹主要輸出產品為：機械，電子產品，建材和成衣。蘇丹的石油繁榮，為中國大陸投資服務業和建立以非洲為市場的製造業提供了機遇。而中國大陸的製造業投資，也為蘇丹發展進口替代產業提供了機會。[179]

如同印度和馬來西亞，石油是中國大陸在蘇丹的核心投資。但中國大陸和其他亞洲投資者不同之處在於除了經濟目的外，更造成了重要的政治經濟後果。這種政治經濟後果可從兩方面來看：其一，蘇丹長期的內部衝突，因中石油投資帶來的相關基礎建設和收益使衝突擴大；其二，為維護龐大的石油投資，使中國大陸必須在國際上為蘇丹提供政治保護,例如 2004 年，聯合國安理會 1556 號提案對蘇丹達爾富爾制裁，中國大陸要求修正提案，最終該案修正後通過。[180]

在經濟層面上，中國大陸的石油投資使蘇丹從一個經濟落後的石油進口國，成為有完整石油工業體系的石油出口國。豐富的石油資源更使蘇丹和中國大陸石油企業建構了共同的利益鏈。中國大陸的石油企業從在蘇丹的石油投資中得到技術，管理能力的提升和海外投資的經驗。蘇丹則取得發展國家戰略產業的機會。但豐厚的石油收入也使蘇丹政府財政陷入「石油依賴」,在 2008 年蘇丹 63%的政府財政收入來自石油收入。[181]

中國大陸 1995 年以來的直接投資，固然在蘇丹的經濟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但蘇丹於殖民時期歷史遺留的不平衡發展，不可避免的影響了中國大陸推動

---

[178]Daniel Large, "The end of abstraction," in Christopher M. Dent ed., *China and Africa Development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90.

[179]Ibid., 25-26.

[180]A Human Rights First Report, Investing in Tragedy: China's Money, Arms, and Politics in Sudan (New York: human righters first, 2008), pp.21-22.

[181]Daniel Large, "The end of abstraction," in Christopher M. Dent ed., *China and Africa Development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p. 93-95

的共同發展。中國大陸強調自身在蘇丹現代化進程中的正當性,但蘇丹發展的後果是擴大而非減少政治紛爭，並最終在 2011 年造成南蘇丹分離。

2010 年中國大陸在海外的石油投資中哈薩克斯坦(Kazakhstan)居第一位，佔石油投資的 23%，蘇丹則為 15%位居第二。南蘇丹獨立後，立即擁有 85%的蘇丹油源，但石油中下游基礎設施及出口港都在蘇丹。而中國大陸立即成為獨立後南蘇丹最大的石油投資國和石油出口目的地。由於歷史關係和成見，南蘇丹政治精英視中國大陸為蘇丹的堅定支持者。雖然中國大陸展現充分的政治彈性，在「全面和平協議」後立即表示善意,對南蘇丹提供援助。但由於美國是南蘇丹最大的政治和經濟援助來源，南蘇丹希望通過西方投資來鞏固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但這個期望由於南蘇丹行政效率低落，政治不穩定和族群衝突，在短期內不可能實現了。

石油產業從探勘到生產可能拖延經年，需要長期部署和大量的早期固定資產投資，而一旦開始生產，生命周期將長達數拾年。[182]如果石油蘊藏豐富地區政治不穩定或法律系統不完善，石油投資者必須要和地主國政治精英或利益集團糾結不清。中石油在蘇丹的石油投資採用合資經營方式，以分擔風險。但南蘇丹獨立後，中石油即曝露在高政治風險之中。 對中國大陸石油企業而言，在高風險地區投資是不得已的選擇。這是後進者必須面對的局面，中國大陸在蘇丹的工作人員也曾被蘇丹內部矛盾連累。例如 2007 年達爾富爾反叛組織 Justice and Equality Movement(JEM)佔領中國大陸的 Defra 油田和攻擊 Heglig 油田。2008 年綁架中石油 9 名員工，最後 4 獲救，4 死 1 失蹤。2012 年 29 名中方建築工人在南北邊界被南蘇丹解放陣線(SPLM)綁架等。

蘇丹曾經被中國大陸視為海外石油投資最傑出的成就，投資範圍廣泛如果抽身必承受沈重的財務損失。正如劉貴今所言『中國同 50 個非洲國家有外交關係，但很少有國家像蘇丹這樣，在經濟上有如此緊密關聯』，而『除石油工業外，中國公司還參與了許多基礎設施項目...這些都不是單純的公司行為，而是國家利益』。在南北蘇丹爭議上『南方的態度更為強硬...反正油埋在地底下，什麼時候都是他們自己的』,因此『中國實際上無力掌控或左右蘇丹的局勢』。[183]Heglig 油田被破壞加上損失了 85%的油源，2012 年蘇丹石油出口只佔中國大陸進口石油

[182]Susana Moreira, "Learning from Failure: China's Overseas Oil Investments,"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Vol. 42, No. 1 (January 2013), p. 135.

[183]劉貴今，蘇丹和南蘇丹：未講完的糾結故事。國際網, http://memo.cfisnet.com/2013/0109/1294169.htm

的 1%。姜恆坤認為，美國推動蘇丹和平進程的動機在排除中國大陸石油企業，並為美國石油公司尋求重返蘇丹的機會。[184]

南蘇丹情勢發展雖無可預料，但當前對外國石油投資者而言絕不容樂觀。中國大陸在蘇丹曾經引以為傲的投資成就，目前正深陷南蘇丹的泥潭之中。未來何去何從可能不在中國大陸的掌握之中。

第四節　贊比亞：變調的全天候朋友

贊比亞共和國為位於非洲中南部的內陸國家，東北和坦桑尼亞接壤，東鄰馬拉維，東南接莫桑比克，南連津巴布韋，博茨瓦納和納米比亞，西鄰安哥拉，北接剛果民主共和國。贊比亞全境大部為海拔 1000 公尺到 1500 公尺的高原，面積 75 萬平方公里，人口 1463 萬，由 73 個民族組成。[185]

贊比亞原為英屬「北羅德西亞保護區」,於 1964 年 10 月 24 日宣布獨立。贊比亞自然資源豐富，豐富的銅礦儲藏量(1900 萬噸)為主要經濟支柱。在獨立之前，贊比亞經濟有兩個特徵：英國殖民地政府建立的公私合營的贊比亞工業發展有限公司(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of Zambia Ltd., Indeco)參與投資所有的產業；殖民地經濟由少數歐洲移民及印度移民掌控，礦業則全由歐洲移民掌控。[186]由於有豐富的銅蘊藏量，1960 年代贊比亞獨立之初被認為將是下撒哈拉非洲最繁榮的國家之一，但直到 2000 年贊比亞 2/3 人民收入仍居於貧窮線以下。

贊比亞獨立後，於 1968 年實行國有化，原殖民政府留下的 Ideco 即轉為國營控股企業參與產業經營。更有利總統 Kenneth Kaunda 形成完善的政治扈從關係，鞏固政治領導。1969 年贊比亞被列為中等收入國家，GDP 為肯亞的三倍，埃及的兩倍，高於當時的巴西，馬來西亞，土耳其，韓國。1973 年贊比亞 4 百萬人口中，1 百萬為城市人口，75 萬為工薪階層。由於贊國是單一資源依賴經濟體，1975 年國際商品價格進入下降循環，加上贊國實施礦業國有化的政策失誤，使贊比亞經濟陷入困境。1991 年在 IMF 施壓之下，贊比亞推動經濟自由化。2001

---

[184]姜恆坤，傅海娜，「蘇丹石油：從內政焦點到外交難題」,**西亞非洲**（北京）, 2012 年，第 6 期，頁 83-85。

[185]「贊比亞概況」,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6/19/content_447724_4.htm

[186]"History of failed Zimco and how it wasted Zambia's resource," *Zambian Watchdog*, http://www.zambiawatchdog.com/history-of-failed-zimco-and-how-it-wasted-zambia's-resource/

年國有大型銅礦完全私有化，銅產量回升並適逢國際商品價格上揚，經濟加速增長。2011 年世界銀行將贊比亞列入低水平中等收入國家。贊比亞自 1964 年獨立後，有幾個有別於大多非洲國家的特點：從未發生成功的軍事政變；內部族群複雜，語言多元化，但政治穩定，從未如大多數非洲國家發生族群紛爭；公民團體發展蓬勃，工會有強大的政治影響力。[187]

1964 年 10 月於贊比亞正式宣佈獨立前三天，中國大陸即致電贊比亞總統當選人 Kenneth Kaunda，表達承認之意。中國大陸重視贊比亞除了贊國處於當時非洲南部民族解放運動的戰略樞紐位置外，贊比亞總統 Kenneth Kaunda 反霸權的政治意識形態傾向和當時中國大陸「反美帝」,「反蘇修」的意識形態相契合亦為主要因素之一。其實，在贊比亞獨立之初，Kaunda 極盼西方國家給予經濟援助，但西方國家的反應冷淡,這促使 Kaunda 轉而向中國大陸求援。Kaunda 於 1967 年 6 月首次訪問北京, 在當時極端困難的情況下, 中國大陸提供贊比亞 1680 萬美元無息貸款。從 1964 年到 1979 年, 中國大陸提供超過 23000 萬美元的援助。遠超過蘇聯在同時期提供的 1500 萬美元的援助。於 1970 年代, 贊比亞未清償公共債務(public debt)中 80%是西方發達國家，而中國大陸為零。可見當時中國大陸的援助對贊比亞的重要性。Ian Taylor 認為：中方的援助是中贊關係的重要組成部份，而慷慨的援助也使中國大陸在非洲有超過實際能力的存在。[188]

Kaunda 在 1964 年到 1991 年總統任期內，曾先後四次訪問北京(1967,1974,1980,1984)。在 1974 年 2 月 21 日的訪問中，他稱中國大陸為贊比亞的〝全天候的朋友〞(an all-weather friendship)。[189]除政治關係和援助之外，Kaunda 也希望能由發展雙邊經貿關係，促進贊比亞的經濟發展。但基於當時中國大陸和贊比亞客觀條件的限制，始終未能如願。要到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後，於 1990 年代中期中-贊經貿關係才成為雙邊關係的主軸。而 1998 年以後，中國大陸的直接投資，亦逐漸使雙方〝全天候的朋友〞關係遇上贊比亞國內政治的亂流。主要原因在於中資企業在地主國輕忽勞動條件和環境意識的態度，經民粹宣染引起地主國居民的不滿。

---

[187]Kopinski, Dominik and Andrzej Polus, "Sino-Zambian relations: 'An all-weather friendship' weathering the storm", in Dominik Kopinski, Andrzej Polus and Ian Taylor eds., *China's Rise in Africa: Perspectives on a Developing Conne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 54.

[188]Ian Taylor, *China and Africa: Engagement and compromise*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165-170.

[189]"President Kaunda of Zambia visits Peking," Peking Review (March 1, 1974), http://marxists.architexturez.net/subject/china/peking-review/PR1974-09.pdf

2006 年, Michael Sata 於競選總統時批評中資企業在贊國的行為，揚言他如果當選將和中華民國建交。雖當年 Sata 僅得 29%選票並未當選。但 2011 年 9 月 Sata 贏得大選，擔任贊國第五任總統。但中國大陸對贊比亞太重要，Sata 僅能強調「投資必須有利於贊國人民」, 並要求嚴格執行勞動法規，並未反對中資企業的投資。

一 ，中國大陸在贊比亞的直接投資

中國大陸在 1990 年代中期，開始對贊比亞進行直接投資。直接投資的初期是在趙紫陽 1984 年訪問非洲時提出：以經濟合作取代援助，用合作經營管理，重整早期援建項目的脈絡下進行的。爾後隨中國大陸經濟實力壯大，在政策鼓勵和天然資源需求下向贊比亞各個不同領域擴張。到目前為止，中國大陸在贊比亞的投資主要集中在銅礦業，兼及農林業。

依贊比亞開發局(Zambian Development Agency)統計：到 2010 年前，中國大陸投資累計 10 億美元，89%的投資在礦業相關領域。為贊比亞第三大外資來源(前二位為英國和南非)。

中國大陸對非洲國家提供的基礎設施建設援助，有助於地主國建立良好的商業環境。中國大陸在贊比亞的基礎建設上，也不例外的扮演重要角色。除冷戰時期的坦-贊鐵路及贊比亞中部的 Luapula 大橋。近年較受矚目的援建工程為:2010 年，贊國和中非發展基金簽訂 15 億美元融資在贊國南部建水壩；2011 年，中資工程公司取得 2 億 4 千萬美元 Kariba 水力發電援建案。據贊比亞開發局統計在 2010 年前，中國大陸的工程建設金額累計 4 千 5 百萬美元，僱用員工 1977 人。主要承包工程的中資營建公司為: 中國有色集團所屬的十五冶金建設集團公司和中材國際工程有限公司。但僱用本國勞工是中國大陸工程承包被地主國垢病的主要原因。由於這涉及工程期限，勞工技術，管理等因素。同時各地主國有不同的最低僱用標準，因此對當地勞工僱用問題須持平論斷。但無可置疑的是，地主國當地工程分包業者是最直接的受益者，因可承接中資企業的配合工程。[190]但在 1990 年代後期，Mulungushi 紡織廠才是贊比亞最受矚目的中資企業。

(一) Mulungushi 紡織廠

[190]Kopinski, Dominik and Andrzej Polus, "Sino-Zambian relations: 'An all-weather friendship' weathering the storm", in Dominik Kopinski, Andrzej Polus and Ian Taylor eds., *China's Rise in Africa: Perspectives on a Developing Conne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58.

Mulungushi 紡織廠位於贊國首都 Lusaka 北方的 Kabwe 地區，是中贊合資經營的紡織廠。該廠全盛期僱用 2000 名工人，年產棉紗 1800 噸，棉布 1 千 7 百萬公尺，成衣 10 萬件。紡織廠屬於贊比亞國防部，早年由中國大陸提供 1100 萬英鎊無息貸款建立，於 1983 年開始生產。但由於管理不善，經營狀況惡化，1995 年時任副總理的朱鎔基於訪問贊比亞時建議贊國把紡織廠轉為中贊雙方合資經營。中方將再投入 150 萬美元做為工廠整修資金，合併早期的英鎊無息貸款轉為 66%的紡織廠股份。中方將擔任董事長，總經理和所有管理職務。1997 年 1 月青島紡織派 20 名管理和技術人員進駐 Mulungushi,進行規劃，整理，維修。新的合資公司於 1997 年 5 月由時任總理的李鵬親臨主持揭幕。

由於贊比亞當地棉花供應被少數供應商壟斷，以致價格過高。紡織廠決定改向坦桑尼亞採購，於 1998 年更提供種子，肥料培養贊比亞當地棉花契作農戶。在規模最盛之時，契作農戶達 5000 戶，棉田超過 10000 公頃。從 2002 年起，有多餘棉花回銷中國大陸。受惠於美國「非洲成長機會法案」(AGOA, Africa Growth Opportunity Act),2000 年出口美國 10000 條短褲，為當時贊比亞紡織業最大的對美出口單一產品訂單。2003 年，Mulungushi 紡織所屬成衣廠接受 Wal Mart 代理商投資以擴大產能，以月出口 10000 條長褲供應美國市場為目標。

但好景不長，Mulungushi 紡織廠不能自外於全球競爭，自 2004 年起 Mulungushi 即面臨連串的訂單減少，裁員，減產。最後 Mulungushi 紡織廠在 2007 年關閉，2014 年在贊比亞政府提供前 6 年免稅的誘因下，由坦桑尼亞企業家承租廠房重新開工。[191]目前青島紡織在贊比亞仍繼投資經營軋棉廠和棉仔油廠。

Mulunguishi 紡織廠一度被視為中贊合作的典範，但最終以關廠告終。西方學界認為其原因主在外部環境變遷如：2005 年 MFA(Multi Fiber Arrangement) 終止，全球紡織品貿易自由化及 2008 年 WTO 取消美國和歐盟對中國大陸成衣進口的限制。另外，Mulunguishi 本身如設備陳舊，生產成本過高，導致競爭力不足也是不得關廠的原因。同時贊比亞的經濟自由化進程，也是影響因素之一。贊比亞製衣業的內銷成衣市場，由於推行自由化之初，政府取消舊衣進口稅而大受打擊。2005 年紡織成衣業全球貿易自由化，只是加速不具競爭力的贊比亞紡織成衣業退出市場。到 2011 年贊國僅有不到五家紡織成衣業者。[192]

---

[191]Ian Taylor, *China and Africa: Engagement and compromise*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177-178.

[192]Ina Eirin Eliassen, “Chinese Investors: Saving the Zambian Textile and Clothing Industry?” CCS Commentary (South Africa), October 2012. http://www.ccs.org.za/wp-content/upload/2012/08/CCS_Commentary

由於贊比亞盛產棉花，紡織產業雖式微，棉花仍為該國主要出口產品。自1994年進行棉業自由化，2005年後外國投資者成為贊國棉業主力，66%軋棉紡紗產業由美商Dunavant Cotton掌握。因於贊國紡織成衣業沒落，Dunavant棉花主要出口歐洲或再轉口，美商Cargill則專注中國大陸市場。Duanvan和Cargill除向全世界推廣非洲棉（Cotton made in Africa）外，並改進贊國生產技術，努力經營社區關係，提供醫療，教育服務。[193]

（二）中國大陸在贊比亞的礦業投資

贊比亞在1900年初就發現銅礦，但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戰後資金緊俏，直到1928年才進行採礦。1964年，贊比亞獨立時國內已形兩大礦業集團：Roan Selection Trust和Rhodesian Anglo American Corporation。由於贊國經濟依賴銅礦，因此取得銅礦控制權有政治上的重要性。Kaunda總統在高舉非洲人道主義（African Humanism）旗幟下走社會主義路線，於1969年完成大部份銅礦國有化。1964年銅年產量為64萬噸。在贊國1969年實行銅礦國有化之初銅產量72萬噸，僱工約4萬8千人，1973年更高達75萬噸。但接踵而來,因石油危機帶來的商品價格崩跌，使贊國銅礦產業受創甚深。為挽救銅礦業，於1982年贊比亞重組銅礦產業，成立贊比亞聯合銅礦（Zambian Consolidated Copper Mines, ZCCM）,但並未改善困局。由於銅價長期走低，1984年贊國陷入經濟蕭條，政府赤字1億5千萬美元，外債26億美元。1987年贊國向IMF求助，並按IMF要求進行改革。但由於改革帶來的高通膨，招致民眾暴動。贊國政府只好取消改革措施，自然IMF也就取消了原先承諾的金援。

1991年Kaunda選舉失利，新政府在IMF壓力下推動經濟自由化。於1992年到2000年間，贊國政府分折聯合銅礦資產，陸續出售給加拿大，英國，印度，端士，南非和中國大陸。

贊比亞謙比西銅礦（Chambishi Mine）是中國大陸首次海外非鐵金屬投資，累計投資金額於2003年已達1億5千萬美元。中國大陸在贊比亞的銅礦投資由中國有色礦業集團有限公司（CNMC）控股之中國有色礦業有限公司在贊比亞專營銅開採，選礦，冶煉。中國有色礦業於1998年以2千萬美元投資自1988年就廢棄的謙比西舊銅礦區85%的股份，15%由ZCCM保留。爾後中色礦業陸續投入資金以更新設備，提高產能。2004年，再投入1千5百萬美元，建立洗礦廠。[194]

---

[193]Ibid.

[194]Ian Taylor, *China and Africa: Engagement and compromise* (New York: Routledge,2006), pp. 179-180.

中資企業除投資採礦，冶煉外，礦業周邊相關產業如鋼筋，五金回收，氧氣，炸藥等都有中小型中資參與。但在銅礦相關供應鏈上，中資企業是採在商言商的態度，不會獨厚中資供應商。[195]

中國有色礦業集團在 2008 年金融危機時買下原由瑞士和以色列合資的 Luanshya 銅礦，並於 2009 年 2 月開重新開工生產。[196]

其他在贊比亞較受矚目的中資礦業投資有：

1, 中輝國際礦業(私企)是香港登記的礦業集團由中國大陸地產公司中輝國華控股。中輝國際是自 1996 年中-贊簽署相互促進投資和保護協定以來迄 2009 年止，贊比亞最大的中資私營企業投資者。Kopinski 從贊比亞官員處知悉，中輝的投資高達 36 億美元。

2, 湖南天雄集團(私企)投資贊比亞錳礦，並和中國大陸有色冶金合作，建立探勘，冶煉，二次加工完整的產業鏈。取得贊比亞中部錳礦探勘權，已取得初步成果。

3, 金川集團(國企)為甘肅省屬國企，是中國大陸最大的鎳，鈷，鉑族金屬生產企業和中國大陸第三大銅生產企業。金川集團在 2008 年金融危機之後買下贊比亞唯一的鎳礦公司 AlbidonMining 51%的股份。

4, 中資企業 Collum Coal Mining 是來自江西的蘇(Xu)氏五兄弟於 2000 年在贊比亞 Sinazeze 經營小煤礦起家，再投資 Choma 煤礦，同時在 Kabwe 開採錳。不過 2007 年 Collum 在 Kabwe 的錳礦由於污染環境被強迫關閉。Choma 煤礦則在 2010 年 10 月發生工潮，中方管理人員對工人開槍導致 11 名工人受傷。2012 年 8 月工人聚集抗議勞動條件惡劣，在衝突中中方工作人員 Wu Shengzai 死亡。2013 年 2 月贊比亞政府撤銷 Collum Coal Mining 營業執照。[197]

中國大陸在贊比亞的投資銅礦，是為因應國內市場不斷增加的銅需求。2009 年中國大陸吸收了 30%的全球銅生產量，不斷增加的銅需求，除推高銅的商品價格外，也促使銅礦產能提高。以贊比亞為例，其 2010 年銅產量為 70 萬噸，已接

---

[195]Judith Fessehaie, “Intensification in Industries Upstream of Zambia's Copper Mining Sectory,” http://www.cssruct.ac.za/sites/ccsr.uct.ac.za/files/pubs/MMCP%20Paper203_0.pdf

[196]Kopinski, Dominik and Andrzej Polus, "Sino-Zambian relations: 'An all-weather friendship' weathering the storm," Dominik Kopinski, Andrzej Polus and Ian Taylor eds., *China's Rise in Africa: Perspectives on a Developing Conne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p.57-58.

[197]“China, Zambia, and a Clash in a Coal Mine,” *The New Yorker*, 2013,10,19. http://www.newyorker.com/business/currency/china-zambia-and -a-clash-in a-coal-mine

近 1973 年的最高產量，比 2008 年的 57 萬 5 千噸成長超過 20%。贊比亞銅產量增加，主要來自於加拿大 Barrick Gold Corporation 的 Lumwana 礦區和重新復工的中資 Luanshya 礦區。但在整個贊比亞銅產量中，中資企業只佔 5%。而中資企業生產的銅並不是運回中國大陸，而是在倫敦金屬交易所出售。小型中資私營礦業公司則直接出口未冶煉銅礦石回中國大陸。

贊比亞的礦業自由化是在國際金融機構監督下進行。國際金融機構要求下的礦業自由化，使贊比亞政府處於弱勢地位，在毫無附加條件下於銅價低迷時出售國有股份。同時銅礦售股過程和協定內容並未公開，在銅價高漲時贊比亞政府並未獲得應得收益，目前引發的勞動條件，環境保護爭議都是當初協定條款不完備所致。而非某單一礦場的責任。 在 2008-2010 年金融危機時期，西方銅礦企業裁員超過 85000 人。中國大陸的礦業投資，不但未如同西方國家投資者減產裁員，反而買下西方投資者不願經營的礦業資產。在金融危機發生之初，中國有色礦業公司為承擔政治和社會責任，即決定採取「四不」政策以因應金融危機：不減產；不裁員；不減少投資；不延誤在建開發工程。[198] 但中資企業由於欠缺海外經驗和社會責任意識，在贊比亞的中資企業勞動條件不如投資當地的西方企業，以致經常發生罷工；中資企業和地方連結不足，不若西方企業能主動組織公關活動，提供社區福利；中資企業普遍忽視環境保護。中資企業的這些缺失經媒體渲染以後，使中國因素成為贊比亞國內政治的動員利器。[199]

（三）中國大陸在贊比亞的農業投資

贊比亞為中國大陸對非洲農業投資的首選地主國，申請赴贊國投資農業的企業佔商務部 1988-2010 年間批准投資非洲農業的 20%。在整個非洲農業投資中，糧食種植佔 74.3%，食品加工 20%，食品批發和零售 5.7%。[200]1988-2010 年間，中國大陸商務部審批投資贊比亞農業的企業共 10 家。當然，最終不見得這 10 家企

[198]Pengtao Li, “The Myth and Reality of Chinese Investors: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Investment in Zambia's Copper industry,” *SAIIA Occasional Paper* No 62, May 2010. http://www.eisourcebook.org/cms/June%202013/Myth%20&%20Reality%20of%20Chinese%20Investors: %20Zambian%20Copper%20Case%20Study.pdf

[199]Ana Alves, “China in Angola and in Zambia: a brief comparative analysis,” http://eoropafrica.files.wordpress.com/2012/10/aalves_summary_en.pdr

[200]Huang Wenbin, Andreas Wilks, “Analysis of approvals for Chinese Companies to invest in Africa mining,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sector,” http://webdoc.sub.gwdg.de/ebook/serien/yo/CIFOR_WP_WP81.pdf

業都進行了實質的投資。當我們探究中國大陸在贊比亞的農業時投資，不可忽略中贊關係的歷史遺緒和贊比亞在殖民時期農業政策造成的路徑依賴。

中國大陸從 1956 年就開始對非洲進行農業援助。1984 年趙紫陽提出以合作經營，挽救早年援建的基礎設施,中國大陸開始參與經營早年的「交鑰匙工程」。2000 年以後，中國大陸加強對非洲的農業援助，除繼續農業援建項目外，更重視幫助非洲國家提高農業技術能力。到 2009 年，中國大陸在非洲完成 142 個農業援建項目，建立了 14 個農業技術示範中心。[201]

贊比亞的農業體系是在殖民時期隨歐洲移民進入而逐漸形成的。主要特徵是：歐洲移民在鐵路沿線建立大型商業農場和分佈全國的家庭農戶；其次早在殖民地時期就已建立完善的農業團體組織。這些特徵延續至今，大致並未改變。甚至在獨立後，Kaunda 實施國有化之時亦是如此。例如 1970 年代，在贊比亞政府在甘蔗種植區 Kaleya 所成立的 Kaleya Smallholders Company Limited（KASCOL）即由贊比亞政府，英國政府的國協開發金融機構 the Commonwealth Development Corporation（CDC），糖業公司，農民協會和 160 戶契作農民共同組成。在 1991 年實施自由化之後，贊比亞政府將所持之 KASCOL 股份賣給 CDC,最後 CDC 再把手中所有持股全數賣給南非最大的甘蔗種植和蔗糖生產公司 Illovo Sugar。[202]

由於贊比亞全國超過 50%勞動力為農業人口，但僅 15%的可耕地被開發。贊比亞政府於 1991 年推行自由化以後，為充分利用土地資源，大力推動外資進入農業領域投資。並於 1995 年推出土地法案，准許外國投資者取得土地。1999 年由於津巴布韋實行土地改革,大批白種農場主移入贊比亞。在 2003 年之前，日漸增長的津巴布韋白種農民已投資達 1 億美元於贊比亞農業，並為贊國帶來農業現代化的契機。[203]贊比亞約有 1500 家大型農場及 110 萬小農，其中 30 萬小農為契作農。110 萬小農中 96%土地小於 5 公頃，其餘土地在 5-20 公頃之間。2005-2009 年 70-90%的農業生產來自中小型農戶。自由化以後，農業生產力提高，1990-1994 年農業出口從自由化前的 3000 萬美元增為 6100 萬美元。2006 年更達 3 億美元。[204]

---

[201]Deborah Brautigam & Haisen Zhang, “Green Dreams: Myth and Reality in China's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in Africa,” http://deborahbrautigam.files.wordpress.com/.../bautigam-zhang-green-dreams.pdf

[202]Fison Mujenji and Charlotte Wonani, “Long-term outcomes of agriculture investment: Lessons from Zambia,” http://pubs.iied.org/pdfs/12571IIED.pdf

[203]“Zambia woos foreign farmers with free land offer,” *CNN INTERNATIONAL*, http://edition.cnn.com/2003/WORLD/africa/11/21/zambia.farms.reut/

[204]OK Ezekwesili, “Commercial Value Chain in Zambian Agriculture: Do Smallholders Benifit?”

中國大陸是贊比亞農業的長期援助者，中國大陸 1967 年開始對贊比亞提供貸款援助，農業合作，如派遣農技人員，提供訓練等。2011 年，中國大陸更在贊比亞設有「中國援助贊比亞農業技術示範中心」以深化技術合作。贊比亞推動經濟自由化之後，中國大陸也是農業領域的投資參與者之一。但中國大陸在贊比亞的農業投資相對於礦業和製造業投資要小很多。2009 年，中國大陸對非洲直接投資 93.3 億美元，其中農業投資只佔 3.1%，約 2.8 億美元。中資企業在贊比亞投資 15 家農場，佔地 10000 公頃，分屬六個不同的國企。中國農墾集團（CSFAC）在贊比亞擁有三家農場，總投資金額約 290 萬美元，是中國大陸在贊比亞最大的農業投資者，同時又扮演農業援助的角色。中國農墾最引人注目的投資是中贊友誼農場，農場是早年中國大陸援助的產物。CSFAC 在 1988 年參與農場經營。由於農場持續虧損，中國大陸在 1991 年買下贊方股份由 CSFAC 獨資經營。在農業部指導下，CSFAC 後續又投資 Jhonken 友誼農場。中國農墾集團所屬中贊友誼農場，佔地 667 公頃種植玉米和大豆。Jhonkon 友誼農場佔地 3500 公頃，是綜合農場有蔬菜園，肉牛，乳牛牧場，養雞場。Jhonken 友誼農場供應贊國首都 Lusaka10% 的雞蛋消費。中資農場農作物，均供應贊國國內市場。有些西方學者認為，中國大陸的農業投資損害了當地農民的利益。但依據 Bastholm 和 Kragelund 的研究，至少在 2009 年之前如果沒有中國大陸農業部的資金支持，CSFAC 在贊國的農業投資是無法延續的。[205]

中國大陸於 1990 年代中期在贊比亞以企業為主的農業投資，到 2005 年以後逐漸增加一批移民投資者。這些中國大陸農業移民投資者，是以追尋新機會的姿態來到贊比亞。目前有 30 多家中國大陸移民的小型農場，投資者大多僅具備有限的農業經驗和技術，無法和贊國現存的跨國農業集團競爭。加上中資小農場在農產品通路，市佔率，及土地規模都有所不足，使得大多數中國大陸小型農業投資者無法同大型國際投資者般，享有贊國政府的投資獎勵和金融優惠。更加上贊比亞市場和執法都不規範的情況下，這些中國大陸移民投資的小型農場，基本上大多處於掙扎求生的狀況。[206]

---

http://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487740ESW0P1C0Disclosed071131091.pdf?sequence=1

[205]Bastholm, Anders and Peter Kragelund, “State-Driven Chinese Investment in Zambia: Combining Strategic Intersts and Profits,” in Meine Peiter van Diji ed., *The New Presence of China in Africa*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17-140.
George Schoneveld, Laura German, Davison Gumbo, “The developmental implications of Sino-Africa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for the case of Zambia,” http://www.cifor.org/publication/pdf_files/WPapers/WP133.schoneveld.pdf

[206]Ibid.

農業佔贊國 GDP 的 22%, 約超過 50%贊國人民賴農業為生, 農業使用贊國 67%的勞動力。1991 年贊國推動經濟自由化以後，農業並未產生預期效果。為提高土地利用，增加糧食供應，降低貧窮人口，贊比亞政府規劃從 2006 到 2010 年提高農業預算到總預算的 9%,以改善農業基礎設施。為促進農業投資，將全國劃分 10 個商業農場區，每個農場區計劃吸引一個佔地萬公頃的核心農業投資及幾個 1000-5000 公頃的超大農場，以全面帶動農業經濟發展。[207]

自 2005 年農產品價格走高以來，部份西方學界認為，中國大陸由於工業化，經濟成長和人口壓力將面臨糧食短缺。因此在非洲的農業投資被認為是解決中國大陸糧食危機的「土地掠奪」。中國大陸正在非洲進行「土地掠奪」這一概念最早出現在西方媒體,網路和資料庫中。然後經西方學界，世界銀行，非洲開發銀行的經濟學家引用傳播,已成為某種先入為主的成見。[208]

中國大陸真在非洲進行「土地掠奪」嗎？如果從中國大陸對外投資流量和存量看，農業所佔的流量和存量比重極微。更不說，非洲在中國大陸整體對外投資中所佔的比重本就不高。以商務部「2012 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看：2012 年未，中國大陸農，林，牧，漁業投資流量為 14.6 億美元，僅佔當年對外投資流量 878 億美元的 1.7%。而 2012 年對非洲投資流量為 25.17 億美元，僅佔當年流量的 2.9%。就中國大陸 2012 年未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看，投資存量為 5319.4 億美元，其中農，林，牧，漁業投資存量為 49.6 億美元，佔 1%。而中國大陸在非洲的投資存量為 217.36 億美元，佔總存量的 4.1%。[209]如果從贊比亞的吸引外資農業投資的政策來看，中國大陸大可堂而皇之的利用贊比亞的農業投資政策，擴大農場規模。但很明顯，中國大陸官方並沒這麼做。

但怎麼會發生西方學界，甚至世界銀行認定中國大陸在非洲進行「土地掠奪」的謬誤呢？這是由先提出中國大陸在非洲進行「土地掠奪」的 NGOs，部落格，媒體引領風潮。再由西方學界引用 NGOs 的數據庫資料造成的。NGOs 並不否認他們有各自的「使命」目標。以在 2008 年出版有關中國大陸正在進行「土地掠奪」

---

[207]"UNCTAD: An Investment Guide to Zambia: Opportunity and Condition 2011," pp. 31-36. http://unctad.org/Docs/diaepcb201008_en.pdf

[208]Deborah Brautigam & Haisen Zhang, "Green Dreams: Myth and Reality in China's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in Africa," http://deborahbrautigam.files.wordpress.com/.../bautigam-zhang-green-dreams.pdf

[209]2012 年度中國對外投資統計公報, http://www2.ccpit.org/Contents/.../content_384326.htm

專書的 NGO 穀類(GRAIN)為例。「穀類」就解釋：「穀類」必須在真實的「土地掠奪」發生前，就引起讚助者和行動家注意去破壞事情發生的可能性。[210]

事實上，中國大陸國企在非洲的農場大部份是援助項目，更重要的是這些農場大多經營不易。以世界銀行 1965-1986 年，在非洲的農村開發計劃高達 50%的失敗率，即可見成功的非洲農業開發計劃之不易達成。2006 年以後，中國大陸對非洲的農業援助，改以市場導向方式進行。由企業競標援助項目，得標後企業至少須在國家補助下經營三年，農場土地大多小於 75 公頃。在農產品貿易方面，2011 年中國大陸向非洲出口糧食(稻米，小麥，玉米)101968 公噸，自非洲進口少於 1 公噸。但中國大陸從非洲進口芝麻和腰果則高達 366954 公噸。從 2004 年開始，中國大陸對贊比亞貿易長期入超。2012 年中國大陸對贊比亞貿易逆差高達 19 億美元。中國大陸主要從贊比亞進口銅，農產品僅有棉花及煙葉。2013 年 Brautigam 和 Zhang 發現在中國大陸商務部批准在贊比亞投資農場的 15 家企業，僅 8 家在經營，而且規模非常小，估計中國大陸在贊比亞的農場投資僅約 1 千萬美元。以中國大陸在贊比亞的農業投資規模和農產品產出都投入贊比亞內銷市場來看，稱中國大陸在非洲的農業投資為「土地掠奪」實在太沈重。[211]

冷戰時期中贊雙方緊密的友誼是基於現實的壓力，Kaunda 是為因應當時南部非洲的危機和希望從中國大陸得到經濟和技術的協助。對中國大陸而言，中贊關係則是有利於發揮中共的影響力以排除超級大國在南部非洲的陰謀的槓桿。[212]隨著贊比亞經濟自由化的進展，豐富的銅礦資源成為中國大陸新的投資機會。經濟自由化改變了贊比亞長久的政治扈從關係，也使一度緊密的「全天候」中贊友誼向正常化的經貿關係轉變。

中國大陸對贊比亞的直接投資流量從 2001 年的 145 百萬美元，到 2012 年的 1732 百萬美元，成長超過 10 倍。中贊雙邊貿易總額從 2001 年的 79.8 百萬美元，到 2012 年為 3259 百萬美元，成長超過 40 倍。2012 年，贊比亞對中國大陸出超 19 億美元。贊比亞主要向中國大陸出口銅，棉花及煙葉，自中國大陸進口航空器，電話，機械。

中國大陸的投資改善了都會區 Lusaka 和 Copperbelt(銅礦帶)的經濟狀況。但中資企業的低工資和惡劣的勞動條件，經由媒體渲染所激起的反中情緒，在贊比亞都會區如首都 Lusaka 和銅礦帶能輕易轉化為政治資產。因此，中國因素成

---

[210]Deborah Brautigam & Haisen Zhang, “Green Dreams: Myth and Reality in China's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in Africa,” http://deborahbrautigam.files.wordpress.com/.../bautigam-zhang-green-dreams.pdf

[211]Ibid., pp.1682-1684.

[212]Ian Taylor, *China and Africa: Engagement and compromise*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168,180.

為贊比亞的內政議題。如 2005 年 4 月 20 日位於謙比西的中資炸藥工廠爆炸，50 位贊國工人死亡，引發的勞工安全議題。另外，如礦場工人抗議遲發薪資和城市小零售業者面對中國大陸移民經營者的競爭等都引發贊國人民的反中情緒。反中成為 Michael Sata2006 年競選議題，他批評中資企業在贊國的不規範行為，揚言他如果當選將和中華民國建交。當年 Sata 僅得 29%選票並未當選，但在都會區取得多數支持。[213]2007 年 Michael Sata 受邀在哈佛大學人權研究委員會演講時認為：

「大規模的中方礦業和建設投資因為勞動條件，環境保護不符合規定造成贊國產業不和諧。中國大陸的企業偏好使用本國員工，僅提供少數非技術性工作給贊國人民。中，贊員工薪資不平等，違反同工同酬原則更惡化了勞動條件。而贊國政府在發工作許可證上亦存在獨厚中資企業的問題。對中資企業濫發許可證，而其他外資甚難獲得工作許可證。這導致目前有超過 8 萬中國人在贊比亞。」[214]

但 Kopinski 認為合理估計應少於 6000 中國人在贊比亞境內,贊國官方發出工作證數量為 2340 份。2006 年 Sata 雖沒當選,但他利用反中情緒走向權力，終在 2011 年就任贊比亞第五任總統。但中國大陸對贊比亞太重要，Sata 就任後僅強調「投資必須有利於贊國人民」,並要求嚴格執行勞動法規。[215]

中國大陸在贊比亞的投資受中贊雙方長久的反霸權，反種族隔離形成的歷史關係塑造的雙方發展路徑所制約。對贊比亞而言，中國大陸的援助和投資為贊比亞提供不同發展路徑選擇和優惠資本來源。贊比亞人民和中資管理人員在工作倫理和文化上的差異，造成贊國都會區民眾對中方投資的不滿。由於反中情緒有利於民粹式的政治動員，更加上中國大陸軟實力不足。因此，很可能贊比亞的反中情緒將隨中資企業和移民的存在而長期存在。

中國大陸和非洲有長久的關係，中國大陸更在援助，投資和貿易領域是儘可能符合非洲的利益。中國大陸的經濟合作更為非洲國家提供了可持續發展的機遇。[216]但從中國大陸在安哥拉，尼日利亞,贊比亞和蘇丹的投資過程看，並不順遂。因為中非合作發展不僅是中國大陸的策略，還涉及非洲政府和人民的選擇。安哥拉有強烈的自主意識，並能巧妙的運用中國大陸提供的機遇。要求西方國家

---

[213]Dominik Kopinski and Andrzej Polus, "Sino-Zambian relations: An all-weather friendship weathering the storm", in Dominik Kopinski, Andrzej Polus and Ian Taylor eds., *China's Rise in Africa: Perspectives on a Developing Conne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p.59-62.

[214]Ibid.

[215]Ibid.

[216]Chi Zhang, "China's energy diplomacy in Africa: The convergency of national and corporate interests," in Christopher M. Dent ed., *China and Africa Development Relations* (New York：Routledge, 2011), pp.147-148.

比照辦理，以形成有利自身的多元化發展。尼日利亞如某些非洲國家一樣，存在內部區域性的不穩定因素，如尼日河三角洲的 MEND,尼國北部的激進伊斯蘭組織博科聖地(Boko Haram)。加上 2007 年尼國政黨輪替後，中國大陸以「建設換資源」的經濟合作框架執行並未一帆風順。Mthembu-Salter 稱中石化在尼日利亞是以現金採購原油，而不是以基礎建設交換原油。[217]蘇丹因支持恐怖主義，及達爾富爾和南蘇丹的人道危機，從 1990 年代後期就受國際制裁。而南蘇丹獨立後，和蘇丹又因原油油管使用費率交惡而兵戎相向。中石油的投資利益大受損害，迄今無解。至於贊比亞，贊比亞前總統 Sata 是第一個把中資企業引起的不滿情緒，轉化成「政治動員」工具的非洲領袖。雖然 Sata 是目前唯一以攻擊中資取得政治資源的非洲政治人物。未來還會有嗎？中國大陸要如何防範未求可能的挑戰？

表八：2004-2012 年贊比亞-中國貿易額　　單位：億美元

年度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贊比亞出口額	1.61	2.54	2.87	3.66	5.12	12.3	30.9	35.6	25.8
贊比亞進口額	0.71	0.89	1.13	1.88	2.38	1.89	3.26	7.24	6.79
貿易總額	2.32	3.43	4	5.54	7.5	14.19	34.16	42.84	32.59

資料來源：Observatory of Economic Complexity, http://atlas.media.mit.edu/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217]Gregory Mthembu-Salter, Elephants, Ants and Superpowers: Nigeria's Relations with China, Occasional Paper No. 42, South Afric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airs (September 2009),p.25 http://dspace.africaportal.org/library

第六章　個案研究：中資企業

2012 年底中國大陸在非洲投資企業達 2500 多家，佔境外企業總數的 11.6%。主要分布在尼日利亞，贊比亞，南非和埃塞俄比亞要等國。在非洲投資的中資企業，一般被分為以尋求石油和礦產為目的的國營企業，及市場尋求型的私營企業。西方學者把國企和私企更細分為，中央國企，地方國企，有向中國大陸政府註冊的私營企業和未註冊的私企。[218]

中國大陸的國營企業被有些西方學界和媒體視為，中國大陸追求戰略目標的工具。認為中國大陸在非洲投資的目的在掠奪自然資源，破壞西方的民主價值。事實上，中國大陸的國營企業雖然響應「走出去」的號召，到海外投資。但並未放棄企業利益和強化國際競爭。中國大陸「分裂的威權主義」政治結構下，國企經營是較多的傾向市場。[219]

到非洲投資的中國大陸私營企業以中小型中資企業為主，大部分沒向中國大陸政府登記，甚至沒和駐外單位連繫，因此也就無從形成官民一致的政策共識。[220]Jin Gu 指出 2005 年以後，才有大量的中國大陸私營企出現在非洲；中國大陸的私營企業到非洲投資是為了尋求市場機遇；中資企業面對的競爭者為其他的中資企業；大多數中資私營企業和中國大陸官少有連繫，更別說瞭解官方的政策。由於缺乏資訊，中國大陸在非洲的私營企業數量被低估。如果計入在非洲隨處可見的中國大陸僑民經營的零售商場(舖)，那數字差距將更大。這些不受規範中小型企業冒險家，由於語言能力不佳，不善公關是造成非洲民眾對中國大陸企業誤解的主因。[221]

第一節　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在非洲的投資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219,Xu Yi-chong, "Capitalist or Villian: Chinese SOEs in Africa," in Li Xing with Abdulkadir Osman Farah, *China-Africa Relations in an Era of Great Transformations*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13), p. 89, Ibid.102-103.

219Kenneth G. Lieberthal, “Introduction: The ‘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Model and It’s Limitations”, in Kenneth G. Lieberthal and David M. Lampton eds.,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Decision-Making in Post-Moa China*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1-30.

220Ian Taylor, *China's New Role in Africa*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2009),p.86

221Jin Gu, Ibid

中國大陸在非洲的投資尤其是能源投資，被西方輿論和政治精英認為是現代帝國主義，其目的在掠奪非洲的資源。[222] 更認為中國大陸的石油企業是協調一致的政策工具，在非洲的石油投資是在執行中共的能源戰略，以保障中國大陸日益增長的石油需求，同時破壞國際金融制度用投資和援助促進非洲國家改善治理和人權的努力。[223]事實上非洲的優質石油資產早已在西方國際石油公司掌握之中。因此大部份中國大陸的石油投資標的是西方石油公司不感興趣的石油資產。中國大陸在非洲的石油投資之所以引人注目，主要在投資背後的政治經濟意涵，而非投資本身。此即，中國大陸的石油投資為非洲石油資源豐富國家提供了另一條開發石油資源和進行國際能源合作的道路。至於中國大陸的石油企業雖是國有企業受中央管理，但並不全然僅是國家的政策工具。Zhang 認為中國大陸的石油國企在對海外投資時不僅有鞏固石油安全，加強外交關係和影響力的目的，同時石油國企也兼顧企業自身的經營利益，如穫取利潤；強化競爭力等。以中石油為例，由於中國大陸國內市場油價較低，海外投資的短期直接誘因在於海外生產的石油可以在國際市場銷售，取得較高利潤。

一，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概述

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簡稱中國石油集團或中石油，是中國大陸中央直接管理的大型國有企業，也是中國大陸最大的原油及天然氣供應商。中石油業務範圍涵蓋油氣業務，工程技術服務，石油工程建設，石油裝備製造，金融服務及新能源開發。[224] 2012 年石油情報周刊（Petroleum Intelligence Weekly’s）從石油服務，生產，天然氣服務，生產，煉油能力和銷售量評估，把中石油列為全球石油 50 大石油公司中第四位。[225]中石油在 2012 年財星 500 強企業中位居第六。中石油 2012 年營業收入 26835 億人民幣，淨利潤 1392 億人民幣。2012 年未中石油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名列中國大陸總存量第二，前三名依序為中石化，中石油

[222]Peter Marton and Tamas Matura, "The 'voracious dragon' and the 'honey pot': Conception of conflict over Africa's natural resource," Kopinski, Dominik, Andrzej Polus and Ian Taylor, eds., *China's Rise in Africa: Perspectives on a Developing conne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 27.

[223]Erica S. Downs, "The Fact and Fiction of Sino-Africa Energy Relations," *China Security*, Vol. 3, No. 3 (Summer 2007), p.42-43.http://kms1.isn.ethz.ch/serviceengine/Files/cs7_03.pdf

[224]「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年報」，中石油網, http://www.cnpc.com.cn/cnpc/qywhcbw/cbw_index.shtml

[225]2012 年石油情報周刊(Petroleum Intelligence Weekly's) http://shalesguro.com/wp-content/uploads/2013/12/PIW_Top_20_Nov_2013.pdf

及中海油。中石油的國際化願景目標是：2015 年基本建成綜合性國際能源公司，2020 年全面建成世界水平的綜合性國際能源公司。

回顧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的沿革，中共於 1950 年代建立石油工業部，監督石油和天然氣探勘和開發。1988 年中國大陸進行國務院機構改革，把石油工業部，煤炭工業部和核工業部合併為能源部。石油部撤銷後，業務由新組成的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承續。1998 年國務院再進行機構改革時，把『化學工業部，石油天然氣總公司，石油化工總公司...下屬的油氣田，煉油，石油化工，化肥，化纖等石油與化工企業以及石油公司和加油站，按照上下游結合的原則，分別組建兩個特大型石油石化企業集團... 』。中石油即是在當時石油天然氣總公司的基礎上建立的。[226]

1999 年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轉移部分國內資產，債務和 10 個海外投資事業（ 分佈在加拿大，秘魯，哈薩克斯坦，蘇丹，委內瑞拉和泰國 ）組成新的公司，於 1999 年 11 月在北京註冊成立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於 2000 年 4 月分別在香港和紐約上市。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分割上市使中國大陸能利用海外資金，有助企業國際化。但由於美國禁止投資蘇丹，雖上市時投資人有質疑但並不介意，因大多數西方投資人把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和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視為兩個分離的公司。目前，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只持有國內資產，而把海外資產分別由中石油國際和崑崙能源持有，以避免爭議。由於取得的中石油海外投資資料並未詳細分列所屬公司，加上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和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在管理層是「一個班子，兩塊牌子」。（ 2013 年，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副總以上除安全管理總監外，全部擔任中國石油天然氣有限公司董，監事會成員。）本論文有關中石油在非洲的投資，是以大的中石油框架為界定。

二，中國大陸石油企業國際化的背景及動機

中國大陸石油企業的國際化步伐是受兩個因素推動，其一為需求因素，另一個是政策因素。自 1993 來中國大陸國內原油產量，無法供應國內日增的需求，要通過進口彌補需求缺口。這一因素驅動中國大陸石油企業走向國際。政策因素則是來自 1997 年以來要「更好的利用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和 2000 年以來推動的「走出去」戰略的激勵和指導。

[226]陳德昇，**中共國務院機構改革之研究（1978-1998）-政府再造觀點**（台北：永業出版社，1999 年 8 月),頁.100,134-153。

中國大陸是從 1992 年開始從非洲進口石油。當年自非洲進口石油 50 萬噸佔總石油進口量的 4.4%，主要油源來自利比亞和安哥拉。到 2005 年非洲石油已佔中國大陸進口石油的 30%,總量為 3847 萬噸。到 2007 年前，中國大陸已和安哥拉，阿爾及利亞，乍得，赤道幾內亞，加彭，尼日利亞和蘇丹建立了長期供貨合約,以保障石油供應安全。2009 年中國大陸前十大石油進口來源為，沙烏地阿拉伯，安哥拉，伊朗，俄羅斯，蘇丹，阿曼，伊拉克，科威特，利比亞和哈薩克斯坦。IEA 估計到 2030 年中國大陸 79%的石油消費，將依賴進口。因此經由國際合作強化能源供應安全，增加石油儲量，擴大產能和油源多元化，是必須也是必然的道路。但達成國際化的過程中中國大陸石油企業並未忽略商業利益的考慮。Jiang 認為中國大陸石油企業「走出去」的動機除國家政策推動外，更多的誘因是利用「走出去」發展和整合石油產業供應鏈，取得更高的技術和管理能力，從而成為有影響力的國際企業。總的來說，中國大陸石油企業的海外投資反映了商業選擇和政策目標，而投資的商業目的在補充投資組合和進行供應鏈整合。[227]

中石油是中國大陸最早向海外投資的石油企業，早在 1991 年下屬的油田工程建築公司就在巴基斯坦建 Indus 高速公路。1993 年中石油開始向海外石油領域投資，首先以參股 15.8%投資加拿大北湍寧油田(North Twing Oil Field)，接著買下泰國邦亞開發區 95.67%的權益和標下秘魯塔拉拉第 7 開發區開採承包合約。到 2000 年中石油的海外投資已遍佈非洲，中亞，俄羅斯，中東，北美，南美和東南亞。中石油積極尋找石油探勘和生產機會，勇於和國際大石油公司如 Shell 和 BP 競爭。另外，中石油也參與油田服務競標，以擴大業務機會。

三，中石油在非洲的投資

自 1993 年，中國大陸成為石油淨進口國家以來，非洲就成為大陸石油國企建立石油安全的構成部份。[228]中國大陸是在 1992 年開始從非洲進口石油，當時是『由國家指定的石油外貿公司按計劃指標在國際現貨市場分月進口』。但自中國大陸進行海外石油投資開始，其石油進口方式即向多元化發展：其一為以傳統的方式，在國際現貨或期貨市場採購；其次為經由簽定長期供貨合約，取得較低

[227]Julie Jiang and Jonathan Sinton, *Overseas Investments by Chinese National Oil Companies* (Paris: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11), pp. 11-14.

[228]Bo Kong, “China’s Quest for Oil in Africa Revisited,” *SASI Working Paper*, http://sais-jhu.edu/default/files/BoKongWP1-11_1pdf

價的定額原油；其三為經由投資合作開發取得的成分油（ 又稱權益油 ）。[229]中國大陸的石油企業到非洲投資，是在 1995 年蘇丹總統 al-Bashir 訪問北京後。中石油於 1996 年到蘇丹投資取得 Chevron 放棄的 6 開發區的權益（ CNPC 為 95%,Sudpet 持有 5%）,為中國大陸石油企業投資非洲開啟了先河。中石油隨之在蘇丹建立了完整的石油工業產業鏈，在 2011 年南蘇丹分離前蘇丹被視為中國大陸石油企業國際化經營歷程最成功的典範。

中石油在蘇丹取得初步的成功經驗後，於 2003 年之後陸續進入乍得，尼日爾，阿爾及利亞，毛里塔利亞，突尼斯，利比亞，尼日利亞和赤道幾內亞等國投資。

（一）中石油在非洲地區的投資概況[230]

1, 蘇丹

中石油於 1996 年進入蘇丹投資，擁有 6 開發區，1/2/4 開發區，3/7 開發區和海上油田 13/15 開發區。除油田探勘開發外，中石油在蘇丹投資原油輸送管道，儲油設備，並投資興建喀士穆煉油廠，喀士穆石化廠和石化貿易業。但 2011 年蘇丹南北分離後，南蘇丹取得 85%的油源，蘇丹保有全部的石油基礎設施，中石油的投資則暴露在高度政治風險中。

2, 尼日爾

中石油於 2003 年進入尼日爾投資，取得 Bilma 和 Tenere 區開發許可。2008 年，中石油和尼日爾政府簽訂阿加德姆上下游一體化建設合作協議，進行石油探勘，油管和煉油廠建設。2011 年，第一期工程完工，開始生產營運。2010 年，尼日爾阿加姆開發區東部 Dibeilla 地區有 3 口油井試油獲得高產量。

3, 阿爾及利亞

中石油於 2003 年進入阿爾及利亞，目前擁有阿爾及利亞北部謝里夫盆地（ Chelif ） 面積 9923 平方公里之 102a/112 開發區探勘許可及 75%權益；位於撒哈拉沙漠北部面積 8666 平方公里的 350 區探勘權；2004 年標得位於撒哈拉沙漠北部，面積 4353 平方公里的 438b 區 100%的權益，於 2007 年取得油氣產出；2003 年 5 月，標下 Adrar 上下游一體化工程。於 2007 年 4 月，Adrar 煉油廠投產，中阿雙方合資煉油期限 23 年，中石油有 70%的權益。

---

[229]查道炯，「中國在非洲的石油利益：國際政治課題」,**國際政治研究**（ 北京), 2006 年第四期（ 2006 年 4 月), 頁 55-57。

[230]「CNPC 在全球」，中石油網, http://www.cnpc.com.cn/cnpc/cnpczqq/global_index.shtml

4, 乍德(查德)

中石油於 2003 年進入乍得投資，於當年 12 月和瑞士 Cliveden 簽訂 H 開發區風險探勘購股協議。2006 年，中石油取得 H 開發區 100%股權。到 2009 年 H 開發區中的 Bongor 盆地的 Cassia N-1 油井試油成功，合計日產量超過千噸。2007 年，中石油(60%)和乍得石油部(40%)合資建恩賈梅納煉油廠(N'Djamena)和配套的發電廠。煉油廠於 2011 年 7 月開始商業運轉。2008 年，乍得 H 開發區 Ronier 地區探得儲量 1.5 億噸。2009 年，乍得 H 開發區 Prosopis C-2 油井測試獲得高產，進而確定了邦戈盆地 Prosopis-Baobab 含油帶的億噸規模。2010 年，乍得 H 開發區 Naramay 地區 Cassia-1 油井測試得到日產千噸高產量油流。2011 年，乍得 H 開發區邦戈盆地東部新區發現油氣帶。2012 年，乍得邦戈盆地北端發現富油區 Lanea，Raphia 地區油氣探勘取得重要進展。

從中石油集團公司年報取得的資料中，從 2007 年迄今中石油在非洲的探勘成效大多集中在乍得。但 2013 年 8 月乍得政府由於中石油污染環境，要求中石油所有的投資停工。2014 年 3 月乍德政府要求中石油付 12 億美元罰款，最後經國際商會仲裁中石油須付罰金 4 億美元。乍得政府在 2012 年 1 月也曾因不同意恩賈梅納煉油廠對乍得成品油零售價格，而要求煉油廠停工。[231]

5, 毛里塔尼亞

中石油於 2004 年進入毛里塔尼亞，開始油氣投資和相關工程技術服務。中石油在毛里塔尼亞擁有 Ta13,Ta21,Ta12 和 Ta20 四個開發區。Ta13/21 區位於陶丹尼盆地(Taoudeni),面積分別為 19978.5 平方公里和 15292.45 平方公里。Ta12/20 區位於海岸盆地，Ta12 區面積 10339.05 平方公里。2006 年，Ta20 區的第一口井 Heron-1 獲得油氣顯示。

6, 突尼斯

中石油於 2004 年進入突尼斯，展開油氣投資和油氣田用工程技術服務業務。中石油於 2004 年 10 月買下科威特海外石油公司(KUFPEC)NK 開發區及 SLK 油田 50%的權益，合約總面積 3332 平方公里。

7, 利比亞

中石油 2005 年進入利比亞投資，簽訂 17-4 開發區探勘合約。17-4 區為海上油田，涵蓋面積 2566 平方公里，合約探勘期 5 年，生產期 25 年。

8, 尼日利亞

中石油於 2006 年標得尼日利亞 OPL298/471/721/732 四個開發區。其中 OPL298 和 OPL471 位於尼日爾河三角洲，屬於陸地和淺海開發區。尼日爾三角洲

[231]"Chad suspends China firm CNPC over oil spill," *BBC, News Africa* (14 August 2013), http://www.bbc.com/news/world-africa-2369726

是高風險地區，由於石油利益分配矛盾，尼日爾三角洲解放運動（MEND）在當地攻擊油田設施，綁架石油企業工作人員，迄今無解。

9, 赤道幾內亞

中石油於 2006 年進入赤道幾內亞投資，購買 Fruitex 擁有的 M 開發區 70%的股權，並擔負 M 開發區的營運責任。

以上是依據中石油集團公司在非洲投資的地區分佈和資產概況。但 IEA 資料顯示，2005 年 Shell 退出安哥拉 18 開發區後，中石油以 20 億美元從安哥拉政府買下 50%股權。[232]

表九：CNPC 2003-2012 年原油產量表　　單位：萬噸

年 度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1	2011	2012
國 內	10401.5	10455.1	10594.3	10663.6	10772.2	10825.2	10313.0	10541.4	10754.0	11033.3
海 外	1293.1	1642.3	2003.3	2087.3	2997.8	3050.0	3432.2	3603.0	4173.2	4152.6

資料來源：中石油集團年報。

http://www.cnpc.com.cn/cnpc/qywhcbw/cbw_index.shtml

（二）中國大陸對石油國企的金融支援機制

中國大陸的石油企業是國際石油投資的後進者，在面對有百年基業的西方同行時若無中國大陸政府的支持，將毫無競爭力可言。同時 2002 年以來的高油價，也改變了石油資源擁有國和石油公司在投資談判上的相對地位。但非洲石油生產國急需改善國內基礎建設，促進經濟多元化發展，以擺脫石油依賴時。使缺乏技術競爭能力和大型石油開發計劃管理能力的中資石油企業，可以用提供適合地主國需求的「整體規劃」，取得競爭優勢。「安哥拉模式」-以基礎建設交換石油即為這一策略的例證。

中共當局更在金融領域為石油國企提供支援，由中國進出口銀行以三種形式對中國大陸石油企業提供金融支援：對石油國企海外投資延長信用額度；對特定海外併購提供融資；投資地主國基礎建設或提供優惠貸款，間接支持石油國企在地主國的投資。但基礎建設換石油並非在非洲各國都通行無阻，中石油在尼日利亞以 20 億美元投資整建尼日利亞 Kaduna 煉油廠交換 4 個石油開發區，就因尼日利亞政府輪替而失敗。[233]

---

[232]Julie Jiang and Jonathan Sinton, “Overseas Investments by Chinese National Oil Companies,” http://www.iea.org/Publications/overseas_china.pdf

[233]Erica S. Downs, "The Fact and Fiction of Sino-Africa Energy Relations," *China Security*, Vol. 3, No. 3 (Summer 2007), p.54 .http://kms1.isn.ethz.ch/serviceengine/Files/cs7_03.pdf

1992 年中國大陸進口非洲石油是因為亞洲石油供應下降, 只有尋求非洲油源以補不足。由於非洲有大量未開發的石油儲量，充滿投資機會，到 1999 年非洲原油已成為中國大陸第二大油源。

中國大陸為尋求油源多元化，以分散對中東石油的依賴，決心到非洲投資時發現好的石油資產早在西方石油公司手中。加上非洲石油開發起步較晚，被認為是未來世界石油生產的重鎮。以致非洲石油投資市場，在 2007 年前已有約 500 家石油企業在從事上游石油探勘及開採。中國大陸石油企業必須和有技術和先進入市優勢的西方石油公司，非洲本土石油公司和亞洲石油公司(印度，馬來西亞，日本，韓國)競爭或聯盟。中國大陸石油企業的競爭優勢(也是備受爭議之處)在於中非關係被形塑成投資環境的組成部分。由於西方國家把對非洲的投資，援助和「華盛頓共識」建構的制度條件連結。而中國大陸的「不干涉」原則，使中資石油企業能在國家支持下，在非洲有爭議的地區投資。[234]中資石油企業更可運用以中國進出口銀行為核心，在中非友好的框架下所建構的貿易，投資和援助網路的協助進行石油資產和石油基礎建設投資。但由於是後進者，迄 2006 年中國大陸在非洲的石油資產的商業價值只有西方國家的 8%，而投資額只佔總額的 3%。如以單一國家尼日利亞為例，西方國際石油公司擁有尼國 98%的石油儲量和 87%的石油生產。[235]

2008 年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大陸石油企業加大海外投資腳步。從 2009 年初到 2010 年底，中國大陸石油企業海外投資金額高達 476 億美元。2009 年中國大陸前十大石油進口來源為，沙烏地阿拉伯，安哥拉，伊朗，俄羅斯，蘇丹，阿曼，伊拉克，科威特，利比亞和哈薩克斯坦。但並非一切順利，2009 年中石油提出以 4.6 億美元收購加拿大 Verenex 的股權被利比亞國家石油公司行使優先購買權阻擋。 2009 年中國大陸石油企業的海外原油資產為 1.1 百萬桶/每日，2010 年 1.36 百萬桶/每日，主要在哈薩克斯坦，蘇丹，委內瑞拉和安哥垃。[236]

2011 年以來的拉伯之春，南蘇丹獨立和尼日利亞的內部不安全因素，嚴重威脅到中國大陸石油企業在非洲的投資(蘇丹和利比亞的中方石油投資都主要為中石油)。2011 年 2 月，中國大陸撤出 35000 名在利比亞工作的中國公民。

---

[234]張娟，劉鑽石，「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與資源尋求型戰略」, **世界經濟研究** (北京), 2012 年第 3 期，頁 78。

[235]Bo Kong, China’s Quest for Oil in Africa Revisited, *SASI Working Paper*, p.7 http://sais-jhu.edu/default/files/BoKongWP1-11_1pdf

[236]Julie Jiang and Jonathan Sinton, *Overseas Investments by Chinese National Oil Companies* (Paris: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11), pp. 11-17.

2010 年中國大陸進口石油中利比亞佔 3%,到 2011 年降為 1%，2013 年則僅為 0.8%。中石油在格達費時期和利比亞國家石油公司共同開發石油，中國大陸並給予格達費政治支持。2012 年 2 月，中國大陸商務代表團到達利比亞，要求新政府履行未完成的 200 億美元合約。利比亞新政府承認前政府的商業義務，但表示無力履行合約義務。中石油在蘇丹的投資被視為中國石油企業海外投資的典範。2011 年蘇丹分離後，南北蘇丹武裝衝突，南蘇丹內戰和持續的族群紛擾使中國大陸的投資資產和收益都受傷害。2010 年，中石油在蘇丹每日生產原油 21 萬桶。2011 年中石油在蘇丹原油生產為每日 5 萬 9 千桶，南蘇丹為每日 15 萬 2 千桶。在 2011 年中國大陸進口南，北蘇丹原油為每日 26 萬桶，佔中國大陸進口總量的 5%。2013 年，中石油在南蘇丹每日生產石油 8 萬 4 千桶，蘇丹則為 5 萬 6 千桶。[237]

2011 年，中國大陸的石油企業投資區域有明顯的改變，即加強了風險意識，從政治不穩定區域轉向 OECD 國家投資，並加強和西方石油公司合作。2011 年和 2012 年，中國大陸在石油企業的海外投資分別為 200 億美元和 150 億美元，投資標的為上游石油和天然氣資源併購。就海外石油生產看，從 2011 年開始不但產量增加，同時地理分佈也趨向多元化。但仍有半數以上的海外石油產量來自非洲或中東高風險地區。[238]

中石油由於缺乏海外經驗，對社會和環境風險，衝突地區，低法律保障，地主國治理能力不足，政治不穩定等風險，缺乏防範意識。對 2011 年的危機，中石油集團認為『2011 年，公司克服地區局勢持續動盪帶來的諸多挑戰，建立建全海外風險預警機制，加強突發事件應對能力，使合作項目保持了安全，穩定，受控運行』。[239]

但 Moreira 認為，中國大陸的社會-政治脈絡是造成中資石油企業陷入政治/社會風險的主要因素。[240]Bo Kong 認為，中國大陸的整體利益和對非洲的戰略意圖,影響了中國大陸如何促進和保護在非洲的石油利益。在中國大陸的整體利益

---

[237]Julie Jiang and Chen Ding, *Update on Overseas Investment by China's National Oil Companies* (Paris: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June 2014), pp.27-32.

[238]Ibid.,7-13,20.

[239]「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 2012 年報」，頁 12, http://www.cnpc.com.cn/cnpc/qywhcbw/cbw_index.shtml

[240]Susana Moreira, "Learning from Failure: China's Overseas Oil Investments,"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Vol. 42, No. 1 (January 2013), p. 131.

高於石油利益的條件下，對石油企業的支持是限定在「走出去」戰略框架中，以貿易，投資和援助的機制來執行。[241]

西方學界大多已認同中國大陸石油企業在國家目標和企業利益的平衡上，保有相對自主性。中石油在蘇丹權益油運回本土的量小於出售給日本和韓國的量，和 2010 年中國大陸石油企業 92%的海外投資權益油是在國際市場出售，皆為利益考慮的例證。[242]

中石油向海外投資，除了鞏固中國大陸的石油供應安全外，強化競爭力以建立全球性的大石油企業也是中國大陸的政策目標。中國大陸石油企業在走出去之前，中石油依賴國內石油儲量，供應中國大陸的石油消費。但隨著經濟高速發展，中國大陸的石油消費超過了國內的石油生產量。IEA(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預測到 2030 年，中國大陸 79%的石油消費必須依賴進口。如果沒有具競爭力的國際石油企業，是無法承擔這項任務的。

中國大陸石油企業從 1990 年代從投資高風險地區西方石油企業棄之不顧的石油資產，到今日和國際石油公司共同合作，是中國大陸石油企業參與全球競爭的轉型效果。[243]累積 20 年的海外投資經驗，中國大陸的石油企業已成為全球石油併購的新參與者。而經由併購石油上游資產及合資經營也改善了中國大陸石油企業的生產技術。國際競爭使中國大陸石油企業不斷壯大，有能力應對進口石油的可能風險，保障石油安全。

第二節，中資私營企業個案：華堅集團

2014 年 5 月 4 日，中國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抵達埃塞俄比亞（Ethiopia），展開非洲 4 國訪問行程。在訪埃塞俄比亞訪問期間，李克強總理參觀了在當地投資的華堅集團，使中國大陸製造業向非洲轉移頓時成為話題。本論文選擇華堅集團對非洲投做為研究個案，主要原因在於台資或中資製鞋業於 2008 年為因應初期勞動力短缺和金融風暴危機，大多選擇向越南或中國大陸內地轉移。華堅卻向非洲投資，其投動機和選擇因素或可提供有益的參考價值。據媒體報導，林毅夫是華堅到非洲投資的推手，林毅夫認為，越南或其他東南亞國家，工資都在快速上漲，非洲由於勞動力充沛，將是勞力密集產業最後的樂園。[244]

---

[241]Bo Kong, China’s Quest for Oil in Africa Revisited, SASI Working Paper, 2, 17. http://sais-jhu.edu/default/files/BoKongWP1-11_1pdf

[242]Ibid.,9

[243]Ibid.,37

[244]中時電子報,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511000752-260302

華堅集團董事長張榮華於 1996 年到廣東東莞，做鞋業外包加工。當時東莞鞋業完全由 1980 年代中期進入大陸投資的台港資掌控，華堅是首先進入東莞鞋業領域的陸資。1990 年代後期，西方鞋類零售市場面對價格競爭壓力下，中高價品牌要求製造商向低要素價格區轉移。於是原本在意大利製造的部份品牌向巴西轉移，在巴西的中價位品牌向中國大陸轉移。巴西貿易商派諾蒙當時獨家代理耐偉（Nine West），決定把耐偉訂單向中國大陸轉移,華堅當時替台資 C 廠做派諾蒙公司訂單的中底定型代工。由於 C 廠價格強勢，巴西貿易商決心培植華堅以牽制 C 廠。在這種機緣之下，到了 1999 年華堅已成為派諾蒙的核心工廠。

華堅當時的核心競爭力在價格，為長期保持競爭優勢，華堅當時採取「小而全」策略廣設加工廠，把台資廠交給外包的工作完全自己承擔。由於價格優勢是華堅的核心競爭力，當 2002 年東莞薪資上漲和勞動力缺乏初現端倪時，華堅即到江西贛州設廠（ 廣東地區台資鞋廠大多在 2005 年以後才向江西轉移部分產能 ）,2004 年華堅曾投資越南但以關閉告終。2006 年和寶成合資成立鞋業研發中心-華寶研發中心。[245]2008 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亞洲製鞋業訂單減少，粗估中國大陸倒下鞋廠的產量為總產量的 30%。金融危機以後，中國大陸經濟向擴大內需轉向，不斷調漲薪資並取消出口退稅，以致勞動密集型出口產業利潤日漸微薄。為尋找出路，華堅集團是於 2011 年 11 月在埃塞俄比亞投資設廠。[246]

華堅埃塞俄比亞廠設在 Dukem 的東部工業園區(中非經貿園區之一)，位於首都 Addis Ababa 南方 30 公里處。工廠於 2012 年 1 月開始生產，2013 年成為埃塞俄比亞的前十大公司，目前僱用當地員工 3500 人。華堅的出口量已佔埃塞俄比亞鞋業出口 50%以上，並帶動當地相關產業發展。華堅集團董事長張榮華接受媒體訪問時認為埃塞俄比亞有以下幾個有利條件：工資便宜約相當中國大陸的十分之一，越南的五分之一；勞動力豐富,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轉移過去之後，可長期不虞匱乏；畜牧業發達，皮革資源豐富；非洲國家有出口歐美零關稅的優勢。不利因素為：基礎設施落後，運輸成本過高；海關清關原因導致跨國運輸時間過長；相關產業鏈在起步階段，降低生產效率。為解決生產鏈不足的問題，華堅和中非發展基金合作，與埃塞俄比亞政府簽署設立"埃塞俄比亞中國華堅輕工業城"，從中國大陸引進系列輕工業企業，以形成產業群聚效應。

華堅在非洲的成功，被方主流媒體如《紐約時報》,《金融時報》,CNN 正面報導，實在難能可貴。因為第一次有西方主流媒體正面報導在非洲的中資企業，中國大陸稱之為「華堅現象」。[247]

---

[245]「華堅集團」,鳳凰網, http://blog.ifeng.com/Print/Article/7114-0.shtml

[246]「冷行業中的暖企業：華堅集團」,南都周刊, http://past.nbweekly.com/Print/Article/7114_0.shtml

[247]非豹網, http://www.freepard.com/african/news/.htm?t=1000027242

由於華堅模式的成功，埃塞俄比亞政府計劃再建五個工業區，以吸引外國投資，發展本國經濟。預計工業區建成後，將進駐 80 家工廠，創造 20000 個就業機會。雖然中國大陸在埃塞俄比亞的鞋業投資目前是處於雙贏的局面，但有些分析家認為，大規模投資埃塞俄比亞存在不確定的經濟風險。牛津大學發展經濟學家 Stephan Dercon 認為：中國大陸和埃塞俄比亞雙方得益於目前的市場機會。但埃塞俄比亞投資存在長期的金融利益（financial benefits）不確定，最後的結果，尚待時間證明。同時埃國政府雖然提供四年免稅;低價土地和免電費，以吸引外來投資。但通訊設施不足;傲慢的官僚;埃國處於閉鎖的內陸沒有出口港;這些都會影響外來投資的投資意願。華堅在當地的陸藉人資主管認為：文化差異;語言障礙;當地員工的工作倫理欠缺是必須面對的困難，因為埃國充沛的人力資源和原料對華堅的發展更為重要。[248]

華堅集團在埃塞俄比亞的投資模式受到矚目，是為有別於中國大陸在非洲的資源投資；基礎建設承包；進口替代型的加工製造。華堅模式是改革開放初期「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模式，充分發揮了地主國的勞動成本優勢，並幫助剩餘勞動力就業。產品生產過程中，提升了當地的技術，產品出口增加外匯收入，改善地主國的國際收支。如果華堅模式造成外溢效應，促動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棄東南亞就非洲，對非洲發展可能甚有助益。

就國際投資理論看，華堅對埃塞俄比亞的投資符合比較優勢理論,利用地主國因缺少資本，技術而未能顯現出的勞動力和原料優勢，以兩國間的成本差距，創造更大的收益。同時仍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華堅仍保留在東莞和贛州生產。而為了強化自身在埃塞俄比亞的競爭優勢，華堅投資建設工業區，以產業群聚效應強化企業的競爭能力。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248]Ventures, http://www.ventures-africa.com/2012/05/china's-huajian-to-invest-2billion-in-ethiopia-export-to-europe-and-north-america/

第七章　中國大陸對非洲直接投資的政經成效評估

中國大陸對非洲的直接投資由於破壞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因而被西方社會視為新殖民主義和資源掠奪。但這種「妖魔化」中國大陸的語言，是其來有自的。非洲由於經歷長久的殖民統治，歐洲各帝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已成非洲的深層印記。加上民族解放後，非洲各國對原宗主國的經濟依附，使非洲被視為歐洲的後院。因此任何非西方的非洲事務參與者，都被西方國家視為帶有地緣政治的企圖。例如跨國伊斯蘭 NGOs 在非洲活動，就被視為是阿拉伯世界霸權計劃的一部分。因此中國大陸在非洲的投資被認為是「新殖民主義」，應不意外。更何況中國大陸和其他非西方國家的非洲參與者有很大的不同：印度和黎巴嫩的非洲投資是立基於殖民時期的移民族群；巴西則以葡語系非洲國家為基礎；中國大陸則是在延續冷戰時期的政治遺產上，以援助，投資和基礎建設相結合的途徑，和非洲國家進行經濟合作。再加上中國大陸對非洲經濟合作以「不干涉內政」為政治基礎，違背了西方以新自由主義為基礎的「結構調整」及對人權和民主的堅持。在意識形態差異引起的憤怒和不安下，西方媒體會「妖魔化」中國大陸和非洲的經濟合作，自然不足以為怪了。[249]

中國大陸在非洲的投資的特點是：投資額雖佔中國大陸海外投資比例極微，但參與者眾，投資範圍廣。中國大陸除中央國企，省級國企及私營中小企業參與非洲投資外，大量的中國大陸移民也到非洲尋找機會。投資領域更涵蓋工程建設，農業技術，加工製造，能源礦業和餐飲零售。在政策指導下，中國大陸除在非洲建立中非經貿合作區外，更設立中非發展基金作為促進對非洲投資的平台。但在投資規模上，中國大陸在非洲的投資年流量佔非洲的外資流量仍不算大。

一般認為：中國大陸對非洲的直接投資，主要是受國內資源需求和開發新市場兩個主要因素所驅動。[250]但如從國際投資理論檢視中國大陸的跨國企業，中國大陸的企業是缺乏核心技術，大多不具備內部化優勢和所有權優勢。因此政策驅動可能才是中資企業到非洲的主因。正如王碧珺認為的：雖然中國大陸企業沒有所有權優勢，但中資企業「具有的是特屬母國優勢，例如來自政府資金的支持，以及部份勞動密集型行業的比較優勢」；中國大陸企業並不具有結構優勢，對外直接投資是想通過外部市場的資源，進行國內產業結構調整。[251]而中資企業在對

---

[249]Ton Dietz, Kjell Havnevik, Mayke Kaag, Terje Oestigaard, “African Engagements: on Whose Terms? Africa Negatiating an Emerging Multipolar World,” in Dietz, Ton, Kjell Havnevik, Mayke Kaag, Terje Oestigaard eds., *African Engagements: Africa Negotiating an Emerging Multipolar World* (Boston: Brill, 2011), pp.2-3.

[250]Dominik Kopinski, Andrzej Polus and Ian Taylor eds., *China's Rise in Africa: Perspectives on a Developing Conne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p.1-8.

[251]王碧珺，「中國企業是否受到遏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受阻的原因與決定因素分析」，.

非洲投資的過程中，「特屬母國優勢」除金融支持外。在投資區位選擇上，中資企業選擇非洲的理由為何？依據Kolstad和Wiig的經驗研究發現:中資企業在投資區位上偏好大市場，資源豐富和制度匱乏的國家。但中國大陸在促進對非洲經濟合作的過程中，中共的政策及其特殊的模式和機制(安哥拉模式和中非經貿合作區）可能才是激勵中資企業在投資區域上選擇非洲的重要因素之一。[252]

至於中國大陸在非洲的投資的成效究竟為何？在經濟效益上，我們可以從貿易，就業，經濟成長三方面看中資企業對對非洲地主國的經濟貢獻。至於在政治上，我們可將美國和歐盟的反應視為對中國大陸對非洲經濟合作成果的外溢效應，以檢視中國大陸取得的成果。

第一節　中國大陸對非洲直接投資的經濟效益

在檢視中國大陸對非洲直接投的經濟效益時，必須認清中國大陸直接投資只佔非洲外資流入的一小部份。雖然中國大陸和非洲長期的經濟合作始於 1950 年代，但到 2000 年之後才繁榮興盛。

2012 年，非洲最大的外國投資者是英，美兩國並列第一位。2004-2013 年間，美國在非洲完成了 768 個投資計劃，佔同期外資的 12.2%。[253]中國大陸在直接投資流量和存量上，佔整體比例並不大。但在對非洲貿易和基礎建設上取得巨大的成果：中非貿易額在 1950 年約為 1 千萬美元，但到 1980 年代突破 10 億美。2000 年，中非貿易為 73 億美元,而到 2006 年可為 555 億美元。到 2008 年更高達 1068 億美元。2009 年中國大陸成為非洲最大的貿易夥伴。2010 年中非貿易額高達 1269 億美元。[254]中國大陸對非洲基礎建設援建方面，2012 年累計金額已高達 130 億美元。[255]

一，　中國大陸對非洲直接投資和中非貿易的關聯性

---

http://www.iwep.org.cn/upload/d20130408162653950.pdf

[252]Ivar Kolstad, Arne Wiig,“What determines Chinese outward FDI?” http://www.academia.edu/What_determines_Chinese_outward_FDI.pdf

[253]EY's attractiveness survey: Africa 2014. http://www.ey.com/attractiveness

[254]China-Africa trade-Setting the scene for the future. http://research.standardchartered.com/ China-Africa%20 trade%20setting%20 the%20 scene

[255]EY’s attractiveness sutvey. http://ey.com/Publication/EY-attractiveness-africa-2014

如果從孟代爾的「同值定律」來看，投資母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是對投資國出口貿易的完全取代。從 Veron 的品循環理論看，對外直接投資是成熟產品的競爭策略，而非促進雙邊貿易的工具。但小島清的邊際擴張理論則認為當投資國向地主國有序轉移邊際產業，就擴大了兩國之間的貿易。從這個觀點出發，對外接直投資和雙邊貿易存在互補性。當然，中國大陸和非洲國家的雙邊貿易的互補性，更涉及全球化，貿易自由化和價值鏈分工等外部因素。但純從商品貿易視角論，中國大陸對非洲的貿易互補作用是建立在中國大陸出口工業製品，自非洲進口天然資源的基礎上。

中國大陸和非洲的經濟合作始於 1950 年代，但到 2000 年之後才繁榮興盛。中非貿易額在 1950 年約為 12 百萬美元，到 1980 年代突破 10 億美元。2006 年可為 555 億美元，到 2012 年更高達 1985 億美元。中國大陸早在 2009 年已超越美國，成為非洲第一大貿易夥伴。[256]

中國大陸對非洲貿易有高度集中的傾向，以 2008 年中非雙邊貿易為例，中國大陸對非洲出口 60%集中在六個國家，其所佔比例分別為：南非 21%;埃及 12%;尼日利亞 10%;阿爾及利亞 7%;摩洛哥 6%;貝寧 5%。而進口的 70%則集中在四個國家，其分別為：安哥拉 34%;南非 20%;蘇丹 11%;剛果民主共和國 8%。除南非之外非洲國家對中國大陸的出口，大多以天然資源為主。中國大陸對非洲出口則以機械，車輛，成衣，鞋類為主。[257]

由於非洲各國資源稟賦和經濟多元化的差異，非洲 54 個國家中，對中國大陸貿易差順的為 14 國，貿易逆差為 39 國。2006-2010 年間，中非 10 大貿易夥伴的貿易額佔總額的 76%。這 10 國之中，有 6 國為石油出口國，其餘 3 國為相對多元的經濟體。交叉比對中非 10 大貿易夥伴和非洲 10 大對中出口國。可發現下列情況：天然資源是中非貿易的重要項目，但非洲對中出口產品多元化是可能的；非洲國家如能穩定成長，將是中國大陸龐大的潛在市場。[258]

張哲以 2009 年，中國大陸在非洲投資存量大小，選取較大的 12 個國家。這 12 個國家為：南非，尼日利亞，贊比亞，蘇丹，阿爾及利亞，毛里求斯，坦桑尼亞，馬達加斯加，尼日爾，剛果民主共和國，埃及和埃塞俄比亞。以 2004-2009 年這些國家的 GDP,和對中國大陸進出口額做為分析數據。從得出的數據看，雖然中國大陸的投資對這 12 個國家的對中貿易影響存在差異。但「中國的直接投資每增加 1 億美元，中國從非洲國家的進口平均增加 1.066 億美元」。[259]劉曉光，

---

[256]Ibid.

[257]Chinese Trade and Investment Activities in Africa. http://www.afdb.org/Chinese%20Trade%20%20Investment%20Activities%20in%20Africa.

[258]Ibid.

[259]張哲，「我國對非洲直接投資對中非貿易影響的效應分析」,

苟琴，盧峰，以 2003-2012 年中國大陸對外投資存量，進出口，GDP 數據，以貿易重力模型(Gravity Model of Trade)來分析中國大陸對外投資對貿易的影響。發現中國大陸對外直接投資和貿易存在正向關係，如果中國大陸對地主國的直接投資存量提高 10%,能促進下期對中國大陸該國出口增加 2.14%,進口增加 2.07%。[260]

中國大陸學者的研究確認了：中非貿易的互補關係；直接投資的規模越大，投資對貿易的促進效應可能越顯著。另外，不可忽略，除了直接投資外，中國大陸對非洲援建工程中，有關的裝備，材料採購，勞務輸出都直接涉及商品貿易，服務貿易領域，也促進了相關行業的出口。中非貿易以非洲出口天然資源，進口中國大陸的工業製品為主。目前非洲國家需要資本投資以支持成長，中資企業需要向價值鏈上游發展的商業機會。就中短期而言中非雙邊貿易的互補效應，有利於雙方「互利共贏」的發展目標。但對中國大陸而言，中非經濟合作的主要作用，應在整合長期穩定成長的非洲經濟和中國大陸為一體[261]。

二，中國大陸的投資和地主國的經濟成長

下撒哈拉非洲 2004-2012 年的平均 GDP 成長為 5.7%,。中國大陸的投資在其中扮演什麼角色？雖然經濟成長和外國直接投資的關係並不明確。 但一般認為外國直接投資可以為開發中國家創造就業，提高生產力和促進技術和管理能力。因此外國直接投資可以促進地主國經濟成長也就被視為理所當然了。但事實可能不盡然如此，雖然很多研究肯定外國直接投資和地主國經濟成長的正相關，但並非所有研究都取得正面的結論。因為外國投資要發揮帶動地主國經濟成長的作用，受制於以下幾個條件：地主國必須具備一定的人力資本基礎；地主國有健全的金融制度；地主國經濟開放程度；如果外資投資於製造業將有助於經濟成長，投資農業則會有負面影響。[262]

---

http://waas.cass.cn/uphold/.../d20110726132335640.pdf

[260]劉曉光，苟琴，盧峰，「中國對外投資對出口的影響分析」，
http://www.nsd.edu.cn/cn/21404031025143751482 9.pdf

[261]“China-Africa trade-Setting the scene for the future,”
https://research.standardchartered.coa%20trade20Sm/.../%China-Africetting %20the %20scene %20for %20the %20future.

[262]Sarumi Adewumi, “The Impact of FDI on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http://www.diva-portal.org/smash/get/deva2/FULLTEXT01.pdf

Adewumi 以經濟成長率，貨幣強勢程度，人口和地理分佈為基準，挑選 11 個非洲國家。使用聯合國貿發會(UNCTAD)1970-2003 年資料庫資料，研究外國直接投資和 GDP 成長在這 11 個國家中的因果關係。這 11 個國家是安哥拉，博茨瓦納，布基納法索，中非共和國，科特迪瓦，埃及，馬里，尼日利亞，南非，突尼斯和貝寧。Adewumi 的研究發現：外國直接投資和地主國的經濟成長，因國家而異。但以非洲做為整體看，外資的貢獻微不足道，這可能是外資流量或數據資料不足。同時外資帶來的技術和知識由於無法量化，也造成評估的困難。但他認為，從非洲觀點看：外國直接投資有益於非洲的經濟成長。

那中國大陸在非洲的投資對地主國的經濟成長究竟有沒有幫助？下撒哈拉非洲在 2005-2007 年經歷前所未有的經濟榮景，以平均 GDP 為 6%左右高於前 10 年平均 GDP 約 2%。Weisbrod 和 Whally 以 2008 年金融危機為分界，挑選 13 個國家以 2005-2007 年和 2003-2009 年間的產出，資本存量和勞動力等因素，以求得中國大陸的直接投資對他們 GDP 成長的貢獻。這 13 個國家是依經濟規模較大小和接受中國大陸直接投資較多為標準選定的。他們是安哥拉，博茨瓦納，剛果民主共和國，埃塞俄比亞，肯尼亞，加納，馬達加斯加，尼日爾，尼日利亞，南非，蘇丹，坦桑尼亞和贊比亞。研究結果肯定中國大陸的直接投資對非洲地主國的經濟成長有貢獻，但貢獻度依各地主國和年度而各自不同。此外，中國大陸在 2008 年之前投資聚焦於少數核心國家(蘇丹，贊比亞，尼日爾，尼日利亞和剛果民主共和國),在 2008-2009 年由於投資核心區位選擇相對擴大，中國大陸的投資對非洲國家 GDP 成長的貢獻度有擴大範圍的趨勢。[263]

Michalowski 用聯合國貿發會 1981-2010 年的數據，以外國直接投資存量佔 GDP 比計算後，得出外國直接投資和下撒哈拉非洲國家經濟成長的關聯性薄弱的結論。但他認為不能抹殺外國直接投資對下撒哈拉非洲的貢獻。對非洲未來的扶貧和成長，還有賴於非洲國家改善投資環境；加強基礎建設以降低運輸成本；強化人力資本，促進生產力；加深制度建設能力，改善公共管理；以外國直接投資促進本身的經濟多元化。[264]

三，中國大陸的投資提供的就業機會

---

[263]Aaron Weisbrod, John Whalley, “The Contribution of Chinese FDI to Africa's Pre Crisis Growth Surge,” http://www.nebr.org/papers/w17544

[264]Tomasz Michalowsk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Sub-Saharan Africa and its effects on economic growth of the region,” https://ekonom.ug.edu. pl/web/download.php?OpenFile970.pdf

外國直接投資無疑可以為地主國創造就業。但如果外資併購地主國企業進行重整，可能對就業有負面影響。對開發中國家而言：如果人力資本和基礎建設適合，能吸引外商進行勞動密集產業投資，而本國產業又能參與供應鏈生產，則可為國內創造就業最大化的效果。Adam Szirmai 認為：在非洲國家中，除政府部門和社會服務部門外，穩定的就業有賴於製造，營建，交通運輸，金融和商業服務。但從 1980 年中期以來，非洲的製造業發展長期不振。農業和服務業雖佔非洲國家 GDP 比例較高，但對就業和成長貢獻不大。由於缺乏和上下游產業鏈的連結，非洲的天然資源開採對就業的貢獻也並不高。以蘇丹的石油業為例，在中石油未投資建煉油廠之前蘇丹處於出口原油，進口汽油的窘境。[265]

非洲國家長期陷入高人口成長和低就業的循環。2008-2009 年，非洲人口成長率為 2.3%(我國 2005-2010 年為 0.36%)，總人口超過 10 億，其中 70%是青年。2012 年，下撒哈拉非洲地區成人失業率 5.9%,青年失業率 11.8%。[266]

但中國大陸在非洲的投資對非洲國家的就業貢獻如何？從整體而言，安永（Ernst & Young）評估 2012 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量為 13300 億美元，創造就業 1863600 人。當年非洲外國直接投資創造總量的 6.4%的就業人口，約為 119270 人。而 2012 年外資投資非洲流量為 550 億美元，中國大陸投資流量為 25 億美元。中國大陸投資非洲流量約為外資投資流量的 4.6%。按比例，2012 年中資企業在非洲約創造就業 5367 人。但實際人數當超過這個數目，因中國大陸投資以製造，工程營建和天然資源開採為主，這些產業一般較服務業僱用較多勞動力。[267]

至於中資企業在各別國家所提供的就業機會，情況又如何？本論文從有限的文獻中，摘要整理相關資訊，列舉如後：

（一）中資企業為南非提供的就業機會

南非是非洲經濟最發達的國家，其國內生產總值約佔非洲 20%。南非為中國大陸對非洲直接投資的重要流向區域。於 2007-2012 年期間，連續 6 年高居中國大陸對非洲投資存量第一位。2012 年，中國大陸對南非投資存量 47.75 億美元，

---

[265]Adam Szirmai, Mulu Gebreeyesus, Francesca Guadagno and Bart Verspagen, “Promoting Productive Employment in Sub-Saharan Africa,” http://www.merit.unu.edu/.../Produtive%20employment%20in%20Africa

[266]「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失業率居高不下」,中國經濟網, http://big5.ce.cn/gate/z20130515_2438558.shtml

[267]EY's attractiveness survey: Africa 2014. http://www.ey.com/attractiveness

位居中國大陸對外投資存量第 12 位。但南非長期以來失業率居高不下，南非政府在 2011 年提出規劃期望在 2030 年將失業率降至 6%。

表十：南非 1995-2012 失業率

年度	經濟成長率(%)	僱用人口(千人)	失業率(%)
1995	3	8069	17
2000	4.4	8790	25.4
2005	5	9425	26.7
2010	2.8	13061	24.9
2012	2.1	13577	24.9

資料來源：Huang Meibo and Ren Peiqiang, as foot note-268.

Huang Meibo 和 Ren Peiqiang 於 2012 年訪問 16 家在南非投資的中資企業，以瞭解中資企業僱用當地員工的一般情況如：僱用當地員工數量；南非勞動法令和工會對僱用當地員工的影響；中資企業的薪資水準。在他們的訪談中，中國大陸南非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認為在南非投資的 49 家中資企業，可為當地提供 13000 個職位。至於參與此次研究訪問的 16 家中資企業，大多為中國大陸國內知名企業，例如中國銀行，三一重工，海信，中國中鋼集團，中國一汽，中興通訊，中遠集團，廣西柳工機械等。據統計於 2012 年上半年，這 16 家企業共僱用中方員工 784 人，南非員工 4162 人。這其中僱用南非員工最多的為中國中鋼集團投資位於 Tubatse 的鉻冶煉廠，僱用 1098 人，佔全體員工的 99.8%。僱用南非員工最少的為三一重工，僱南非員工 12 人，佔員工數的 35.3%。

Huang Meibo 和 Ren Peiqiang 認為，有幾個情況使南非的就業狀況很難改善：南非的強勢工會和薪資協商制，使工資高於生產力；南非正由第一產業向第三產業轉型中的人力資本缺口，造成勞動力供需失調；南非勞動密集產業不足，無法提供大量就業機會。這些原因，使南非技術工人供不應求，而低階勞動力大量失業。同時也時中資紡織業在南非競爭力日趨下降，無力擴大。[268]

（二）中國大陸直接投資在加納的就業創造

加納位於西非，經濟以農業為主，可可，木材和礦產為主要產業。2012 年經濟總量在西非國家中名列第二。英國為加納最大投資國，其次是美國和德國。

[268]Huang Meibo and Ren Peiqiang, “A Study on The Employment Effect of Chinese Investment in South Africa,” http://www.ccs.org.za/ccs/DP_4_3013_Chinese_Employment_South_Africa_Huang_Ren_ONLINE.pdf(p.7,9,11,37)

2012 年中國大陸對加納直接投資存量為 5 億美元，約為中國大陸在南非投資存量的 1/9 弱。

表十一：2004-2012 年南非中資存量和和加納比較　　單位:萬美元

年度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南非中資存量	5887	11228	16762	70237	304862	230686	415298	405973	477507
加納中資存量	631	733	809	4187	5802	18504	20200	27015	50527

資料來源:中國商務部對外投資統計公報,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gzyb

TANG 和 GYASI 使用 2006-2010 年加納投資促進會的資料，研究中國大陸投資對加納就業的影響。2006-2010 年，加納外國直接投資流量合計約 128 億美元。中國大陸同期對加納的投資流量合計約 3 億美元，佔加納外國直接投資的 2.39%。中國大陸的投資中 77.22%投資於製造和工程營建業。在員工僱用方面，2006-2010 年在加納的中資企業僱用中國大陸籍員工 1828 人，當地員工 10048 人。這其中製造業和工程營建業佔僱用率的 52%。在 2006-2010 年期間 91%的新增就業，來自於中資企業。[269]

表十二：2006-2010 年中資企業在加納僱用員工分類百分比

部門	僱用加納員工人數	僱用非加納員工人數	合計員工人數	加納員工佔總額百分比
農業	146	20	166	1.20%
工程營建業	2237	401	2638	19%
製造業	3914	650	4564	32.90%
運輸業	1822	397	2219	15.30%
觀光旅遊業	755	92	841	6.30%
貿易業(含辦事處)	79	14	93	0.60%
服務業	1095	254	1349	9.20%
合計	10048	1828	11876	84.50%

資料來源: Decai TANG and K. B. GYASI, as foot note-269.

(三) 中國大陸的投資為贊比亞創造的就業機會

2012 年，中國大陸在贊比亞的直接投資存量達 19.9 億美元，為中國大陸在非洲投資存量的第二位。2004-2012 年贊比亞 GDP 為 6.9%。 但如果拿中國大陸在贊比亞的直接投資存量和贊比亞的外國投資存量比較那所佔比例仍很少。以

[269]Decai TANG and K. B. GYASI, “China-Africa Foreign Trade Policies: the Impact of China's Foreign Investment Flow on Employment of Ghane,” http://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57711_ china's_ investment_on_employment_of_ ghane

2010 年贊比亞的外國直接投資存量 85 億美元為例，當期中國大陸的投資存量僅為 9.4 億美元。

以創造就業論,Carmody 和 Hampwaye 依贊比亞開發局(Zambian Development Angency, ZDA)2008 年的統計，2000-2007 年間，中資企業僱用 7441 人，印度公司僱用 2139 人。Sinkala 和 Zhou 的研究則發現：2000-2012 年間，中國大陸對贊比亞的投資創造了 76000 個就業機會。這其中製造業佔 20%,工程營建 12%,服務業 10%,礦業 9%。以 76000 個就業機和 2000-2007 年資料比較，中資企業在 2008-2012 年間，增加僱用了贊比放員工 68559 人。[270]

2000-2011 年間，贊比亞失業率最高為 12.9%(2000 年),最低為 5.9%(2005 年),2012 年為 13.1%。要創造就業，降低高的青年失業率，贊比亞必須有能力引導外國資本流入和在創造就業間取得平衡。但由於贊比亞是天然資源豐富國家，外國投資不可避免的是以礦業為主。以 2011 年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產業為例：95.5%的外資流向礦業投資；0.76%流向批發零售業；0.71%流向金融保險業；製造業投資為-1.78%。贊比亞製造業投資不振是市場競爭失敗的結果，Mulungushi 紡織廠關廠已為贊國製造業提供了預警。Carmody 和 Hampwaye 在比較中國大陸和印度在贊比亞的投資中，發現外資「製造業是以(贊比亞)國內消費和向周邊地區如剛果民主共利國，莫桑比克，南非等國出口。礦業則向中國，印度和世界出口」。[271]贊比亞的外資製造業者的目標市場，已指出該國製造業面對的限制：由於贊國內陸國家的特性，周邊鄰國是運輸成本最低，也是最接近的市場；贊國產品價格，不具備國際競爭條件。

(四)中資工程營建業是非洲國家潛在的就業創造機制

中資企業在非洲另一個提供就業機會的領域，是中資工程營建公司。中資營建公司除了參與中國大陸政府主導的「安哥拉模式」,以援助工程換資源外，也參加世界銀行在非洲的工程投標。中資工程營建公司在提供當地就業機會上，可分為三個不同領域：分公司/辦事處員工；工地施工相關人員；工程分包商及材料供應鏈。工程分包商有中資和當地土木營造業者參與。材料供應鏈中如磚，砂石，水泥，門窗，油漆等，由於品質原因有中資承包商自行設廠生產。[272]

---

[270]Muchemwa Sinkala, Weidi Zhou, “Chinese FDI and Empolyment Creation in Zambia,” http://www.iiste.org/journals/index.php/JEDS/article/view/16755

[271]Padraig Carmody, Godfrey Hampwaye, “Inclusive or Exclusive Globalization? Zambia's Economy and Asian Investment,” http:www.tcd.ie/iiis/documents/discussion/…/iiisdp294.pdf

[272]Lucy Corkin, “Chinese Construction Companies in Angola: A Local Linkages Perspective,”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S0301427012000384

Chen, Goldstein 和 Orr 訪問 35 家在非洲承包工程的中國大陸國企，以 2001-2006 年在非洲承包工程分類，他們包的工程中：36.4%為一般營建工程；20.7%承包水利工程；有 13%為交通工程；9.8%是電力工程。但在這期間以工程項目計，以交通工程居多。

受訪者在回答有關員工僱用人數上：通常中國大陸的工程公司在非洲約僱用 8%的當地管理層員工及 51%的當地現場施工人員。不過僱用比例會因工程所在國而改變，一般在毛里求斯（Mauritius）中方會僱用高比例的當地員；在坦桑尼亞（Tanzania），幾內亞（Guinea），多哥（Togo）會僱用較少的當地員工。不過在中國大陸勞工工資持續上漲的情況下，中資工程公司在非洲已開始逐漸提高當地勞工比例。[273]另外，根據 Corkin 的研究，中國大陸工程營建業者在承包境外工程時，使用國內勞動力從 2002 年的 27.4%減少為 2010 年的 10.4%。但 Corkin 認為這個比例表示，海外派遣中國大陸勞工的生產力提高和僱當地勞工的比例提高。[274]但無論如何，中國大陸工程業者提高當地勞動僱用率的趨勢已形成。這對非洲的就業絕是件正面的事。

中國大陸的直接投資，為非洲當地低階勞動人口和部份中高階就業提供了就業機會，並緩解各地主國無技術勞動人力的就業壓力。這是真實的貢獻，但爭議亦隨之而來。由於中資企業的勞動條件，如工時，薪資，管理不符合當地法令或勞動者的期待，都成為批評爭議的焦點。在贊比亞中資企業的勞動爭議，甚至成為政治動員的口實。

中國大陸對非洲的直接投資在創造就業機會上是可被期待的。當然其基本條件是立基於地主國的人力資本能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中非經貿合作區的機制能否帶動中國大陸製造業向非洲轉移生產力;非洲公民社會能接受大型中資勞力密集企業在非洲出現。

西元 2000 年以前，非洲長期陷入發展停滯的困境中，全世界大部分的脆弱國家（fragile state）位於非洲。非洲國家的債務佔開發中國家的 11%,但收入僅佔開發中國家的 5%。下撒哈拉非洲國家的政府支出中，債務清償支出大於健康和教育的支出。但 10 年後情況完全改觀，經濟學人雜誌改變對非洲悲觀的預期，稱之為「充滿希望」。中國大陸對非洲的經濟合作，是改變非洲長期以來無力發展困境的最大單一因素。[275]

---

[273]Chuan Chen, Andrea Goldstein and J. Orr, “Local Operations of Chinese Construction Firms in Africa: an Empirical Survey,” http://gpc.standford.edu/sites/default/files/j014_0.pdf

[274]Ibid.

[275]Li Xing and Timothy M. Shaw, “From " Politics in Command " to " Economics in Command ": China-Africa Relations in an Era of Great Transformations,” in Li Xing and Abdulkadir Osman Farah

但下撒哈拉非洲的製造業除生產力和工資都無法和亞洲競爭外，再加上高估的匯率，較小的 FDI 流入和企業規模都造成非洲國家製造業佔 GDP 比重小於亞洲。非洲工業競爭受制於：低投資；基礎建設不足；政府治理能力低落；工業政策錯誤。除非能提高企業經營效率，並改善總體經濟，非洲國家才有機會向出口導向轉型。中國大陸對非洲製造業發展最可能的貢獻將來自於中非經貿合作區及中資企業投資的工業區。這些工業區將可形成規模經濟及群聚效應，帶動技術擴散及改變資源依賴結構。另外中國大陸給予非洲的貿易優惠也有助於非洲國家向經濟多元化轉型。[276]

但 Carmody 和 Hampwaye 認為，中國大陸的發展模式不見得適用於非洲國家。因為非洲國家已提前進入自由經濟體系，不同於中國大陸的社經脈絡使非洲無法參照中國大陸的發展途徑。但不可否認中國大陸製造業的投資，為非洲國家提供了經濟多元化的機會。[277]

中國大陸在 2009 年已成為非洲第一大出口國，中國大陸的天然資源需求在 2008 年之前推動商品價格走高。中國大陸對非洲製造業發展最可能的貢獻將來自於中非經貿合作區及中資企業投資的工業區。這些工業區將可形成規模經濟及群聚效應，帶動技術擴散及改變資源依賴結構。另外中國大陸給予非洲的貿易優惠也有助於非洲國家向經濟多元化轉型。[278]

第二節　中國大陸在非洲投資的政治成效

中國大陸和非洲的經濟合作究竟有沒有成果？最簡單的判斷方式，是從西方國家的反應來衡量。對西方國家而言，中國大陸在非洲的經濟活動是對現行國際援助體系和國際貿易價值的破壞。西方媒體大多認為中國大陸在非洲的存在，損

---

eds., *China-Africa Relations in an Era of Great Transformations*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13), pp.8-9.

[276]Ron Sandrey and Hannah Edinger, “China's Manufacturing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Africa,”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Working Paper* No. 128. https://www.afdb.org/fileadmin/uploads/Working%20128.pdf

[277]Padraig Carmody, Godfrey Hampwaye, “Inclusive or Exclusive Globalization? Zambia's Economy and Asian Investment,” http:www.tcd.ie/iiis/documents/discussion/iiisdp294.pdf

[278]Ron Sandrey and Hannah Edinger, “China's Manufacturing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Africa,”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Working Paper* No. 128. https://www.afdb.org/fileadmin/uploads/Working%20128.pdf

害了非洲人民的利益(非洲媒體則是毀譽參半)。為了平衡中國大陸在非洲的政治經濟活動，西方國家改變自 1980 年代以來對非洲的漠視。[279]

歐盟認為中國大陸支持被歐盟抵制的國家，破壞了歐盟促進非洲民主化的進程。為了在非洲推廣良好的治理，以抑制中國大陸在非洲的影響力，歐盟提出歐盟-非洲峰會的倡議。[280]

2000 年 4 月，第一屆歐盟-非洲峰會在開羅召開，在會議上雙方雖通過共同宣言和行動計劃。歐盟置會議重點於人權，民主和衝突防範。非洲國家則關心債務減免，援助和貿易。第二屆峰會原訂於 2003 年 4 月在里斯本舉行，但由於歐盟制裁津巴布韋總統穆加比(Mugabe)，不准他入境歐盟。非洲國家領袖則堅持穆加比必須參加峰會，因此第二屆峰會延至 2007 年 12 月才舉行。第三屆峰會在利比亞首都的里波里舉行，英，法，德三國缺席。第四屆峰會在 2014 年 4 月在布魯塞爾舉行為期兩天，經濟及非洲南部的安全問題為討論重點。[281]歐盟置重點在政治上，2000 年 10 月成立的中非合作論壇則以經濟合作為重心。在歐盟眼中，中國大陸在非洲的共同發展是出之於能源安全和市場開發的經濟目的。中國大陸的「不干涉」政策，更破壞了西方基於新自由主義原則推動的經濟結構調整；促進人權和民主治理。[282]因此中國大陸在非洲的崛起，被認為是對非洲充滿負面的影響。歐盟於 2005 年和 2007 年分別提出新的歐盟-非洲關係的規劃，以整合對非洲的援助，貿易。在歐盟眼中，中非合作論壇不但是對歐盟-非洲關係的潛在威脅，更可能破壞現有的發展典範。歐盟宣揚南北合作的優越性，強調非洲須在人權和民主的架構下全面發展政治，經濟和社會。中國大陸強調中-非合作是在平等，互利，不干涉內政的基礎上進行的。

美國的非洲政策有其長期穩定性，穩定其實是因為下撒哈拉事務不具備政策優先性。美國的下撒哈拉非洲政策，以保證能源和戰略資源供應安全為主。911 之後基於反恐需要成立非洲司令部(AFRICOM)，並擴大對幾內亞灣周邊石油資

---

[279]Ashley Kim Stewart and Li Xing, “Beyong Debating the Differnces: China's Aid and Trade in Africa,” in Xing, Li and Abdulkadir Osman Farah eds., *China-Africa Relations in an Era of Great Transformations*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13), pp.23.

[280]Sanne van der Lugt, “How does the Chinese Involvement in the African Contient affect African Sovereignty in the Context of the Changing Nature of Power,” in Ton Dietz, Kjell Havnevik, Mayke Kaag, Terje Oestigaard eds., *African Engagements: Africa Negotiating an Emerging Multipolar World* (Boston: Brill, 2011),p.196.

[281]Maurizio Carbone, “The European Union and China's rise in Africa: Competing vision, external coherence and trilateral cooperation,” in Dominik Kopinski, Andrzej Polus and Ian Taylor eds., *China's Rise in Africa: Perspectives on a Developing Conne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p.76-78.

[282]Ibid.,78-83.

源豐富國家的軍事援助和訓練。[283]2014 年 8 月 4-6 日，美國在華盛頓舉行「美非高峰會」, 有 50 位非洲國家領袖出度。會議揭幕時，歐巴馬總統承諾美國對非洲將投入 340 億美元，推動非洲的貿易，投資和電力普及。但高峰會結束後，並未提出任何宣言，行動計劃。這使得此次峰會的「未來互動缺乏具體藍圖」。[284]

中國大陸在非洲的核心利益一向是政治利益，因為中國大陸在重大國際問題上需要非洲國家的支持。中國大陸運用非洲國家的支持，可在國際組織中抵消西方國的影響力。最具體的例子可以西方在國際組織中譴責中國大陸的人權時，每遭非洲國家反對而無法成案。

在經濟發展上，中國大陸需要非洲豐富的自然資源。但由於非洲在發展過程中，除接受前殖民宗主國強加的政治系統和失敗的基礎建設外，更加上後殖民時期失敗的政府治理，形成非洲獨特的政經脈絡。歷史因素更使非洲形成特殊的碎片化商業環境，製造業缺乏競爭力。這讓非洲國家無法以製造業出口導向模式發展。明顯的後果即為非洲經濟的資源依賴和農業依賴(主要為花卉及特殊蔬菜)特性。[285]中國大陸在這兩個領域中，並不佔有競爭優勢。中國大陸的競爭優勢在「不干涉」及「互利共贏」的援助和投資政策。對非洲國家的政治領袖而言，比西方國家帶有強迫性「自由化」條件的貿易和援助而言較有吸引力。[286]但中國大陸對地主國的不干涉政策，破壞了西方基於新自由主義原則推動的經濟結構調整，促進人權和民主治理。因此中國大陸在非洲的崛起，被認為是對非洲充滿負面的影響。

經過 10 年的努力，中國大陸現在是非洲的第一大貿易夥伴，為非洲的輕工業製品和農產品提供了出口市場。中國大陸的援助為非洲提供了不附加條件的工業，基礎建設，技術支援和訓練。中非貿易的擴大不但有益於非洲國家的經濟成長，中國大陸的低價工業產品更為非洲消費者提供了，除己開發國家高價工業產

---

[283]Ton Dietz, Kjell Havnevik, Mayke Kaag, Terje Oestigaard, “African Engagements: on Whose Terms? Africa Negatiating an Emerging Multipolar World,” in Ton Dietz, Kjell Havnevik, Mayke Kaag, Terje Oestigaard eds., *African Engagements: Africa Negotiating an Emerging Multipolar World* (Boston: Brill, 2011),p.25

[284]嚴震生，美非峰會 縮短與中國的「影響力落差」 http://mag.udn.com/mag/news/storypage.jsp?_f_ART_ID=528872

[285]Peter Knorringa, “Responsible Production in Africa: “The Rise of China as a Threat or Opportunity?” Mine Pieter van Dijk ed., The New Presence of China in Africa, pp.183-184. http://repub.eur.nl/pub/21256/NewPresenceCinA.pdf

[286]Ibid.,187.

品之外的另一種選擇。[287] Carmody 和 Taylor 把中國大陸在非洲的經濟地緣戰略所展現的多樣治理模式稱之為彈性的霸權(Flexigemony)，「彈性的霸權」概念是相對於華盛頓共識要在全球形成有利於西方資本的流入架構，並制度化阻止地主國政府的過度干預。中國大陸在不違反國家目標的大原則下，以靈活的手段因應不同的對象。[288]

雖然中國大陸對非洲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吸引力，建立在中-非經濟合作上所採的「互利共贏」策略。但中國大陸在外交目標和企業行為無法保持一致，中資企業在非洲的爭議性行為破壞了中國大陸所欲建立的正面形象。在非洲投資的中資企業除中央及地方國企外，也包括向海外投資的私營企業和在地主國創業的中資私企。由於「軟實力」不足，中國大陸企業公關能力不足，中資移民商業經營者缺乏溝通能力，都足以損害中國大陸的正面形象。使中資企業的商業行為和利益常對中國大陸的政治和外交利益造成破壞性的影響。[289]例如贊比亞 Lusaka 和銅礦帶因為中國大陸的投資成為贊比亞貧困度最低的地區，卻因中資企業的勞動條件成為反中情緒最強烈的地區。造成這種反差的原因，要從長期的歷史因素思考。一方面殖民時期的制度影響仍存在於現有非洲各國的制度之中。同時大多數非洲精英是長期在西方教育下成長，心理上不易接受其他的選擇。大部分的非洲政府領導和高階主管都接受過西方教育，思考已完全內化為西方模式。例如贊比亞雖位列 LDC 國家(Lest Development Country)，其公民社會發展和工會影響力遠超過一般開發中國家。[290]

中國大陸在非洲的投資並不具備競爭優勢，同時中國大陸在非洲的經濟利益結構存在內在矛盾。中資企業的內部矛盾，西方的指責和非洲本土的反彈，在在顯示中國大陸的「軟實力」缺陷。縱使如此，中國大陸促進了非洲的經濟發展。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287]Antony Otieno Ong'ayo, “China-Africa Relations: the Relevance of Strategic Engagement of Africa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in Ton Dietz, Kjell Havnevik, Mayke Kaag, Terje Oestigaard eds., *African Engagements: Africa Negotiating an Emerging Multipolar World* (Boston: Brill, 2011), pp.256-257.

[288]Padraig Carmody, Ian Taylor, “Flexigemony and Force in China’s Strategy in Africa: Sudan and Zambia Compared,” http;//www.tcd.ie/iiis/documents/discussion/iiisdp277.pdf

[289]Xu Yi-chong, “Capitalist or Villain: Chinese SOEs in Africa,” in Li Xing and Abdulkadir Osman Farah eds., *China-Africa Relations in an Era of Great Transformations*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13),p.103.

[290]Ton Dietz, Kjell Havnevik, Mayke Kaag, Terje Oestigaard, “African Engagements: on Whose Terms? Africa Negatiating an Emerging Multipolar World,” in Ton Dietz, Kjell Havnevik, Mayke Kaag, Terje Oestigaard eds., *African Engagements: Africa Negotiating an Emerging Multipolar World* (Boston: Brill, 2011),pp.25-29.

中國大陸被責難,是因為中國大陸在非洲的經濟合作途徑和西方的發展途徑衝突。[291]

以蘇丹為例，西方國家在 1990 年代對其實施經濟制裁。蘇丹唯有選擇和中東及亞洲新興經濟體合作，這形成蘇丹長期內部動亂和長期經濟成長並存。1996 年以後，蘇丹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選擇中國大陸做為其開發夥伴。中國大陸的合作開發策略和西方國家的不同之處在於：西方國家是以財政支持特定領域的開發，中國大陸是以支援基礎建設和天然資源投資為主。為求援建項目有效執行，中國大陸要求蘇丹政府在項目分配上接受蘇丹國會監督。但援建項目由蘇丹政府的需求決定，並不像西方國家的援助，援助國通常提出附加條件和優先順序。蘇丹的發展途徑可能並不完美，但其意義在於西方堅持的新自由主義式的結構調整，對前殖民地國家無法產生正面效果。[292]

中國大陸和非洲國家的經濟合作所代表的意義為何？中國大陸是否能提供非洲國家另一種發展模式？

Taylor 認為中國大陸在非洲以全球生產網路，緊密的雙邊關係及多邊機制(中非合作論壇)相結合，挑戰歐盟及美國的戰略影響力。[293]

Ayodele & Sotola 認為中國大陸為非洲提出新的發展途徑，經濟發展是可以由國家指導達成。中國大陸的發展經驗告訴非洲國家，什麼樣的政治體制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政府的經濟政策。[294]

Vittortini & Harris 不同意中國大陸為非洲提供了自由主義框架之外的發展策略。因為非洲的經濟自由化也是投資動力之一。贊比亞在 IMF 要求下進行的結構調整，就為中資企業提供了投資的機會。[295]

van Dijk 認為：中國大陸可以用自身從全球化中穫利的模式，幫助非洲從全球化中取得發展動力。但條件是非洲國家必須如中國大陸在發展道路上走自已

---

[291]Jing Men, “China and Africa: Old Friends, New Partners, Hickey,” in Dennis and Baogang Guo eds., *Dancing with the Dragon: China's Emergence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10),p.138.

[292]Mohamed Salih, “Beyond Negotiating A Multipolar World: Sudan's Non-Wester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lternative,” in Ton Dietz, Kjell Havnevik, Mayke Kaag, Terje Oestigaard eds., *African Engagements: Africa Negotiating an Emerging Multipolar World* (Boston: Brill, 2011),p.172.

[293]Padraig Carmody, Ian Taylor, “Flexigemony and Force in China’s Strategy in Africa: Sudan and Zambia Compared,” pp.17-19. http;//www.tcd.ie/iiis/documents/discussion/iiisdp277.pdf

[294]Thompson Ayodele & Olusegun Sotola, “China in Africa: An Evaluation of Chinese Investment,” http://www.nhsmun.org/china-africa-evaluation-chinese-investment

[295]Vittorini & David Harris, “New topographies of power? Africa negotiating an emerging multipolar world,” in Ton Dietz, Kjell Havnevik, Mayke Kaag, Terje Oestigaard eds., *African Engagements: Africa Negotiating an Emerging Multipolar World* (Boston: Brill, 2011), pp.280-299.

的路，不受外部約束。中國大陸的成功模式雖有其自身的歷史現實和文化特點，但抓住機遇和勤奮工作的精神是可複製的。中國大陸的發展模式不見得適用於非洲國家。因為非洲已提前進入自由經濟體系，不同於中國大陸的社經脈絡使非洲無法參照中國大陸的發展途徑。但不可否認製造業的投資，為非洲提供了經濟多元化的機會。[296]

中國大陸在非洲的直接投資為非洲帶來了經濟成長；削弱了歐洲由於長期殖民遺留的經濟和文化影響力；更為非洲國家提供了和西方國家討價還價的槓桿。但非洲的成長擺不脫「資源依賴」的因素。2014 年原油價格下跌，非洲國家應無法倖免於負面影響。非洲經歷長期的西方殖民統治，西方價值及文化的烙印影響當地至深。中國大陸的投資，由於文化歧異和管理不當竟引起當地民眾意外的憤怒，要如何緩解？非洲屬區域矛盾和國家內部矛盾頻發地區，而中國大陸軍事力量不足，一旦重大危機發生可能無力保護投資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296]Mine Pieter van Dijk ed., *The New Presence of China in Africa.* http://repub.eur.nl/pub/21256/NewPresenceCinA.pdf

第八章　結論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以全世界最大的開發中國家藉著要素稟賦優勢和全球化浪潮，吸引大量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隨時間推移，中國大陸於 2013 年已成為全世界第一大貿易國。1978 年改革開放之後外資流入實功不可沒。但中共推動「走出去」戰略並非完全順遂，尤其中國大陸在非洲以援助，貿易和投資共構的模式，被西方國家視為「新殖民主義」。雖然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被視為國家資本主義，同時中國大陸並不諱言其重商主義傾向的經濟政策。但更深層的原因是中國大陸在非洲的投資觸動了原有的利益格局，招致原殖民宗主國的反彈。

其實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即進行海外投資，並在政策上逐步放寬對外投資的管制。但直到經濟實力增強，中共始於 2000 年確立「走出去」戰略，全面鼓勵具比較優勢的企業到海外投資，擴大市場，學習先進的管理和技術。非洲雖有廣大的市場和豐富的資源蘊藏量，但在 1990 年代後期非洲大陸充斥著「脆弱國家」,「失敗國家」,明顯的不是理想的投資區域。然而中資企業並未忽略非洲，其理由安在？中國大陸的對外直接投資固然依循市場因素，但國家指導在經濟活動中仍扮演主要的角色。中國大陸對非洲的投資從經濟層面看是為了保障資源安全，開拓新市場和協助國內產業結構調整。但其背後實有更大的國際政治經濟意圖，即經由對非洲國家的經濟合作，以發揮中國大陸的影響力，從而平衡西方國家在國際組織中任何不利於中國大陸的提案。加上，中共早在冷戰時期在非洲即以經濟援助和軍事訓練為手段和美，蘇抗衡。改革開放後，中共對非洲的援助逐漸由「無償援助」向「經濟合作」轉型。在中共確立「走出去」戰略後，中國大陸國企在非洲的資源投資活動日漸引起西方媒體注目。由於意識形態的差異和中共的「不干涉」原則破壞了西方在非洲推動的政治民主化和經濟自由化。加上，非洲長期以來為歐洲前殖民宗主國的「後花園」。現在中國大陸強勢介入，自然引起西方國家不快。「妖魔化」中國大陸在非洲的經濟活動是掠奪非洲的天然資源，是再自然不過了。至於中國大陸在非洲是「新殖民主義」嗎？以中國大陸在非洲投資額相對西方國家為少；在非洲國家的投資一再受地主國公民團體非議；甚至無法保護在利比亞和蘇丹的大量石油投資。實在不足以稱之為「新殖民主義」。

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在「探索中共對非洲投資的政策機制，模式和動機，以評估中國大陸對非洲投資的具體成效和限制，及對非洲政經發展的影響」。本論文原期望由 John H. Dunning 的折衷理論為途徑分析中資企業在非洲的投資選擇和優勢，再以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經濟民族主義途徑分析中國大陸對非洲的投資的成效及影響。經由本論文各章節逐步探究，分析文獻內容，大致可瞭解中國大陸對

非洲投資的歷史脈絡及演化，投資模式，特色及不足。但中資企業在海外投資時並不具備「所有權優勢」,反而是國家政策更大的引導了中資企業的商業決策。雖西方學界大多認為中國大陸的非洲投資動機：國企是資源尋求；私營企業為市場尋求。但從整體言，中共在非洲的核心利益是政治，投資是為爭取非洲國家以在國際組織抵消西方國家的影響力。中共的非洲政策向經濟合作轉變過程中逐步形成對非洲投資的政策機制:「中非發展基金」,「中非經貿合作區」和以運用援助(基礎建設),貿易，投資相結合的多種操作模式。至於中國大陸對非洲直接投資產生的效果，正如 Ian Taylor 所言：中共在非洲以「全球生產網路，緊密的雙邊關係及多邊機制相結合，挑戰歐盟及美國在非洲的影響力」。

本論文原期望能從文獻分析中，發現中國大陸在非洲投資的具體政經成效。但受限於文獻不足，無法深度探討，故僅能轉而探究非洲國家由於中國大陸的直接投資在經濟成長，貿易，就業的效益。

第一節　研究結果及發現

一，中國大陸在非洲的投資機制是自身發展經驗的路徑依賴

中國大陸在非洲採取了不同於西方國家的投資機制，其一為以援助基礎設施建設和投資相結合；其二為建立經貿合作區，鼓勵中資企業向非洲轉移。這兩個發展機制，都是擷取自中國大陸本身成功的發展經驗之中。中國大陸再結合非洲的現況修正執行。中國大陸意圖移植自身成功的發展經驗，期望促進非洲發展，建構影響力。

(一) 援建和投資相結合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後，為挽救早先在非洲的援建案採取以債轉股方式，讓中資企業參與合資經營。這樣中國大陸逐漸形成了中資國企在非洲以援助和投資相結合的特有模式。加上西方國家對非洲援助的宗旨，在 1970 年代後期即從促進生產力轉向提供福利和服務。這為中國大陸以「工程援助+投資開發」和「資源-信貸-項目」兩個投資合作模式提供了機會。

工程援助+投資開發模式是中國大陸提供地主國基礎設施援助貸款，由中資企業競標建案，更鼓勵中資企業在當地進一步建立合資企業或外包產業鏈。而資源-信貸-項目模式即是「安哥拉模式」。是地主國以天然資源收入做為還款擔保(安哥拉是以石油擔保)，由中方提供基礎設施建設貸款，中資企業競標建案，再由第三方監理施工進度，待地主國財政部批准付款後由中國進出口銀行存入承包

商帳戶。這種以資源換貸款的模式，是來自於 1980 年代中國大陸以石油和煤償付日本貸款的修正方式。

援建和投資相結合的模式實施以來達到了中非「互利共贏」的目的。對地主國言改善了地主國基礎設施不足的困境。對中方而言，則保障了天然資源的來源，強化了中資營建業的能力，促進了中國大陸相關裝備的出口。

（二）中非經貿合作區

中非經貿合作區更是中國大陸自身經濟特區發展經驗的移植。但還是有區別的，中國大陸的經濟特區或工業園區是為吸引外資或促成產業群聚效應而設的。中國大陸的「中非經貿合作區」是為推動中資企業「資本輸出」,再以外溢效應促進地主國製造業發展，這不可不謂立意良善。但其意圖究竟還是為有利於中國大陸的產業結構調整，向海外轉移過剩產能及減少貿易磨擦為目的。對個別中資企業而言，經貿合作區有助於改善當地的投資環境，為中資企業進入非洲提供了簡便的行政程序和稅率優惠。但不可避免的，中資企業仍必須面對園區外基礎設施不足和當地工業基礎薄弱的現實。目前為止，中非經貿合作區的積極效應並未顯現，可能是由於經貿合作區營運時間尚短，或有其他因素尚待時間檢驗。

二，中方軟硬實力皆不足，無力應對衝突保護投資

二戰後獨立建國的非洲國家，歷經 50 餘年大多仍陷於發展停滯的困境。原因固然錯綜複雜，但可簡單歸之為：殖民時期的歷史遺諸，成為今日內部不安定的因子。本論文對蘇丹的個案研究中即指出：蘇丹問題是英國殖民統治時期治理策略有意為之的，即可為例證。同時對前殖民宗主國而言，軍事力量介入保護在非洲前殖民地利益，似乎是理所當然之事。最近的例子為，2012 年底法國介入馬里內戰。

中國大陸從 1995 年起中石油就開始在蘇丹進行石油探勘及投資，並逐步形成完整的石油產業鏈。平心而論，如果沒有國際制裁蘇丹，中石油是沒有機會在蘇丹建立從探勘-開採-煉油-油管運送-儲油-出口和加油站零售完整產業鏈,並經營管理。除投資外，中國大陸並在政治上支持蘇丹，阻撓或減緩聯合國對蘇丹制裁的壓力。2008 年，中國大陸在國際輿論影響下，改變態度，說服蘇丹同意舉行南蘇丹獨立公投。南蘇丹獨立後並未降低中國大陸的壓力，反而造成更大的投資損失。

2011 年利比亞爆發內戰。內戰前，2010 年利比亞石油佔中國大陸進口石油的 3%。內戰結束後,中國大陸進口利比亞石油比降為 0.8%。中石油在利國有油管

工程及石油探勘業務。中石油於 2002 年進入利比亞，在利比亞設有 5 個子公司。中國大陸在利比亞有 75 家企業(其中 13 家為中央國企)和 3.6 萬工程建設人員。2012 年中共要求利國新政府清償 200 億美元未付工程款。利國政府確認債務，但聲稱無錢償還。[297]

以上蘇丹和利比亞為中國大陸近年兩個重大的海外投資損失案例。其他如尼日河三角洲海上油田中國工人被綁架；贊比亞 Collum 煤礦罷工事件中，中方員工被殺；尼日利亞紡織業抱怨中國大陸紡織品扼殺了他們的生機；2006 年 Sata 威脅如當選總統將要求中資退出贊比亞；這些都是中國大陸在非洲投資面臨軟，硬實力皆不足的危機。

在硬實力方面，中國大陸一方面本身軍事實力不足無法如西方強國實行海外遠征，保護經濟利益。同時，中國大陸缺乏盟友，無法聚集國際間集體力量鎮壓第三方。可能長時間內，中國大陸都無法建構足夠的硬實力以保護在海外的投資利益。那麼中國大陸的在非洲的軟實力又是如何呢？

Joseph Nye 定義軟實力為：一種藉由吸引力，而非強制力取得所欲目標的能力。因此軟實力是理念，價值，文化和想像的力量。擁有軟實力意為:將價值，文化，理念傳播滲透內化為他者的價值。非洲久經殖民統治，非洲精英層早就完全認同殖民時期的價值。[298]當代非洲精英更是完全接受西方教育而成長，更深了他們對西方價值的認同。

這將不是中國大陸可以投資，貿易等商業利益或援助，獎學金，培訓能輕易改變或爭取的。況且國家中心論的跨國公司研究途徑強調：跨國公司是本國經濟文化和歷史的產物。中資企業在非洲會自然傾向於採取長工時低工資，不重視環保和企業社會責任的態度，是因為其原本在國內即如此。相信西方企業在非洲絕對有同樣的問題，只是程度不同和媒體是否宣揚罷了。媒體隱善揚惡和隱惡揚善之間的差異，正是軟實力之有無的差別。

從中石油的年報觀察，中資企業應已開始強調「企業社會責任」,這應可逐漸改善中資企業和非洲當地社群的關係。至於真要建構中國大陸在非洲的軟實力可能尚需時間累積。當前中資企業要規避投資風險，還應從事前評估和金融保險下手較符合中國大陸的現況。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

[297]Ibid., 28

[298]Stephen Ellis, “Africa in the World: a Histotical View,” in Ton Dietz, Kjell Havnevik, Mayke Kaag, Terje Oestigaard eds., *African Engagements: Africa Negotiating an Emerging Multipolar World* (Leiden: Brill, 2011), p.365.

本論文是以相關文獻整理為主的描述性研究。本論文的研究目的，是希望從文獻內容分析中找出中國大陸在非洲直接投資的商業模式和其影響。由於研究內容廣泛，本論文並未限定具體的地區及行業。因此不可避免的本論文內容冗長，涉獵範圍過廣。再加上，某些資料搜尋不易或竟無資料可查。原計劃分析研究中國大陸的工程業和採礦業在非洲的投資活動，都因資料不足而放棄。而中國大陸商務部統計資料數據和西方文獻差距頗大。以 2006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對外投資統計公報為例，公報指出當年中國大陸對安哥拉直接投資流量為 2 千 2 百萬美元。而 Lucy Corkin 在“Uneasy Allies: China Evolving Relations with Angola.”文中指出：中石化在 2006 年以 7 億 2 千 5 百萬美元收購安哥拉 18 石油開發區 50%股權。受限於資料來源，本論文無法釐清造成資料數據差距之原因。因此，本論文中有關中國大陸對非洲投資的數據資料，以中國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外匯管理局公佈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為準。至於非洲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流量，則取自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之相關數據。由於中國大陸相關文獻資料不足，中國大陸的投資在各別非洲國家的情況及數據，則取材自西方學界的相關研究資料。至於中國大陸在非洲的直接投資取得的實質成效為何？因缺乏客觀的評估資料，本論文無法從微觀視角評估中國大陸在非洲投資所取得的經濟效益。因此，本論文分別從非洲地主國由於中國大陸的直接投資所取得的經濟效益，和中國大陸在中非洲經濟合作上的政治成效來評估中國大陸的投資。

對後續可能的研究建議，本論文認為由於下撒哈拉非洲在過去 10 餘年來已取得不錯的經濟成長，逐漸擺脫 1990 年代非洲發展停滯的困境。而中國大陸在這過程中扮演了積極參與的角色,尤其不可忽略中國大陸基礎設施建設援助對非洲發展的貢獻。因此，有關中國大陸對非洲的直接投資後續研究應在實證研究基礎上，觀察中非經濟合作機制的演變。尤其在宏觀層面上關注在「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概念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正式運作後對非洲各國發展的影響及中共在國際政治上的收益。就微觀層面而言，比較研究中國大陸的工程品質，非洲各國民間對中資的態度，中資企業投資對促進非洲製造業發展的外溢效應都有助於瞭解中國大陸在非洲投資的政經成效。另外比較研究和田野調查，應為深入瞭解中國大陸在非洲投資的途徑，如果比較中國大陸和印度在非洲的投資或觀察中國大陸移民中農場和商場經營者的商業行為。都可能更有助於呈現中國大陸在非洲投資的完整面貌。

附錄

附錄一:本論文中非洲國家兩岸譯名對照表

國名	臺灣譯名	大陸譯名
Algeria	阿爾及利亞	阿爾及利亞
Angola	安哥拉	安哥拉
Botswana	波札那	博茨瓦納
Burkina Faso	布吉納法索	布基納法索
Chad	查德	乍得
Cote d'Ivoire	象牙海岸	科特迪瓦
DRC， Congo	剛果民主共和國	剛果民主共和國
Egypt	埃及	埃及
Ethiopia	衣索比亞	埃塞俄比亞
Ghana	迦納	加納
Kenya	肯亞	肯尼亞
Madagascar	馬達加斯加	馬達加斯加
Mali	馬利	馬里
Mauritius	模里西斯	毛里求斯
Mozambique	莫三比克	莫桑比克
Namibia	納米比亞	納米比亞
Niger	尼日	尼日爾
Nigeria	奈及利亞	尼日利亞
Republic of Benin	貝南共和國	貝寧共和國
Seychelles	塞席爾	塞舌爾
South Africa	南非	南非
Sudan	蘇丹	蘇丹
Tanzania	坦尚尼亞	坦桑尼亞
The Central Africa Republic	中非共和國	中非共和國
Togo	多哥	多哥
Tunisia	突尼西亞	突尼斯
Zambia	尚比亞	贊比亞
Equatorial Guinea	赤道幾內亞	赤道幾內亞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附錄二：趙紫陽的經濟技術合作四項原則

第一，中國和非洲國家進行經濟技術合作，遵循團結友好，平等互利的原則，尊重對方的主權，不干涉對方的內政，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不要求任何特權。
第二，中國和非洲國家進行經濟技術合作，從雙方的實際需要和可能條件出發，發揮各自的長處和潛力，力求投資少，工期短，成效回收快，並能取得良好的經濟效益。
第三，中國和非洲國家進行經濟技術合作，方式可以多種多樣，因地制宜，包括提供技術服務，培訓技術和管理人員，進行科學技術交流，承建工程，合作生產，合資經營等等。中國方面對所承擔的合作專案負責守約，保質，重義。中國方面派出的專家和技術人員，不要求特殊的待遇。
第四，中國和非洲國家進行經濟技術合作，目的在於取長補短，互相幫助，以利增強雙方自力更生的能力和促進各自民族經濟的發展。

資料來源：博黛蓉著，沈曉雷，高明秀譯，**紅色大布局：中國錢進非洲的真象**(台北：八旗文/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 9 月),頁 400-401。

附錄三：中國大陸國務院關於加強海外投資項目管理的意見

國務院關於加強海外投資專案管理的意見
發佈日期：1991 年 03 月 06 日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國務院各部委：

隨著我國對外開放政策的貫徹執行和對外經濟技術合作的發展，國內企、事業單位到外投資辦企業的情況逐年增多。其中有些專案在引進技術、提供國內短缺資源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也有些項目，由於對國際市場和外國法律不熟悉以及缺乏經驗等原因，預期效果不明顯，甚至出現企業虧損，不僅給國家造成經濟上的損失，也在政治上帶來不良影響。

為了進一步貫徹中央關於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方針，更好地執行對外開放政策，針對當前的實際情況，經征得有關部門同意，現就加強海外投資專案管理提出如下意見。
一、目前，我國尚不具備大規模到海外投資的條件，到海外投資辦企業主要應從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我國需要出發，側重于利用國外的技術，資源和市場以補充國內的不足，並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加強"南南"合作，推動我國與第三世界國家友好合作關係的發展。有條件的地區、部門和企業，可到海外從事一些有利於輸出產品、技術、設備、勞務，並有明顯經濟效益的項目。其前提條件為：合作條件要相宜；有合理的經濟效益；我方投資及其他條件要落實；必須經有關部門和專家論證，認真進行可行性研究，這項工作要在國家宏觀管理下有目的、有計劃地進行，必須嚴格按規定的審批程式辦理。

二、海外投資項目的審批許可權，暫按以下規定試行：凡需向國家申請資金或境外借款需國內擔保或產品返銷國內需國家綜合平衡以及中方投資額在一百萬美元以上(含一百萬美元)的項目，其專案建議書和可行性研究報告由國家計委會同有關部門審批；合同、章程由經貿部審批並頒發批准證書。中方投資額在三千萬美元以上(含三千萬美元)的項目。其專案建議書和可行性研究報告由國家計委會同有關部門初審後報國務院審批。中方投資額在一百萬美元以下，符合當前到海外投資的方針，資金、市場等不需要國家綜合平衡解決的，其專案建議書　，可行性研究報告以及合同和章程，可比照限額以上專案的審批辦法，分別由國務院各部門和省、自治區、直轄市及計畫單列市人民政府指定的綜合部門審批。項目建議書和可行性研究報告要報國家計委備案。合同、章程要報經貿部備案，並由經貿部審核頒發批准證書。

三、對向外轉移的國有資產、要嚴格按國家有關規定進行產權登記和管理，其中經國務院及國務院各部門批准的海外投資專案，由財政部、國家國有資產管理局、國家外匯管理局負責登記和管理；經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計畫單列市批准的海外投資專案，由地方政府有關部門負責登記和管理，並分別抄報財政部和國家國有資產管理局、國家外匯管理局備案。

四、為了及時全面地掌握我國海外投資的情況，並為制定海外投資方針，政策和編制計畫等提供重要依據，有關海外投資的統計工作由國家統計局歸口負責，並定期向國務院和有關部門提供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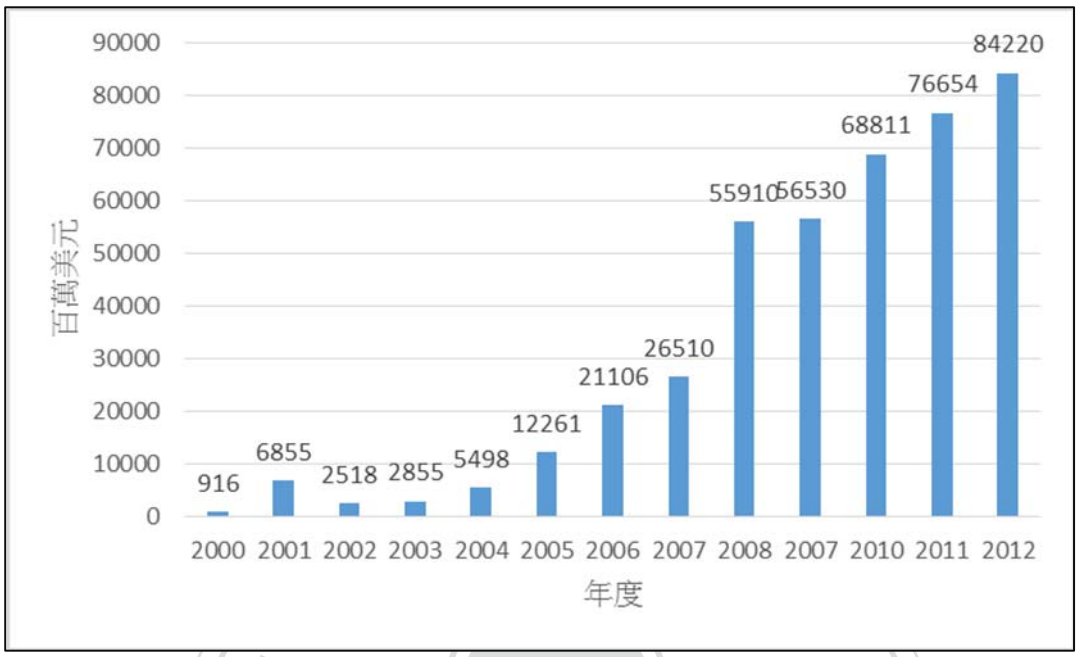
五、關於編制、審批海外投資項目可行性研究報告的規定，由國家計委負責制定、下發，由經貿部和國家計委會同有關部門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制定《關於海外投資辦企業的審批程式和管理辦法》，報國務院批准後下達。

六、財政部、國家外匯管理局等部門要切實加強對海外投資專案的財務、外匯管理，完善落實現有的外匯管理辦法；研究制定財務管理制度；並注意加強對海外投資專案的審計監督。

資料來源：山西省發改委門戶網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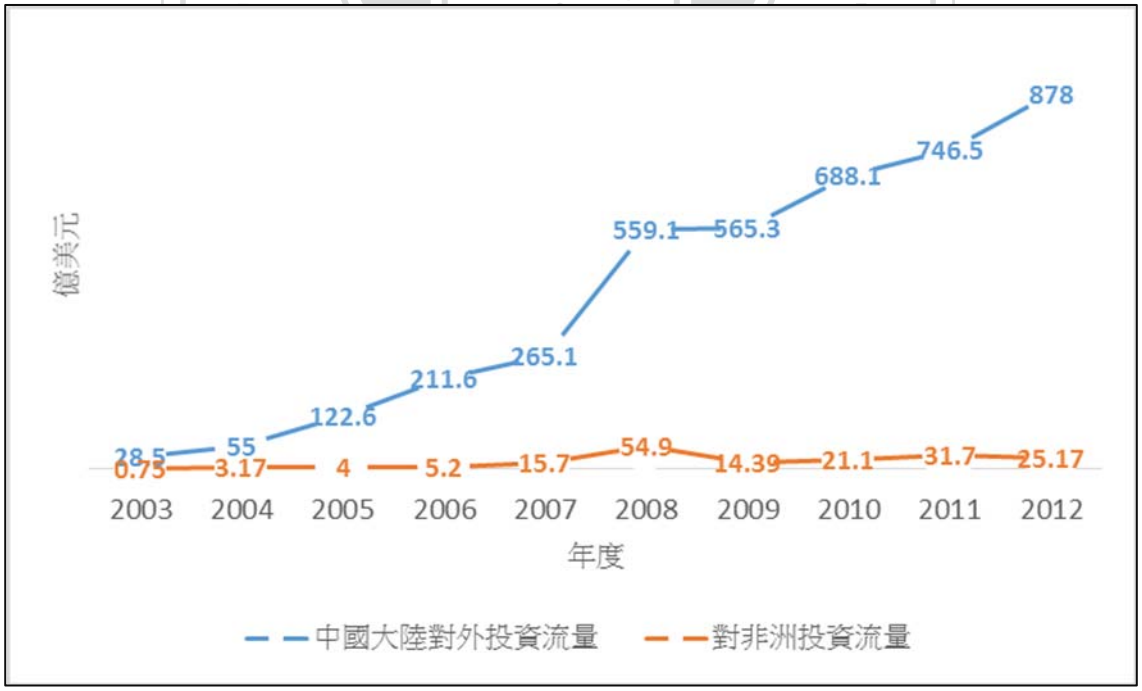
http://www.sxdrc.gov.cn/xxlm/wzzs/tzzc/201108/t20110805_19939.htm

附圖



資料來源：UNCTAD 統計資料，http://unctadstat.unctad.org/tableview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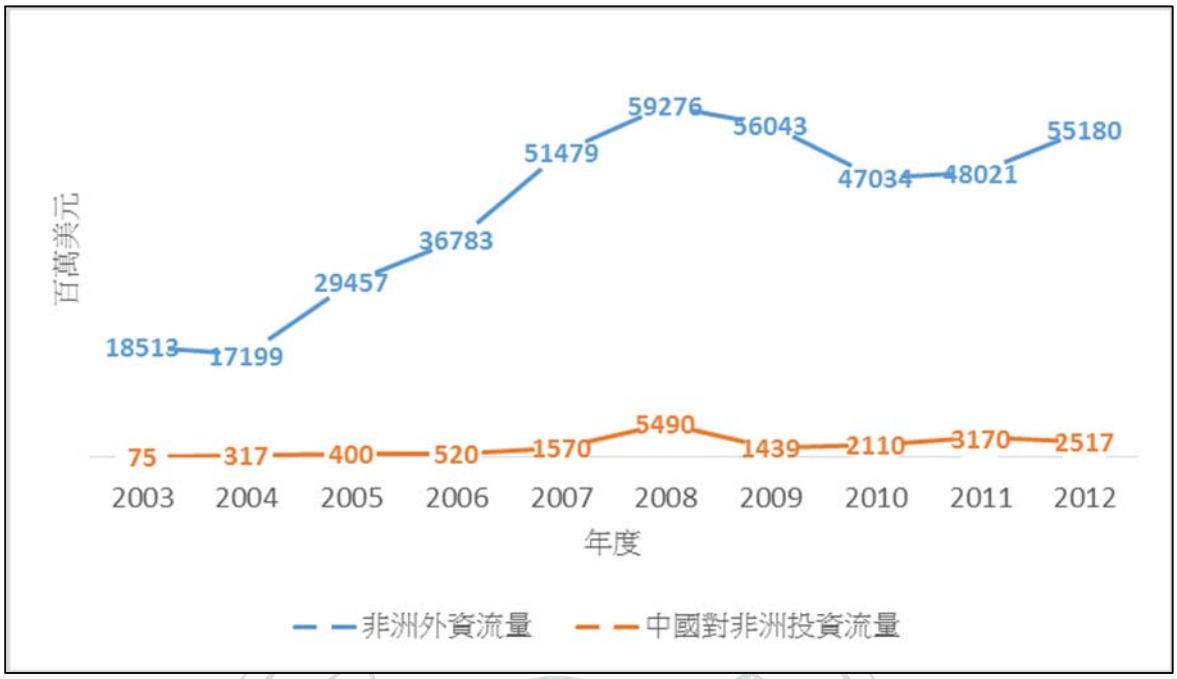
附圖一：2000-2012 年中國大陸對外投資流量圖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對外投資統計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網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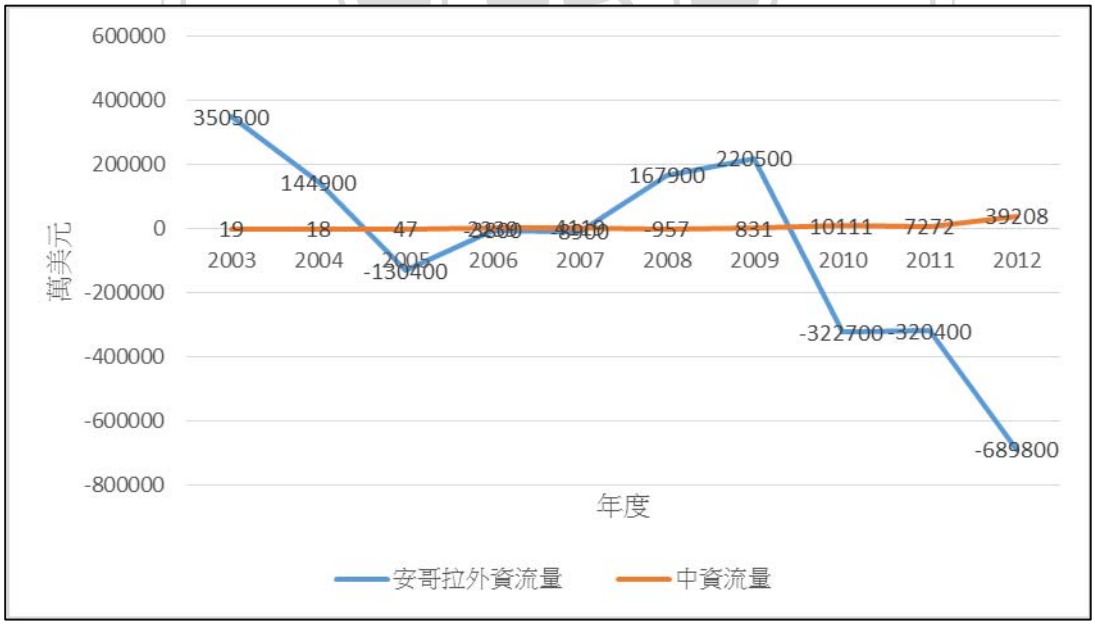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gzyb/bolian/

附圖二：2003-2012 年中國大陸對外投資流量及對非洲投資流量比較



資料來源：UNCTAD 投資報告，http://unctad.org/en/pages/publicationwebfly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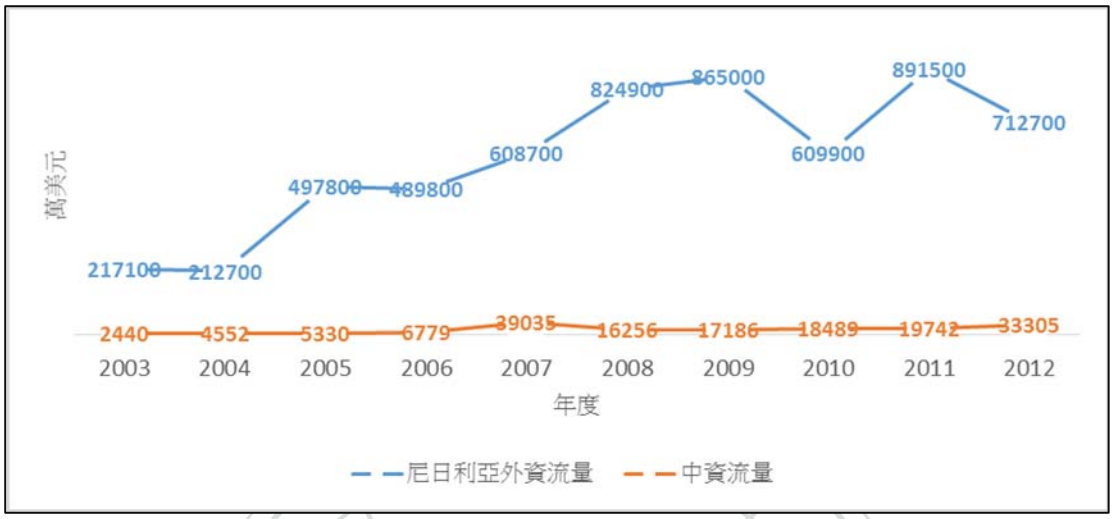
附圖三：2003-2012 年非洲外資流量與中國大陸對非洲中資流量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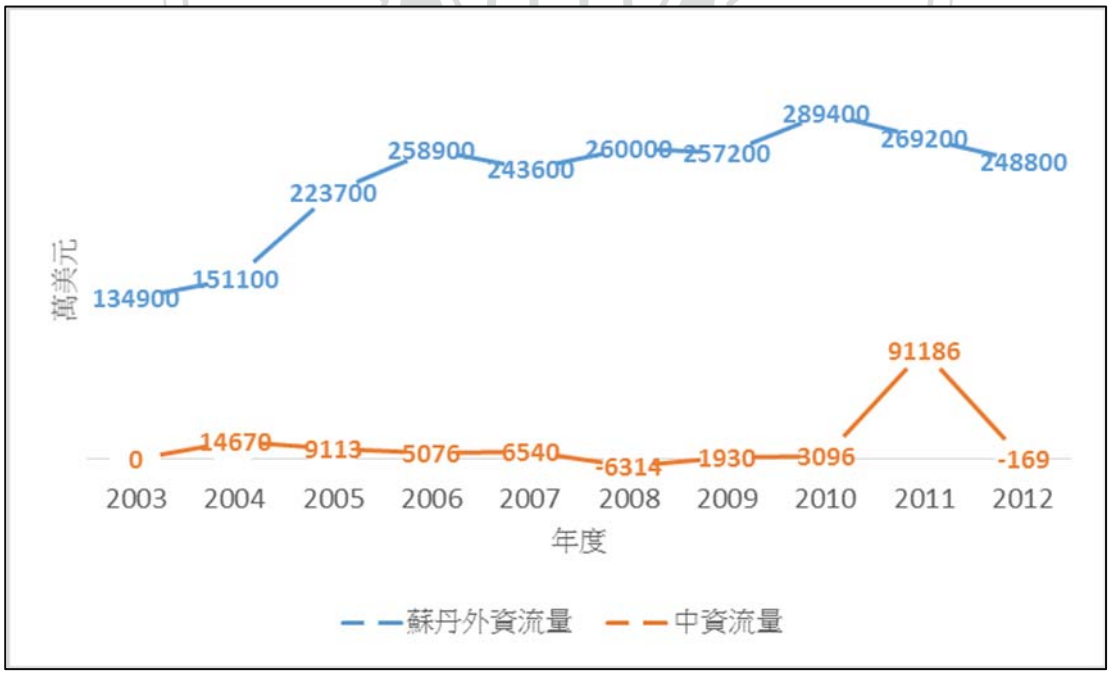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中國商務部對外投資統計報,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gzyb

UNCTAD 投資報告，http://unctad.org/en/pages/publicationwebfly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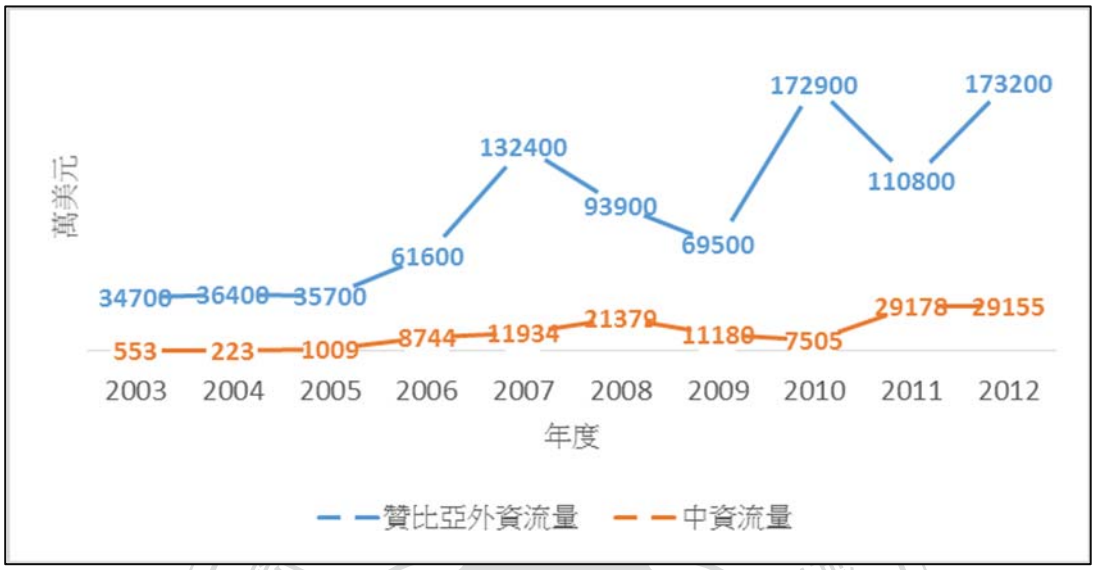
附圖四：2003-2012 年安哥拉流入外資與中資流入比較



資料來源：中國商務部對外投資統計報,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gzyb
UNCTAD 投資報告，http://unctad.org/en/pages/publicationwebflyer
附圖五：2003-2012 年尼日利亞流入外資與中資流入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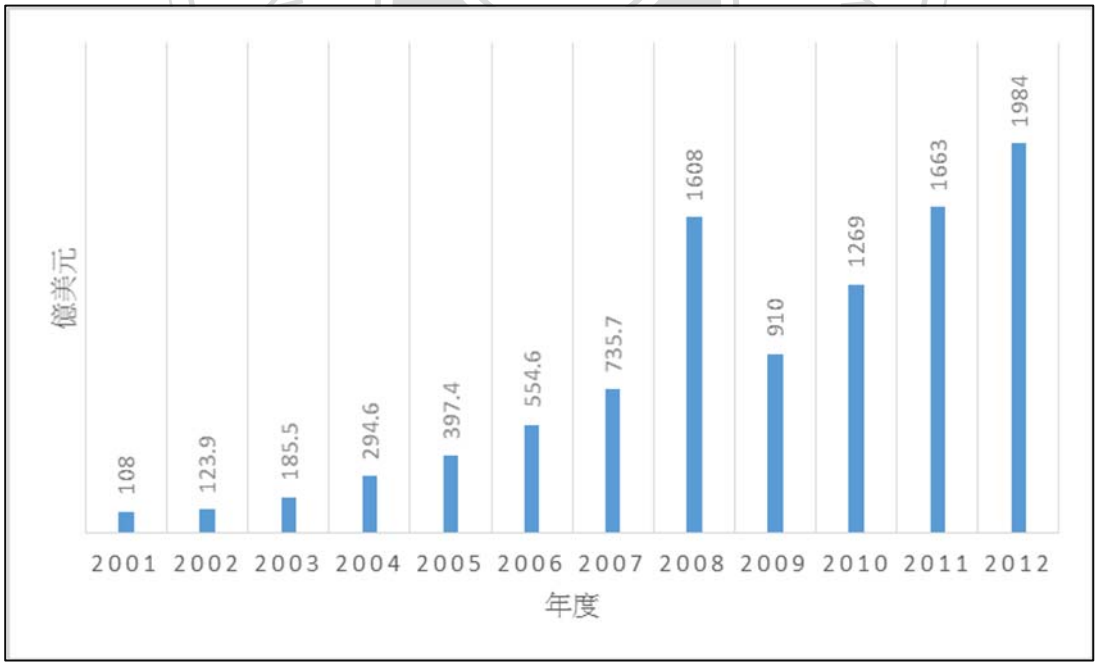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中國商務部對外投資統計報,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gzyb
UNCTAD 投資報告，http://unctad.org/en/pages/publicationwebflyer
附圖六：2003-2012 年蘇丹流入外資與中資比較



資料來源：中國商務部對外投資統計報,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gzyb
UNCTAD 投資報告，http://unctad.org/en/pages/publicationwebflyer

圖七：2003-2012 年贊比亞外資流量和中資流入比較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八：2001-2013 年中非貿易額

附表一:中非經貿合作區

名稱	投資金額(預定)	投資方	預定進駐產業	備註
中國-贊比亞經貿合作區。	15 億美元	中國有色金屬公司	礦產加工和相關產業，食品加工業，輕工業，組裝工廠，房地產。	
埃及蘇伊士經貿合作區	二億八仟萬美元	天津技術開發區	石油裝備，家電，紡織，汽車製造，物流業	
埃塞俄比亞東部工業園區	一億美元	江聯重工，江蘇其元集團，Yangyang Asset Management	建築材料，鋼製品(鋼板，鋼管),家電，成衣，製革，汽車裝配。	
毛里求斯經貿合作區	七億五仟萬美元	山西天利集團，山西焦煤集團，	製造和服務業，太陽能，製藥，醫療器，鋼製品，營造，旅館和房地產業。	2008 年天利財務危機，股權結構改變。項目改以商業房地產為主。
尼日利亞萊基(Lekki)自由貿易區	三億七仟萬美元	中國土木工程集團	運輸設備，紡織和輕工業，家電和通訊設備，倉儲，出口加工，	
尼日利亞 Ogun-Guang-dong 自由貿易區	五億美元	廣東新廣集團，CCNC Group	輕工業製造(建材，磁磚，鐵器，家具，木材加工，製藥，小家電，電腦，燈具，造紙)	
阿爾及利亞-中國江玲自由貿易區	五億五仟六百萬美元	江玲汽車集團，中鼎集團	汽車和建材	於 2009 年阿爾及利亞投資法令改變，項目停頓。

來源：Namukale Chintu and Peter J. Williamson, “Chinese State Owened Enterprises in Africa.” Ivey Business Journal Online, http://iveybusinessjournal.com/topics/global-business

參考文獻

壹 中文

一 書籍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主編，**2008 年中國企業「走出去」發展報告**（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年 12 月 ）。

王佳煌，**國家發展**（ 台北：台灣書店，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三月 ）。

朱柔若譯，W. Lawrence Neoman 著， **社會研究方法：質化與量化取向**（ 台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1 月 ）。

李桂芳，儲賀軍著，**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分析報告 2010**（ 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10 年 6 月 ）。

沈桂龍著，**中國 FDI 績效研究-對經濟增長的辯證考察**（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 12 月 ）。

沈曉雷，高明秀譯，博黛容（ Debora Brautigam ）著，紅色大布局（ 台北：八旗文化，2013 年 9 日 ）。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 台北：美商麥格羅.希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2005 年 6 月 ）

尚安榮譯，陳禹辰校閱，Robert K. Yin 著，個案研究法（ 台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 6 月 ）。

周繼祥，劉孟俊，左正東編，**陸企海外投資及其影響**（ 台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中國大陸研究中心，2013 年 12 月 ）。

陳怡仲，張晉閣，許孝慈譯，羅伯特.吉爾平（ Robert Gilpin ）著，**全球政治經濟-掌握國際經濟秩序**（ 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 年 1 月 ）。

陳德昇，**中共國務院機構改革之研究（ 1978-1998 ）-政府再造觀點**（ 台北：永業出版社，1999 年 8 月 ）。

項本武著，**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與經濟效應的實證研究**（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年 8 月 ）。

張亞中主編，**國際關係總論**（ 台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 2 月，第二版 ）。

張同鑄主編，**非洲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問題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年 6 月 ）。

張娟著，**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研究-基於價值鏈的視角**（ 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8 年 10 月 ）。

楊宇光譯, 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著, **國際關係的政治經濟分析**（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4 年 8 月）。
趙稀方， **後殖民理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 10 月）。
趙曉笛著,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長期發展趨勢**（北京: 新華出版社, 2008 年 9 月）。
潘岳主編，**中國對外投資發展戰略**（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8 年 11 月）。
蕭勤福編，**中國走出去戰略研究報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4 年 11 月）。

二　期刊

丁永康，「中共推動國際新秩序在非洲的實踐」，**中國大陸研究**， 第 43 卷第 11 期（中華民國 89 年 11 月），頁 77-95。
朴英姬,「中國與非洲利用外資與經濟發展效應比較」,**西亞非洲**（北京），2011 年第 1 期（2011 年 1 月）,頁 49-55。
李偉國，曾德衍,「中國與贊比亞農業合作開發前景」,**世界農業**（北京）,2006 年 11 期（2006 年 11 月）,頁 40-42。
姚梅桂，「中國對非洲投資合作的主要模式及挑戰」,**西亞非洲**（北京）2013 年第 5 期（2013 年 5 月）,頁 103-148。
查道炯，「中國在非洲的石油利益：國際政治課題」，**國際政治研究**（北京），2006 年第四期（2006 年 4 月），頁 53-68。
姜恆坤，傅海娜，「蘇丹石油：從內政焦點到外交難題」，**西亞非洲**（北京），2012 年第 6 期（2012 年 6 月），頁 78-94。
唐曉陽，「中國在非洲的經貿合作區淺析」，**西亞非洲**（北京），2010 年第 11 期（2010 年 11 月），頁 17-22。
楊振發，「中國與南蘇丹石油合作的機遇與挑戰」，**西亞非洲**（北京），2012 年第 3 期（2012 年 3 月），頁 90-108。
張永蓬，「當代中非關係發展階段劃分之我見」，**西亞非洲**（北京），2007 年第 1 期（2007 年 1 月），頁 54-61。
張安平，李文，于秋波,「中國與蘇丹石油合作模式的實證分析」，**西亞非洲**（北京），2011 年第 3 期，頁 3-11。
張娟，劉鑽石，「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與資源尋求型戰略」，**世界經濟研究**（北京），2012 年第 3 期（2012 年 3 月），頁 75-81。
董艷，張大永，蔡棟樑,「走進非洲：中國對非洲投資決定因素的實證研究」，**經濟學**（北京），第 10 卷第 2 期（2011 年 11 月），頁 675-690。

三　中文網站資料

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在全球，**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網站**，
http://www.cnpc.com.cn/cnpc/cnpczqq/global_index.shtml（ 2014 年 6 月 14 日下載）

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年報(2012)，**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網站**，
http://www.cnpc.com.cn/cnpc/qywhcbw/cbw_index.shtml（ 2014 年 6 月 14 日下載）

中非關係回顧(中國與非洲關係大事記)，**中國網**，
http://www.china.com.cn/HIAW/445819.htm（ 2014 年 3 月 12 日下載 ）

「劉貴今，中非友好關係五十年」,**中國網**,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2000/Aug/2945.htm（ 2014 年 3 月 12 日下載）

「中非發展基金加大投資，助力非洲經濟多元化」，**中國與非洲網**，
http://www.chinafrica.cn/chinese/jm/txt/2o14-03/14/content_603300.htm,（ 2014 年 4 月 3 日下載 ）

「誰在指責中國是“新殖民主義者”」，**南方周末網**，2006 年 6 月 22 日，
http://www.southcn.com/weekend/commend/200606220006.htm（ 2014 年 4 月 8 日下載 ）

「中非關係」,**新華網-新華資料**,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3/28/content_335478.htm（ 2014 年 4 月 15 日下載 ）

「劉貴今，蘇丹和南蘇丹：未講完的糾結故事」，**國際網**，
http://memo.cfisnet.com/2013/0109/1294169.htm（ 2014 年 8 月 12 日下載 ）

劉曉光，苟琴，盧峰，中國對外投資對出口的影響分析，**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http://www.nsd.edu.cn/cn/214040310251437514829.pdf（ 2014 年 5 月 11 日下載 ）

貳　英文

一　英文書籍

A Human Rights First Report, *Investing in Tragedy: China's Money, Arms, and Politics in Sudan* (New York: human righters first, 2008).

Azubuike, Lawrence O., *Privatization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 Nigeria* (Boca Raton: Brown Walker Press, 2009).

Barltrop, Richard, *Darfur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Challenges of Conflict Resolution in Sudan* (New York: I. B. Tauris & Co Ltd, 2011).

Brautigam, Deborah, *T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2009).

Collins, Robert O., *A History of Modern Sud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ty Press, 2008).

Cook, Jennifer, ed., *U. S. and Chinese Engagement in Africa: Prospects for improving U.S.-China-Africa Cooperation* (Washington, DC, CSIS, 2008).

Dent, Christopher M., ed., *China and Africa Development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Dietz, Ton, Kjell Havnevik, Mayke Kaag, Terje Oestigaard eds., *African Engagements: Africa Negotiating an Emerging Multipolar World* (Boston: Brill, 2011).

Dijk, Mine Pieter van, ed., *The New Presence of China in Africa*. http://repub.eur.nl/pub/ 21256/NewsPresenceCinA.pdf

Dittmer, Lowell and George T. Yu, eds., *China, the Developing World, and the New Global Dynamic*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2010).

Hickey, Dennis and Baogang Guo eds., *Dancing with the Dragon: China's Emergence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10).

Hulsemeyer, Axel e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 Reader* (Ontari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Kopinski, Dominik, Andrzej Polus and Ian Taylor, eds., *China's Rise in Africa: Perspectives on a Developing conne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Rotberg, Robert I., ed., *China into Africa: Trade, Aid, and Influence* (Cambridge: World Peace Foundation, 2008).

Taylor, Ian, *China's new Role in Africa*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2009).

Taylor, Ian, *China and Africa: Engagement and compromise*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Xing, Li and Abdulkadir Osman Farah eds., *China-Africa Relations in an Era of Great Transformations*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13).

二　英文期刊

Barbopoulos, Leonidas, Andrew Marshall, Cameron MacInnes, Patrick McColga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emerging markets and acquirers' value gain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Vol. 23, Issue 3 (June 2014), pp.604-619.

Bartel,Frank L., Francesco Napolitano, Nicola E. Tissi, "FDI in Sub-Saharan Africa: A longitudinal perspective on location-spcific factor(2003-2010),"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Vol. 23, Issue 3 (June 2014), pp.516-529.

Brautigam,Deborah, TANG Xiaoyang, "African Shenzhen: 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in Africa,"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49, No. 1,(2011),pp.27-54.

Cisse, Daouda and Ross Anthony,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Africa: Entrepreneurs or The Long Arm of The State?" *Ivey Business Journal Online* (July/August 2013). http://iveybusinessjournal.com

Corkin, Lucy, "China and Angola - Stategic partnership or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Angola Brief*, Vol. 1, No. 1 (January 2011), pp. 2-4.

Downs, Erica S., "The Fact and Fiction of Sino-Africa Energy Relations," *China Security*, Vol. 3, No. 3 (Summer 2007), pp. 42-68.

Duanmu, Jing-Lin, "A race to lower standards? Labor standards and location choice of outward FDI from the BRIC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vol. 23, Issue 3 (June 2014), pp.620-634.

Dunning, John H., "The eclectic paradigm as an envelope for economic and business theories of MNE activity,"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Vol. 9, Issue 2 (April 2000), pp.163-190.

Gu, Jing, "China's Private Enterprises in Africa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Africa Develop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Vol. 21, No. 1 (January 2009), pp.570-587.

Kolstad, Ivar, Arne Wiig, "What determines Chinese outward FDI?" *Journal of World Busniss*, No. 47 (2012), pp.26-34.

Liang, Xiaoya, Xiongwen Lu, Lihua Wang, "Outwar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n China: The effect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to home market rivals,"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Vol.47, Issue 1, (January 2012), pp.134-144.

Liu, Xiaohui, Trevor Buck, Chang Shu,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next stage: outward FDI?"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Vol. 14, Issue 1 (February 2005), pp.97-115.

Moon, Hwy-Chang, Tomas W. Roehl, "Unconventiona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imbalance theory,"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No. 10 (2001), pp. 197-215.

Moreira, Susana, "Learning from Failure: China's Overseas Oil Investments,"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Vol. 42, No. 1 (January 2013), pp. 131-169.

Porter, Michael E.,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Harvard Busines Review*, (March-April 1990), pp. 73-93.

Tembe, Paulo Elicha and Kangning Xu, "China-Africa Economic Cooporation: Chinese Companies' Contributions to African Development - The Cases of Mozambique and Angola," *Research in World Economy*, Vol. 4, No. 2 (August 2013), pp. 61-74. Online Publish: http://www.sciedu.ca/rwe

Xing, Li, Timothy M. Shaw,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State Capitalism," Journal of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 No. 1 (April 2013), pp.88-113.

Wang, Chengqi, Junjie Hong, Mario Kafouros, Agyenim Boateng, "What drives outward FDI of Chinese firms? Testing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hre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Vol. 21, Issue 3 (June 2012), pp.425-438.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三　英文網站資料

Adewumi, Sarumi, “The Impact of FDI on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DiVA,* http://www.diva-portal.org/smash/get/deva2.../FULLTEXT01.pdf (2015 年 3 月 16 日下載)

Brautigam, Deborah, Thomas Farole, and Tang Xiaoyang, “China’s investment in African Special Economic Zones: Prospect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Premise, No. 5 (March 2010), *The World Bank*,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PREMENT/resources/EP5.pdf (2014 年 8 月 12 日下載)

Brautigam, Deborah & Haisen Zhang, “Green Dreams: Myth and Reality in China’s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in Africa,”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http://www.cgdev.org/sites/default/files/Brautigam%20%20Zhang_Green%20Dreams.pdf. (2015 年 4 月 8 日下載)

Carmody, Padraig and Godfrey Hampwaye, “Inclusive or Exclusive Globalization? Zambia’s Economy and Asian Investment,” *Trinity College* (Dublin), http:www.tcd.ie/iiis/documents/discussion/iiisdp294.pdf. (2015 年 4 月 8 日下載)

“Chad suspends China firm CNPC over oil spill,” *BBC, News Africa*, 14 August 2013 , http://www.bbc.com/news/world-africa-2369726. (2014 年 6 月 28 日下載)

Chatelard, Solange Guo and Jessica M. Chu, “Chinese Agricultural Engaments in Zambia: A Grassroots Analysis,” http://saiscari.files.wordpress.com/2014/10/saia-cari-brief-4-january-2015.pdf, (2015 年 4 月 8 日下載)

Chen, Chuan, Andrea Goldstein and J. Orr, “Local Operations of Chinese Construction Firms in Africa: an Empirical Survey,” *Standford University*, http://gpc.standford.edu/sites/default/files/j014_0.pdf. (2014 年 7 月 24 日下載)

Chileshe, Chilufya, “Chinese Debt, Aid and Trade: Opportunity or Threat for Zambia?” *SAIIA* (South Africa), http://www.saiia.org.za/saia_sop_72_chileshe_20101214.pdf. (2015 年 3 月 19 日下載)

“China’s SEZ in Nigeria,” *Ventures Africa* (Nigeria) http://www.ventures-africa.com/LFTZ+investment+forum&submit=Search, (2014 年 6 月 28 日下載)

“China, Zambia, and a Clash in a Coal Mine.” *The New Yorker* (2013,10,19), http://www.newyorker.com/business/currency/china-zambia-and-a-clash-in-a-coal-mine. (2015 年 3 月 23 日下載)

“Chinese Investment in Special Economic Zones in Africa: Progress, Challenges and Lessons Learned,” The World Bank and PPIAF Regional Integration Report (January 2011), *PPIAF*, http://www.ppiaf.org/sites/ppiaf.org/files/publication/Africa_China_SEZs_Final-pdf (2014 年 10 月 27 日下載)

Cisse, Daouda, “FOCAC: trade, investments and aid in China-Africa relations,” Policy Briefing, *Stellenbosch University* (South Africa), May 2012 , http://scholar.sun.ac.za/handle/10019.1/21429. (2014 年 4 月 15 日下載)

Corkin, Lucy, “Chinese Construction Companies in Angola: A Local Linkages Perspective,” *MMCP Discussion Paper* No. 2, (March 2011), http://commodities.open.ac.uk/discussionpapers. (2014 年 8 月 12 日下載)

Corkin, Lucy, “China and Angola - Stategic partnership or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Angola Brief*, Vol. 1, No. 1 (January 2011), http://www.cmi.no/publication/file/3938_china-angola-stategic-prtnerhip-marriage.pdf,(2014 年 8 月 7 日下載)

Egbula, Margaret and Qi Zheng, “China and Nigeria: A Powerful South-South Alliance,” *West Africa Challenge*, No.05 (November 2011), http://www.oecd.org/countries/nigeria/49814032.pdf,(2014 年 7 月 24 日下載)

Eliassen, Ina Eirin, “Chinese Investors: Saving the Zambian Textile and Clothing Industry?” *CCS, Stellenbosch University* (2012), http://www.ccs.org.za/wp-content/upload/2012/08/CCS_Commentary, (2014 年 9 月 13 日下載)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neji, Mathias Agri, Iwayanwu J. Onyinye, Drenkat N. Kennedy and Shi Li Rong, "Impact of foreign trade and investment on Nigeria's textile industry: the case of China," *Academic Journals*, http://www.academicjournals.org/JASD. (2014 年 10 月 2 日下載)

Ezekwesili, OK, "Commercial Value Chain in Zambian Agriculture: Do Smallholders Benifit?" Working Paper, *The World Bank*, http://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487740ESW0P1C0Disclosed071131 (2015 年 3 月 16 日下載)

Fessehaie, Judith, "Intensification in Industries Upstream of Zambia's Copper Mining Sectory," *Open University* http://commodities.open.ac.uk/discussionpapers, (2014 年 7 月 5 日下載)

German, Laura A., George C. Schoneveld, Sheila Wertz-Kanounnikoff, Davison Gumbo, "Chinese trade and investment and its impacts on forests: A scoping study in the miombo woodlands," *CIFOR* (Bogor, Indonesia), http://www.cifor.org/publication/pdf_files/WPapers/WP84german.pdf, (2015 年 3 月 16 日下載)

"History of failed Zimco and how it wasted Zambia's resource," *Zambian Watchdog*, http://www.zambiawatchdog.com/history-of-failed-zimco-and-how-it-wasteed-zambia's-resource, (2015 年 3 月 16 日下載)

Hsueh, Roselyn, and Michael Byron Nelson, "How China is Impacting Business-State Relation in Africa: The Cases of Angola and Nigeria," APSA 2013 Annual Meeting Paper (August 30, 2013),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http://papers.ssrn.com/papers.cfm?abstract_id=22996564, (2014 年 8 月 12 日下載)

Jiang, Julia and Chen Ding, "Update on Overseas Investments by China's National Oil Companies,"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14), http://www.iea.org/publications/freepublications, (2014 年 8 月 12 日下載)

Kabbashi M. Suliman and Ahmed A. A. Badawi, "An assessment of the Impact of the China's Investment in Sudan," *Africa Portal*,

http://dspace.africaportal.org/jspuib/bitstream/123456789/324361/Sudan-China-FDI-relations.pdf,(2014 年 12 月 26 日下載)

Kong, Bo, "China's Quest for Oil in Africa," SAIS Working Paper, *SAIS,* http://sais-jhu.edu/sites/default/files/BoKongWP1-11_1.pdf,(2014 年 6 月 28 日下載)

Li, Pengtao, "The Myth and Reality of Chinese Investors: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Investment in Zambia's Copper industry," SAIIA Occasional Paper No 62, May 2010, *SAIIA*, http://www.eisourcebook.org/cms/June%202013/Myth%20&%20Reality%20of%20Chinese%20Investors%20Zambian%20Copper%20Case%20Study.pdf (2015 年 3 月 19 日下載)

Limpitlaw, D., "Nationalization and Mining: Lessons from Zambia," *The Journal of The Southern African Institute of Metallurge*, Vol.111 (October 2011), http://saimm.co.za/Journal/v111n10p737.pdf,(2014 年 11 日 9 日下載)

Matisoff, Adina,"Crude Beginings: An Assessment of 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s Enviromental and Social Performance Abroad," *Friends of the earth*, http://libcloud.s.3.amazonaws.com/93/51/b/1181/1/crude_beginings.pdf,(2015 年 3 月 23 日下載)

Mujenji, Fison and Charlotte Wonani, "Long-term outcomes of agriculture investment: Lessons from Zambia," *IIEA* (Ireland), http://pubs.iied.org/pdfs/12571IIED.pdf,(2015 年 3 月 16 日下載)

Mthembu-Salter, Gregory, Elephants, "Ants and Superpowers: Nigeria's Relations with China," Occasional Paper No. 42, (September 2009), *Afric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airs,* http://dspace.africaportal.org/library. (2014 年 7 月 5 日 下載)

Nabine, Djeri-wake, "The impact of Chinese Investment and Trade on Nigeria Economic Growth," ATPC Working Paper No. 77 (August 2009), *UN,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 http://www.uneca.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77.pdf, (2014 年 8 月 7 日下載)

"Oil pipeline extension to South Sudan," *Daily Nation* (Kenya), http://mobile.nation.co.ke/business/Oil-pipeline-extension-to-South-Sudan/index.html,(2014 年 6 月 14 日下載)

Oyeranti, Olugboyga A., M. Adetunji Babtunde, E. Olawale Ogunkole, Abiodun S. Bankole, “China-Africa Relations: A Case Study of Nigera,” *Africa Portal*,http://www.africaportal.org/library,(2014年10月25日下載)

“President Kaunda of Zambia visits Peking,” *Peking Review* (March 1, 1974),http://marxists.architexturez.net/subject/PR1974-09.pdf, (2015年2月22日下載)

Sandrey, Ron and Hannah Edinger, “China’s Manufacturing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Africa,”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https://www.afdb.org/fileadmin/uploads/.../Working%20128.pdf,(2014年5月19日下載)

Schoneveld, George, Laura German, Davison Gumbo, “The developmental implications of Sino-Africa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S preliminary assessment for the case of Zambia,” *CIFOR* (Bogor, Indonesia),http://www.cifor.org/publication/pdf_files/WPapers/WP133.schoneveld.pdf,(2015年2月22日下載)

Sinkala, Muchemwa and Weidi Zhou, “Chinese FDI and Empolyment Creation in Zambia,” *IISTE,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Sharing Platform,* http://www.iiste.org/journals/index.php/JEDS/article/view/16, (2015年3月19日下載)

“South Sudan- Oil,” *Global Security,*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war. (2014年10月2日下載)

“Sub-Saharan Africa: Case Studies of U.S and Chinese Economic Engagement in Angola, Ghana, and Kenya: a Supplement to GAO-13-199” (Febuary 2013),*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http://gao.gov/assets/660/652043.pdf. (2014年7日5日下載)

“Sudan’s ownership of pipline will have little impact,” *The Economist* (June19,2014),http://country.eiu.com/artical.aspx?Country=Sudan&articleid=1221930106. (2014年10月2日下載)

Szirmai, Adam, Mulu Gebreeyesus, Francesca Guadagno and Bart Verspagen, “Promoting Productive Employment inSub-Saharan Africa,” *Maastricht University,* http://www.merit.unu.edu/Produtive%20employment%20in%20Africa, (2015年3月16日下載)

“The China Angola Partnership a Case Study of China’s oil Relations in Africa,” *China Briefing-News* (Hong Kong), http://www.china-briefing.com/news/2011/05/25/the-china-angola-partnership-a-case-study-of-china’s-oil-relations-in-africa (2014 年 10 月 22 日下載)

Thompson Ayodele & Olusegun Sotola, “China in Africa: an Evaluation of Chinese Investment,” *IPPA Working Paper* (Lagos, Nigeria), http://www.ippanigeria.org/china_africa_working.pdf,(2015年1月11日下載).

“UNCTAD: An Investment Guide to Zambia: Opportunity and Condition 2011,” *UNCTAD*, http://unctad.org/Docs/diaepcb201008_en.pdf,(2015年3月16日下載).

Weisbrod, Aaron and John Whalley, “The Contribution of Chinese FDI to Africa’s Pre Crisis Growth Surge,” *The National Burea of Economic Research*,http://www.nebr.org/papers/w17544,(2014年4月15日下載).

Wenbin, Huang and Andreas Wilks, “Analysis of approvals for Chinese Companies to invest in Africa’s mining,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sector,” *CIFOR*, http://webdoc.sub.gwdg.de/ebook/serien/yo/CIFOR_WP_WP81.pdf. (2015 年 2 月 9 日下載)

“Zambia woos foreign farmers with free land offer,” *CNN INTERNATIONAL*, http://edition.cnn.com/2003/WORLD/africa/11/21/zambia.farms.reut, (2015 年 3 月 16 日下載)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